

Tsevan Rabtan
Alejandra Acosta



THE ATLAS *of* GOOD *and* EVIL



人类善恶小史

[西] 策妄·阿拉布坦 著　[智] 亚历山德拉·雅科斯塔 绘　姚云青 译

Siem pre me han llamado la atención las anomalías históricas, los monstruos en el mundo convulso de las nacio nes casi siempre nacidos violenta y caóticamente por la confluencia del azar, la aventura y el comercio.

CTS 湖南人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版权信息

书名：人类善恶小史

作者：【西】策妄·阿拉布坦

绘者：【智】亚历山德拉·雅科斯塔

译者：姚云青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10-01

ISBN：9787556125098

目录
CONTENTS

序
欧洲
- 21岁
- 绞肉机
- 文字与荣誉
- 独裁者
- 虫子的美食
- 外交官
- 纯属必须

美洲
- 可敬之人
- 黄金国
- 强盗资本家
- 阿克里（东）
- 阿克里（西）
- 林肯与“竭尽所能”的艺术

非洲
- 义举
- 一段恶名昭彰的历史
- 朱达尔帕夏与阿尔马斯族
- 神对我言
- 罗克渡口
- 拉巴赫
- 伍雷—夏诺恩联合军团

亚洲
- 战乱
- 摩耶
- 蒙古人，西征欧洲
- 蒙古人，回军东撤
- 砂拉越的吉姆爷
- 武则天

大洋洲
- 原始人
- 万岁
- 一个精彩的冒险故事
- 和平主义
- 善与恶

献给 B.

序

我曾经问过本书作者，这部作品是以他的笔名“策妄·阿拉布坦” [1] 署名，还是使用其真名。然而在收到回复之前，我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并不知道策妄的真名。早在2005年时，我第一次与我父母口中的“网民”相约见面（“你一个都不认识吗？这些‘网民’都是来找乐子的。”），一起吃了一顿晚饭，当时席上的网民们都是一群年过五十的大叔，策妄也在其间。确实有这么一代网民，或者至少其中一部分人，他们隐藏起真实身份的唯一原因就是为了在外拈花惹草、寻欢作乐。

幸运的是，策妄选择以这个极具特色的笔名为本书署名，只是因为这个名字在外已经小有名气。鉴于他打算像马鲁哈·托雷斯 [2] 或莱昂·贝纳文特 [3] 那样，将真人隐藏于化名之下，我为他作序时便可大胆放开手脚，跳脱常规套路。我不想按传统方式作序的理由很简单：读完此书后，我觉得不该透露其中任何一个故事的细节。作为一个序言作者——自为路易斯·马力亚·安荪 [4] 作序以来，为人作序可能会成为我的下一份工作——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我们踏上红毯，为读者展示作品内部的精妙之处，而这原本该是属于作者本人的荣耀。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曾经这样做过。尽管精心掩饰，读者在读完原作之后仍然会说：“啊，原来序言作者的妙语是从原作者这里抄来的。”

在本书中，策妄仔细审视“神是正义的，而魔鬼并非永远邪恶”这一说法，并通过其精妙的笔触对此进行论证。他在历史的长河中撷取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冒险故事，这些故事全部源自真实事件，而在每个故事的背后，我们都可以看到善恶之争的影子。要在尊重历史背景的前提下，如此深刻地审视人类的残酷罪行，同时又不失偏颇，需要强大的勇气与决心。这一做法可以说很“策妄·阿拉布坦”。作为总结，我不得不再次引用作者本人的话：“这些奇特的历史事件常常能够引起我的兴趣。民族的疯狂造就了影响世界的怪物；种种冒险、利益冲突甚至机缘巧合，最终总会导致暴力与无序。”在本书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策妄的本职工作是一名律师，但他的故事可不像法律文书那样枯燥乏味。本书中的许多历史事件大家也许耳熟能详，但从未有人采取过策妄的方式来讲述：他以自己独特的叙事风格介绍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他对事件主角与场景的描写栩栩如生，让读者仿佛能够跟随他一起走进那个时代。真是绝了！

我曾与策妄见过两三次面，当然，我并不能保证坐在我眼前的就是他本人——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与我们同席的还有我的一位朋友，他曾在古巴工作过几年。我的这位朋友就算不是古巴革命的支持者，至少也是其同情者。而策妄则是古巴政府的坚决反对者。当时我坐在那

里，静待争执的发生。因为我知道，我的这位朋友性格暴躁冲动；至于策妄，从他在个人博客上的言论来看，脾气也很急。我原以为，这两人聚在一起一定会闹个不可开交，而我还挺喜欢看人吵架的（当然，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有时我还会对争论的结果下个注）。没想到，两人的交锋很平淡，双方都在摆事实讲道理，种种长篇大论令我昏昏欲睡。但我们都知道，情绪化只会腐蚀事实，随着岁月的积累，甚至可能改变种种历史的真相。

这就是我所了解的策妄，以及他的这部作品。在本书中，他展现出非凡的才能：他以极其冷静克制的笔调，阐释着一个个令人战栗的故事；他从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择取出一颗颗遗珠，在这些故事中有英雄，也有恶棍，有时，两者的特性甚至会在同一个人物身上体现出来。凭借丰富的历史知识，他阐述事件时在细节上一丝不苟。这也是我最羡慕策妄的地方。我们虽有分歧，但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他博学多识，有时甚至因此过分自信，但总体算是个通情达理的和平主义者。

曼努埃尔·贾布瓦 [5]

[1] 本书作者笔名源自历史人物策妄阿拉布坦（Tsevan Rabtan，1665—1727），清朝时期准噶尔蒙古大汗。（本书脚注如无特殊说明，皆为译注。）

[2] 马鲁哈·托雷斯（Maruja Torres，1943— ），西班牙著名记者与作家。

[3] 莱昂—贝纳文特（León Benavente），西班牙独立摇滚乐队。

[4] 路易斯·马力亚·安荪（Luis María Anson，1953— ），西班牙著名作家、新闻工作者、政治家。

[5] 曼努埃尔·贾布瓦（Manuel Jabois，1978— ），西班牙新闻工作者、作家。

欧洲
EUROPA

21岁
21 año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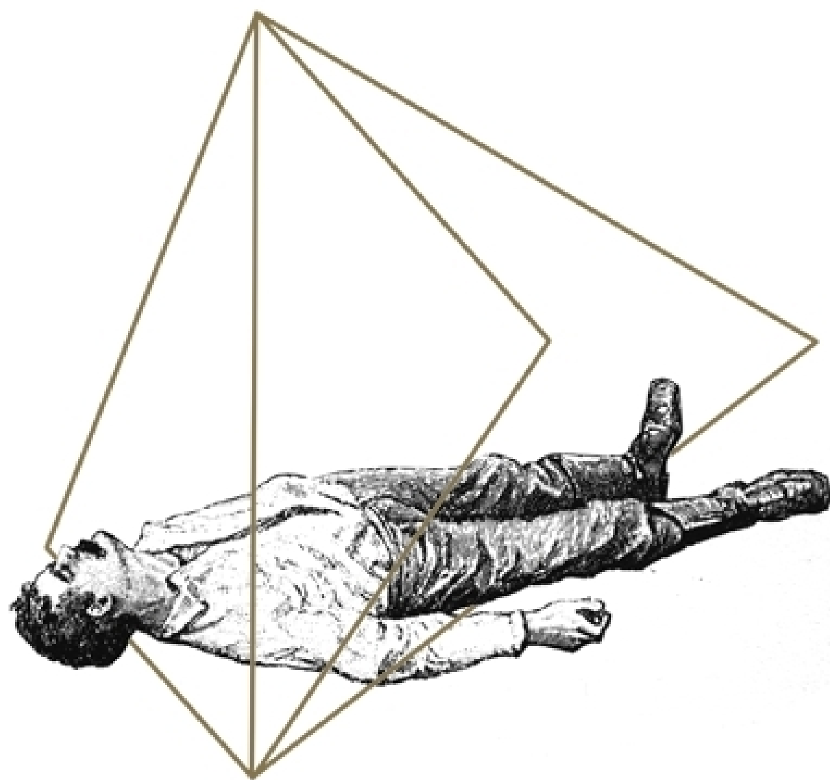
想当年，谁是给这个充满不公的当代世界带来平等、自由与真理的先驱？如今，我们已不得而知。如今现代人对这些概念已经很熟悉了，而在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党人曾用剑与荣耀令整个欧洲为之战栗，托克维尔 [1] 的前辈们要有相当的智慧，才能在煽动性的社会环境下坚持正确的立场。

埃瓦里斯特·伽罗瓦 [2] 从小痛恨暴君专政。他自小由母亲亲自教育，12岁时进入路易皇家中学就读。这所中学可谓共和主义者的摇篮，伽罗瓦刚进学校，就目睹了当时该校的100多名学生拒绝参加为“拥有绝对权力”的国王而举办的致敬酒会，并因此全部遭到开除。

伽罗瓦到15岁以前都没怎么接触过数学，直到16岁前也没有认真研究过这门学问。不幸的是，他的一些性格缺陷进一步影响了他的职业发展。他的解题方法有时连老师们都看不懂，而他还经常拒绝屈尊解释自己的演算步骤。这个问题导致他应考综合理工学院时连续两次落榜。第二次面试时，伽罗瓦甚至将一块黑板擦扔到考官迪内特（Dinet）先生头上，因为他嫌考官的反应太慢了。

由于学业受挫，伽罗瓦成了更加激进的反教权主义者和共和主义

者，但他并没有停止学术钻研的脚步。17岁时，他给《理论数学及应用数学年鉴》杂志寄去一篇文章，之后又给法国科学院寄了两篇论文，探讨当时最大的学术难点之一：多项式方程。之后所发生的事我们不得而知：论文似乎被寄给柯西[3]审阅，后者要求这位年轻的数学家将两篇论文合并重写，罗列清楚要点，并整合其他当代数学家的观点，作为一篇大论文去申请科学院的数学学术大奖。



不幸的是，命运似乎一直在跟伽罗瓦作对。他的父亲在百日王朝后曾由波拿巴任命为皇后镇镇长，但却被一位耶稣会牧师陷害，最终在1829年7月身亡。伽罗瓦的父亲喜欢写一些讽刺短诗，他的政敌利用这一点，仿造了（至少史书正传上是这么说的）几首讽刺诗，由此害他得罪了当时仍在当权的某些地方上的大人物。伽罗瓦的父亲最终被迫自杀。伽罗瓦参加了葬礼，并在现场目睹了一场骚乱。葬礼期间，他父亲的支持者抨击那位牧师背叛了镇长，争吵随即演变为一场混战。主持葬礼的神父受了伤，从葬礼现场匆匆溜走；留在现场的人则大打出手，坟墓里的棺材都被破坏得四分五裂。

雪上加霜的是，当伽罗瓦回到巴黎后，他的那篇受到柯西认可的论文被错寄到另一位伟大的数学家约瑟夫·傅立叶（Joseph Fourier）处，但傅立叶当时已经去世了，自然不能替他说话。没有人知道在这过程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为何伽罗瓦的论文最终没能成功送达法国科学院参与大奖评审。伽罗瓦为此大发雷霆，他认定此事背后有人阴谋陷害，就像他父亲所遭遇的那样。共和主义党派的报纸进一步扩散了这个消息。这时，伽罗瓦已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他在政治界与学术界的名望都在逐步提升。

七月革命时，伽罗瓦不可避免地卷入反对查理十世（Charles X）的起义中。他因攻击校长而被大学开除，出于狂热的爱国心以及（我猜想也有部分）报复心理，他加入“共和国”的“国民炮兵团”，但在资产阶级出身的路易·菲利普 [4] 登上王位后，炮兵团很快被下令解散。这就是一位革命者的命运——兜兜转转，最终又回到原点。伽罗瓦又开始组织反对新国王的袭击，但这时他已经20岁了，不能再用“年轻气盛”作为借口替他的行为开脱了。他被逮捕、审判，后被无罪释放。但就在出狱仅仅一个月后，7月14日，他又身着已被解散的炮兵团的制服上街游行，最终被逮捕入狱。监狱中的一段经历令他变得更加偏执：伽罗瓦身边的一名囚犯忽然被人打了一枪，于是他坚信有人想在狱中谋杀他们。在一次醉酒后，他曾边叫喊着父母的名字边试图自杀，幸而被狱友们救下一命。

伽罗瓦在狱中度过了近1年的时间。他的结局就像言情小说的情节，只是日后被人神话了。他爱上了一位名叫斯蒂芬妮—费丽希·波特琳·杜·莫泰尔（Stéphanie-Félicie Poterin du Motel）的女子，结果招致灭顶之灾：斯蒂芬妮已经订婚了，未婚夫也是一名共和主义者，且精于决斗。于是在一天清晨，两人相约决斗：各走25步，随后拔枪互射。伽罗瓦中弹倒在了血泊中，对手却无动于衷；由于报信人拖拖拉拉，他的兄弟在事发数小时后才赶到现场，将他送往医院。一代天才最终离开了人世。

共和党人集团为此对身为公务员的未婚夫和他水性杨花的情人大加抨击。父亲葬礼上的闹剧在伽罗瓦自己的葬礼上重演了，规模更加庞大：前一天晚上，警察逮捕了为首的几个闹事者，结果第二天，墓地附近的警察局被2000名共和党人团团包围了。

然而，伽罗瓦的个人传奇却发生在决斗的前夜。那天晚上，伽罗瓦发着烧，在信中写道：“一个恶名昭彰的风尘女子将会要了我的命……我和对手都任凭她摆弄。我为何要为一件如此不值一提、如此卑劣的事情搭上自己的性命呢？”他决定在临死前的夜晚将自己的笔记整理成册。在他留下的遗稿中，我们能看到穿插在数学公式之间的种种涂鸦，如“斯蒂芬妮”“那个女人”以及“我没有时间了！我没有时间了！”。

在决斗前夕，伽罗瓦给他的朋友、另一位数学家奥古斯特·谢瓦利尔（Auguste Chevalier）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忙整理自己的笔记，并寄给雅可比 [5] 或高斯 [6] ，希望他们能认可自己理论的重要意义。

伽罗瓦在死亡的威胁下匆忙写下的笔记比平时更难读懂，因此直到

20年后，这位已故天才的遗稿才被约瑟夫·刘维尔[7]成功解读。约瑟夫完善了他的理论，伽罗瓦的伟大学术成就终于被全世界认可。他最大的贡献是发明了“群论”，150年后，一位名叫怀尔斯[8]的英国数学家在他的群论基础上，证明了著名的“费马最后定理”[9]。不过那就是另一段历史了。

“别哭了，年仅21岁就要面对死亡，我需要鼓足全部的勇气。”临死前，面对兄弟阿尔弗雷德（Alfred）的恸哭，伽罗瓦曾如是安慰道。

[1] 即亚历克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学家，以《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等著作闻名于世。

[2] 埃瓦里斯特·伽罗瓦（Évariste Galois，1811—1832），著名法国数学家，曾是一名激进的共和主义者。

[3] 指奥古斯丁·路易·柯西（Augustin Louis Cauchy，1789—1857），法国数学家，一生主要贡献在微积分学、复变函数和微分方程领域。

[4] 即路易·菲利普一世（Louis-Philippe I，1773—1850），原奥尔良公爵，支持进步贵族团体，七月革命后加冕成为法国国王。

[5] 即卡尔·雅可比（Carl Jacobi，1804—1851），德国数学家。

[6] 即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Karl Friedrich Gauß，1777—1855），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大地测量学家，被认为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

[7] 约瑟夫·刘维尔（Joseph Liouville，1809—1882），19世纪法国数学家。

[8] 即安德鲁·怀尔斯（Andrew Wiles，1953— ），英国数学家，因证明费马最后定理获2016年阿贝尔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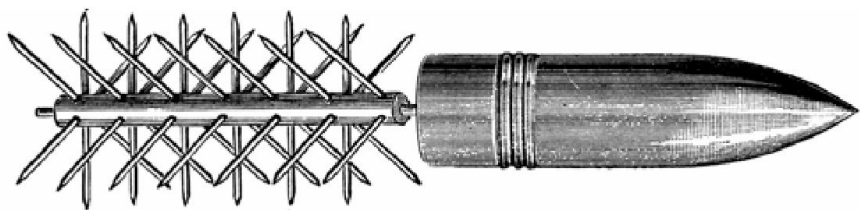
[9] 又称“费马大定理”，由17世纪法国数学家皮耶·德·费马（Pierre de Fermat）提出，历经300多年后，才由怀尔斯成功证明。

绞肉机
Picadoras de car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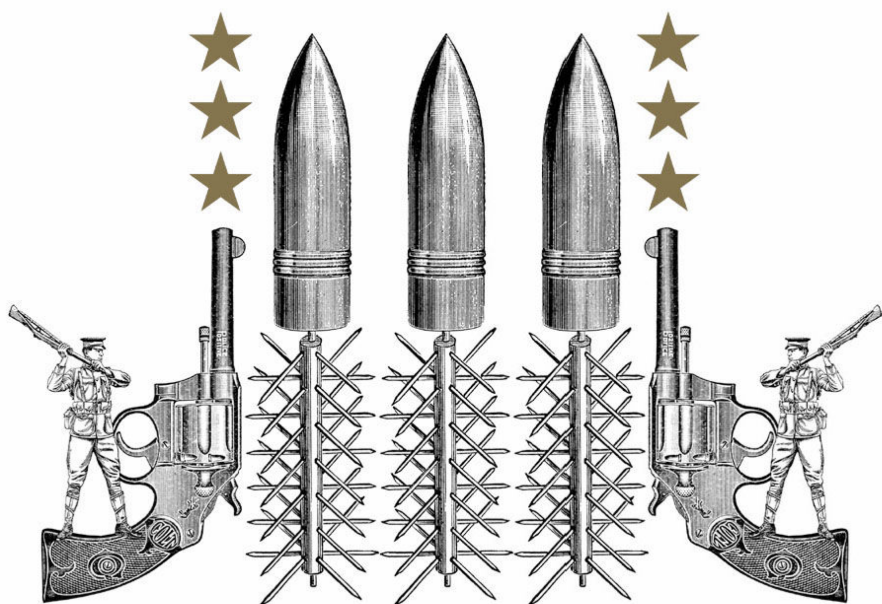


铁路和工厂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形态。现代战争的雏形初见于大革命时期，成千上万的民兵快速组成军队；随后是民族会战 [1] 中的兵力比拼；而最显著的变化则发生于美国的南北战争时期。在这场战争中，相隔不远的两军首府陷入荒谬的自相残杀，但也正是这场战争开创了使用现代交通大规模快速投送军队的先例：维克斯堡战役 [2] 与谢尔曼少将 [3] 的“向大海进军” [4] 之战都是其中的典范。

自20世纪初开始，战术与战略专家们集体陷入迷茫。谨慎的军事家们开始觉得，随着科技飞速发展，铜墙铁壁式的防御将变得坚不可摧，封闭敌军的阵型在军事进攻中已不再起效。布尔战争 [5] 的例子似乎证实了这个理论。莫德尔河战役、科伦索战役与马格斯方丹战役 [6] 的接连惨败，已经证实了若继续维持传统的三段式攻击阵型将会带来多么惨重的损失。不幸的是，军事家们很快又找到了一个足以推翻此论调的反例。日俄战争 [7] 汇集了现代战争的全部要素：以旅顺口海战和奉天会战为例，防守方固守战壕，用铁丝网和机枪巢构筑防御，战壕周边由地雷阵保护，并使用信号弹进行夜间照明；而进攻方则使用小口径的步枪和火炮快速射击，并辅以重型大炮及机枪火线。双方军队都使用电报通信，同时使用刺刀进行白刃战。



这场战争使“不计代价地进攻”理论再次盛行。日本军队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旅顺口和奉天的战场上，无数士兵的尸骨成就了日军的功名。



“胜利的桂冠来自与敌人短兵相接的厮杀，只有以命相搏，才能赢得战争。”福煦 [8] 说。汉密尔顿 [9] 也曾说过：“战争本质上必须取得胜利……士兵们不能仅仅躲在战壕的铁丝网后列阵布局，而必须有一种想要战胜更弱对手的信念。”

正是这种狂妄的理论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士兵大量伤亡。激进的进攻战术在普法战争 [10] 期间成效卓著，但伟大的德国军事战略家施里芬（Alfred von Schlieffen）却并不建议将其更广泛地投入实战。相反，他建议在第二波攻击时尽量分散火力，对敌人形成包抄之势。这个理论已近似现代的游击战争理念。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双方都因短视而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这场战争的伤亡可谓史无前例。尽管在战争开始的头两年，双方就已伤亡惨重，但在1916年的夏天，英国军队理论脱离实际的愚蠢行径达到了顶峰。在索姆河战役 [11] 中，英国军队

在30公里长的前线部署了1437架大炮，在1周内对敌方阵营发射了150万发炮弹，然而收效甚微。英军将领亨利·罗林森（Henry Rawlinson）在轰炸后称，德方阵地已成一片焦土，步兵队要占领敌方阵营将"如散步一样轻松"。可怜的步兵队将领听信他的误导，命令全军负重前进。这成了世界战争史上最惨烈的战役之一。德国部队的火炮完全没有受到轰炸影响，战力完好无损。逾两万名英国士兵在德军的炮火下丧生，占参与冲锋的前线部队总人数的一半。到了这个地步，任何一个神智正常的人都应该承认，己方已经失败了。然而，必须坚持进攻的极端理论扰乱了军官们的判断。这年的11月，当攻势终于结束后，已有50万名法军与英军士兵在战场上丧命。

在这场战役开始前，英国将军莫德[12]曾写道："军队真正的强大在于其整体能力，任何割裂都会造成损失，甚至可能导致战败……如果军队已经习惯于仅仅用数量去衡量士兵的生命，我们还有什么值得坚持的希望呢？"

[1] 即莱比锡战役，1813年拿破仑与沙俄、普鲁士与其他国家联军的会战。因参战国家和民族众多，亦称"民族会战"。

[2] 维克斯堡战役，1862—1863年发生于密西西比河畔维克斯堡，是美国南北战争的转折点。

[3] 即威廉·特库姆赛·谢尔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1820—1891），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北军将领之一。

[4] 由谢尔曼领导的萨凡纳战役的别名，是南北战争中的一场重要战役。

[5] 指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2），是英国与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之间的战争。

[6] 发生于第二次布尔战争中的3场战役。

[7] 日俄战争（1904—1905），日本和沙俄为争夺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的势力范围而发起的战争。

[8] 指费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1851—1929），法国陆军统帅，著有《作战原则》等军事著作。

[9] 指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5—1804），美国政治家、军人，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

[10] 普法战争，1870年普鲁士为统一德国，并与法国争夺欧洲大陆霸权而爆发的战争。

[11] 索姆河战役，发生在1916年7—11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

[12] 指弗雷德里克·斯坦利·莫德（Frederick Stanley Maude，1864—1917），英国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指挥美索不达米亚战役。

文字与荣誉
Palabra y honor



18世纪末，在法国大革命热潮的影响下，德国各邦国的联合体（即未来的德意志邦联 [1] ）开始努力推动犹太人的解放。正值改革最困难之际，拿破仑的兴起有如神助，促使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Federico Guillermo III）良心发现，同意进行改革。与此同时，德国各地也在呼吁推行法国式的现代法律，赋予公民平等权利。最终在1812年，各方达成协议，颁布了一项著名的决议，宣布普鲁士的所有犹太人享有与其他任何公民相同的权利，只有个别事项例外，如担任公职或在普鲁士的军队中担任高官等。犹太人可改姓德国姓，并作为公民登记。巴伐利亚、奥地利与萨克森各邦也相继颁布类似的法令，但都各有限制。

于是，到了1813年，腓特烈·威廉三世发表振奋人心的著名演说《致我的人民》（*An Mein Volk* ）之后，德国的年轻人热血澎湃，遍布全德的犹太人首次应征入伍，加入普鲁士军队，共同参与了莱比锡战役和滑铁卢战役的战斗。其中一项事迹尤其引人瞩目：一位名叫露易丝·格拉菲慕（Louise Grafemus）的女子为了寻找丈夫（她丈夫在与从俄国而来的法军交战时失踪），以寻夫为理由报名入伍，在柯尼斯堡的第二枪骑兵队服役，甚至升到军士长的军衔。她在战争中负伤两次，后来获得了铁十字勋章。



然而，战争胜利后，保守主义再度死灰复燃。很快，德国各地都开始呼吁回到原先的状态，尤其是在有些城市，由于之前入侵的法军赋予了犹太人公民权，因此反对的呼声尤为强烈。事情甚至闹到维也纳的国会，虽然普鲁士与奥地利希望推行改革，确保德意志邦联各州、各城市的所有公民都能享有平等的公民权，然而，眼见形势不容乐观，两邦国只得退而求其次：暂缓改革，先维持现状，保障犹太公民已经获得的权利。于是，邦联草拟了这样一条法令："信奉犹太教的居民在邦联各邦国

内已获得的权利可维持不变。”然而，当时不来梅有个狡诈的反犹政客参议员约翰·施密特（Johann Smidt）提出，有些犹太人可能会利用这一法令，将法国人授予他们的权利延伸到不属于莱茵邦联[2]的其他德国领土上去，并因此造成问题。因此，他提出对法令做一个简单的修改：将介词“在”改为“被”。于是，政府依照他的建议对法案进行了修正，最终颁布的法令变为：“信奉犹太教的居民被邦联各邦授予的权利可维持不变。”而事实上，所谓的“授予犹太人公民权利的邦”仅限于普鲁士、梅克伦堡[3]和巴登，但该法令却以此为依据，不再承认其他各邦及各城市由法国官员（而非德意志邦联各邦当局）赋予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在1817年6月7日发布的《马德里公报》中，还保留着当时汉斯·克里斯托夫·恩斯特·冯·加根[4]在法兰克福联邦议会上的发言：“当我为拿骚[5]公爵担任总理工作时，我曾试着逐渐改善犹太人的境遇，但很快我就意识到，他们只配得到严苛的对待。在本邦的犹太人都是一群恶毒而极度腐败的人。”

吕贝克[6]驱逐了住在城市附近的66户犹太家庭。这些犹太人拒绝离开，于是他们的店铺被关闭，财产被没收，随后他们被强行赶走。不来梅的犹太人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

迫于梅特涅[7]的压力，法兰克福没有驱逐犹太人。但他们被禁止参加集会、参与部分经营活动，犹太籍的公务员全都遭到解雇，有一段时间，他们甚至连结婚登记都不被允许。有人去求柏林法学院提供法律依据，著名的历史法学派创始人萨维尼[8]（此人曾因保有农奴而恶名昭著）却表示，国王授予的权利不是给犹太公民个人的，而只是给到各个城市。他甚至以此为借口，逼迫他们只能住在犹太人聚居区。犹太人百般辩解，甚至追溯到遥远的罗马帝国时代，那时他们还是自由民，仍然无济于事。

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情况也没有好到哪儿去。犹太人被要求只能待在特定的区域，并被禁止在蒂罗尔邦[9]以及波希米亚山区居住。在加利西亚与维也纳，犹太人被要求交一种特别的税。尽管当地只有200户常住犹太家庭，但还有1万名犹太人在此处短暂停留。依据法律，犹太人过境时可以在该地停留两个星期，超时需更新居住许可，但每次更新时都需要交税。而在普鲁士，虽然1812年颁布的公民权法依然有效，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经历了各种调整。

最终，到了1819年，德国多个城市爆发了针对犹太人的犯罪及袭击事件，后人称之为“欧洲反犹暴动”。此时距离犹太人在军队中浴血奋战、共同抵抗拿破仑的侵略才过了仅仅四年。

[1] 德意志邦联，指1815年德意志各邦组成的联盟，设有邦联议会，以奥地利帝国代表为主席，组织松散，各邦保有完全的主权。

[2] 莱茵邦联，1806—1813年期间位于德意志地区的政治实体之一。

[3] 梅克伦堡，位于德国北部的一个历史地区，大约为今日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西部。

[4] 汉斯·克里斯托夫·恩斯特·冯·加根（Hans Christoph Ernst von Gagern，1766—1852），德国政治家、政治评论家。

[5] 拿骚，在历史上是神圣罗马帝国中的一个日耳曼联邦州国，位于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1866年被普鲁士王国兼并。

[6] 吕贝克，位于德国北部波罗的海沿岸，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州的第二大城市。

[7] 即克莱门斯·门第尔·冯·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1773—1859），德意志官宦世家出身的奥地利政治家，也是他所在的时代最重要的外交家之一。

[8] 即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1779—1861），德国著名法学家和国王顾问。

[9] 蒂罗尔邦，位于奥地利西部地区。

独裁者
Autócratas



2016年发生在土耳其的政变及反政变，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反对世俗化的保守派与更追求进步的一派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根源则可追溯至土耳其“国父”阿塔图尔克 [1] 一手缔造的民族辉煌时刻。当时，阿塔图尔克创立了土耳其共和人民党，使之成为全国唯一的党派；社会各界必须无条件服从“国父”的意志。阿塔图尔克大力弘扬土耳其的民族主义精神，并强迫土耳其人“振兴”一种新型的土耳其语（其中充斥着以法语为词源的新词，却删除了许多源自阿拉伯与波斯词源的用语），强行推广小学义务教育，同时一边取缔苏菲派，一边强力推行世俗化。众多希腊人、库尔德人和土库曼籍的什叶派穆斯林因此丧命。

2011年爆发的叙利亚内战中多少也出现过类似的矛盾。这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很明显，如果不投入足够的资源、冒一定的风险，是很难制止敌对双方在战争中的犯罪行为的。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为了实现追求进步的良好愿望，掌权者有时选择付诸暴力，而这却与其本意相冲突。



这让我们不禁联想到了彼得大帝 [2] 的事迹。作为一个沙俄皇帝，他的治世之道伴随着恐怖。1682年，彼得的兄长费奥尔多三世（Feodor III）驾崩后，彼得由波雅尔 [3] 们推举为沙皇。之后不久，他的姐姐索菲亚·罗曼诺夫 [4] 煽动射手卫队叛变。当时，沙皇和女摄政王的母亲娜塔莉·纳雷什金娜（Natalia Naryskhina）曾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阳台上紧紧拥抱彼得和他的兄弟伊凡（Iván，伊凡本应继承王位，但因体弱多病而不受认可），以此安抚反叛军。在这场叛乱中，彼得亲眼看见了女

摄政王的保护者和叛乱的煽动者阿特曼·马特维耶夫[5]如何忠实地执行主人的严苛命令，残酷地大肆杀戮。射手卫队将贵族们挑在长矛上，直接从窗口扔出他们的屋子。

政变之后，彼得成了他姐姐的傀儡，远离权力的中心。他曾隐居在莫斯科郊区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村，只能以玩模拟战争游戏为乐。在那里，他建立了自己的少年兵团，还认识了他的第一个荷兰朋友，由此开始对西方文化产生兴趣。

有一次，彼得听说了一起想要谋杀他的阴谋，决定发动政变。恰逢女摄政王索菲亚因攻打克里米亚公国的错误决策而声誉下滑，彼得得以顺利夺回王位。自此以后，他的权势再无可撼动。

彼得喜欢西方文化，尤其迷恋造船术。他的好友中包括一个苏格兰人帕特里克·戈登（Patrick Gordon）和一个日内瓦人弗朗茨·莱福特（François Lefort）。在他21岁时，这两人曾陪着他去海边疗养，这也是彼得第一次见到大海。然而，美丽的大海并未治好彼得当时突然染上的霍乱，也没有治好他从童年时代开始就一直深受其苦的痉挛症。有一句俄罗斯谚语说："接近沙皇就是接近死亡。"这话用来形容彼得一点不错。他会因为饮酒时别人喝得没有他多而大开杀戒。在他举办的宴会上，他常会叫来几十个侏儒给大家助兴。在有些晚宴结束时，他会让这些弄臣们假扮一场热闹的婚礼。侏儒们骑在山羊或猪的身上，打扮成猫或松鼠供宾客取乐。

然而，彼得的这些胡作非为在历史记录中被刻意淡化了。谈到他，人们的第一印象是一名崇尚科学、对西方文化采取开放态度的开明沙皇。彼得不仅仅只对造船感兴趣。他还会以扮演医生为乐，并积极参加尼古拉·比德卢[6]的解剖课，说服他为沙俄建造第一家医院。他的欧洲之行十分出名，瑞士、德国、荷兰和英国都曾留下他游历的足迹。一开始，他试图使用一个假造的身份匿名旅行，这样他就可以实现自己的那些奇思妙想（比如跑去荷兰赞丹学习造船），但很快，所有人都发现了这个身材不太匀称的高个子其实就是统治整个沙俄的沙皇。在英国的德普特福德，一位倒霉的房东曾惊恐地描述她的房子被这群俄国人糟蹋成了什么样儿：门轴被扯下，到处都是火烧的痕迹，油污和墨水溅得四处都是，画布被撕成了碎片。

彼得大帝回国后开始进行改革：他亲自剪掉了朝臣们的胡子，裁掉他们的袖子和长袍的下摆。从此以后，传统的服饰打扮被明令禁止。他要求女性穿法国式的衣裙，并命令俄罗斯贵族在宴会结束时跳加亚尔德舞和加伏特舞。和阿塔图尔克一样，他赋予适龄女性更多权利，并禁止包办婚姻。

面对改革，国内当然会出现反叛的声音。但叛变的苗头都被军队镇压了。改革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尽管过程中也免不了要活埋几个顽固分子，或者给几个贵族打上烙印。监狱里塞满了被割去鼻子、挖掉眼睛

或拔掉舌头的囚犯。

之后，彼得大帝下令建造圣彼得堡。这位独裁君主所选的首都位于一块沼泽地上，他从全国各地强征苦役（包括俄罗斯人、芬兰人、爱沙尼亚人、鞑靼人、卡尔梅克人等），并禁止圣彼得堡之外的任何地区造新的石制建筑。数万人在建都工程中丧命。

彼得大帝的亲生儿子阿列克谢（Alexei）曾卷入一场保守派的叛变，彼得亲自下令刑讯，并最终处决了他。

彼得大帝在52岁时驾崩，传说他临死前还做了一项英勇之举：在严寒的冬日里救回了几艘沉船。

据称，彼得大帝在他统治期间推行经济改革、鼓励商贸发展，并大力发展工业及矿业以推动城市建设。他发明了新的土地开发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妇女更多自由权利。但许多关于他的事迹仅仅来自传说，而独裁者们篡改历史以粉饰自己的事例可是屡见不鲜的。

[1] 即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1881—1938），土耳其军事将领、改革家、作家，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总理及国民议会议长。“阿塔图尔克”意为“土耳其人之父”，该称号由土耳其国会授予。

[2] 即彼得一世·阿列克谢耶维奇·罗曼诺夫（Peter Alekseyevich Romanov，1672—1725），沙俄皇帝。在位期间力行改革，使沙俄现代化，人称彼得大帝。

[3] 波雅尔，沙俄的一个贵族阶层，地位仅次于王公。此阶层后被彼得大帝废除。

[4] 即索菲亚·阿列克谢耶夫娜（Sophia Alekseyevna，1657—1704），沙俄罗曼诺夫王朝的公主，彼得大帝的异母姐姐，曾任女摄政王。

[5] 阿特曼·马特维耶夫（Artamón Matveyev，1625—1682），沙俄政治家、外交家，曾任射手卫队统领。

[6] 尼古拉·比德卢（Nicolaas Bidloo，约1673—1735），荷兰医生，曾任彼得大帝的私人医生。他是沙俄第一家医院的负责人，也是沙俄第一所医学院的校长，被认为是俄罗斯医学的奠基人之一。

虫子的美食

Carne para los gusanos



1762年7月

历史上的这一刻，叶卡捷琳娜成功地夺取了国家政权，而她的丈夫沙皇彼得三世（Peter III）听说士兵叛变的消息后泪流满面。他的反应并不令人意外：毕竟，这个男人曾在喝醉后让自己妻子的情人当着一群士兵的面，在医生的帮助下给自己做割包皮手术。叶卡捷琳娜与彼得三世结婚后的头几年，只能陪丈夫在床上玩木制士兵，但后来她怀孕了。据说直到这时，彼得三世才与他的皇后同床共寝。政变之后，彼得三世失去了皇位。

政变成功后，叶卡捷琳娜穿着一身士兵的装束，骑上她的马向圣彼得堡进发。她发现自己的佩剑少了一条剑柄带，这时一个年轻的士官跑上来，把自己的带子递给了她。此人身材高大，名叫格里高利·波将金[1]。

1791年10月

波将金是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前情人、塔夫利宫的亲王、克里米亚的征服者、城市的建造者。他曾用纸板建造了虚假的村庄，日后撒克逊人还根据这个典故发明了“波将金村庄”[2]一说。这位权倾一时的宠臣在这一年失了势。叶卡捷琳娜女皇带着欧洲各国的大使和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José II）拜访克里米亚，还带来了一位年轻的新情人：一个名叫

普拉登·祖波夫 [3] 的后起之秀。与他的前辈们一样，这位新情人不满足于仅仅在夜晚取悦女沙皇，他也想获得权势。波将金为了重获女王的宠爱，组织了一场奢靡至极的宫廷盛宴，花了将近50万卢布。这场盛宴成了他的绝响，之后他被派遣到了南方。在那里，他自以为还掌控着权势。当他发现自己的继任者在与土耳其密谋不合他心意的和平协议时，气得又是斥责又是威胁要惩罚，但最终他发现，对方是在依据叶卡捷琳娜女皇的秘密授权行事。



于是，波将金决定放任自我，但求一死。他疯狂地暴饮暴食，发烧了也不治，就叫人把他浸在倒了古龙香水的冷水中退烧，之后继续大吃大喝。他命令备好马车，出发前往一个位于布格河河口的名叫尼古拉耶夫 [4] 的小城（没人知道为什么）。他的侄女和前情人亚历山德拉（Alejandra）陪他同行，一起去的还有1位医生、3个秘书和1支哥萨克护卫队。

马车在草原上一路颠簸，令病人感到无法承受。走了几公里之后，波将金下令停车。他说他想躺在地面上死去。他在路边的一棵树下铺了一块毯子，躺在上面望着天空。他在中午时分停止了呼吸。有人想讨一枚金币盖住他仅存的那只眼睛（当还是中士时，在与奥尔洛夫兄弟 [5] 的一次斗殴中他失去了一只眼睛）。一位哥萨克人在他的口袋中发现了一枚五戈比 [6] 的铜币。

[1] 即格里高利·亚历山德罗维奇·波将金（Grigory Aleksandrovich Potemkin，1739—1791），沙俄军事领袖、政客、贵族，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著名情人之一，曾任克里米亚总督。

[2] 1787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出巡克里米亚途中，波将金在第聂伯河两岸布置了可移动的虚假村庄来欺骗女王和随行的大使们，打造富足的假象。

[3] 普拉登·祖波夫（Platón Zúbov，1767—1822），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最后一名情人，一度曾成为沙俄最有权势的人。

[4] 尼古拉耶夫，位于乌克兰西南部，南布格河沿岸。

[5] 奥尔洛夫兄弟，来自沙俄奥尔洛夫家族，曾策动推翻彼得三世的政变，并因此被授勋加爵。

[6] 1卢布＝100戈比。

外交官

Dip lomá ticos



1940年的夏天，纳粹所带来的恐怖正在整个欧洲蔓延。在立陶宛，许多犹太人请求荷兰领事扬·兹瓦滕迪克（Jan Zwartendijk）给他们发放逃亡时所需要的签证。于是兹瓦滕迪克书写了一份官方声明，他表示，持有该声明的犹太人可以合法地入境荷属安的列斯的库拉索岛。当时确实有这样的规定：入境时可以不带护照，但需要出示当局的官方证明。兹瓦滕迪克签发了数千份这样的证明，这些证明，包括后来复制和伪造的证件，帮助了许多犹太人成功逃亡。出乎意料的是，这项壮举中还有一位日本领事的功劳——在这一年的7月中下旬，日本驻考纳斯[1]外交官杉原千亩（Chiune Sugihara）向日本政府请求了3次签证许可未果后，自作主张地为犹太人签发了近万份过境签证。他亲自准备这些签证，没日没夜地狂热工作到最后一刻。直到他离开立陶宛的那天，他还从已经发动的火车窗口中扔下许多印有领馆印章和他本人签名的空白文书留给犹太人。

这位日本外交官事后曾这样解释自己的伟大行动："犹太人也是人，他们需要帮助。"

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熟知复杂的国际法律规则的外交官们，在这一时刻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卓绝的行动：他们不接受任何借口，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制度漏洞，充分发挥自己有限的职权，有时甚至不惜造假欺瞒，只为坚守世间正义。他们为了弘扬正义而造假撒谎，世间很少有比这更伟大的谎言了。这些外交官们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希拉姆·“哈利”·宾厄姆四世（Hiram “Harry” Bingham IV），美国人。1940—1941年曾任驻马赛副领事。他对法国当局的命令置之不理，数千名犹太人因此而获救。

何塞·阿图罗·卡斯特拉诺斯·孔特拉斯（José Arturo Castellanos Contreras）是萨尔瓦多驻日内瓦的领事。他曾签发了约1.3万份假身份证，挽救了众多保加利亚籍、捷克籍、斯洛伐克籍、匈牙利籍、波兰籍及罗马尼亚籍犹太人的性命。

乔治·费迪南德·达克维兹（Georg Ferdinand Duckwitz），德国人，曾任驻哥本哈根大使。当他得知丹麦的犹太人即将被送往集中营的消息之后，他及时联系了瑞典政府和丹麦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成功帮助数千名犹太人逃亡。

弗朗西斯·爱德华·弗雷（Francis Edward Foley）的真实身份是一名英国间谍，不过他的官方职务是英国驻柏林大使馆的护照检查官。他所签发的假护照帮助近万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逃离德国。



保罗·格吕宁格（Paul Grüninger），瑞士警察，曾负责圣加仑的边防。德奥合并事件后，奥地利被希特勒政权吞并，他为犹太人伪造了数千份官方文书与瑞士签证，并将签证签发日期全部改到1938年3月以前，来帮助犹太人合法地进入瑞士。此事被德国人发现后，他在1941年遭到罚款并被解雇。格吕宁格最终在贫困潦倒中死去。

君士坦丁王子让·拉斯·安东尼·德米特里乌斯·卡拉贾（Jean Lars Anthony Démétrius Karadja），罗马尼亚人。他是一名律师和藏书家，通晓多种语言。1933—1934年，他曾在罗马尼亚驻柏林领馆担任公职。他坚持主张国际人道主义法律，不断地与自己的政府抗争，并联合各国驻罗马尼亚使领馆共同保护遍布欧洲的罗马尼亚籍犹太人。他的行动拯救了数千人的生命。

路易斯·马丁斯·德·索萨·丹塔斯（Luiz Martins de Souza Dantas），巴西驻巴黎大使。他曾发放了数百份签证，上面故意隐去护照所有人的种族信息，并假造了日期，帮助许多犹太人逃亡至巴西，躲过一死。

爱德华多·普洛佩·德·卡耶洪（Eduardo Propper de Callejón），西班牙驻巴黎大使馆的首席秘书。在法军战败后，他和其他外交人员一起逃离了巴黎。他来到波尔多，发现当地领馆的西班牙领事业已逃走，领馆也已经被关闭。于是，他在未获任何官方授权的情况下重开领馆，在4

天时间中大量发放签证。随后，他又到维希[2]领馆继续发放签证。他所拯救的人数没有准确的数字，但据信有数千人。

塞巴斯蒂安·罗梅罗·拉迪加莱斯（Sebastián de Romero Radigales），西班牙驻雅典总领事。在萨洛尼卡[3]被摧毁后，他拼命工作，克服重重阻碍，从当地救出近千名塞法迪犹太人。

阿卜杜勒·侯赛因·萨尔达里（Abdol Hossein Sardari），伊朗驻巴黎领事馆总管。按照纳粹的愚蠢“逻辑”，波斯人被定义为雅利安民族，因此纳粹德国将伊朗人视作自己的精神同盟。萨尔达里利用这套理论，保护了数千名伊朗籍与非伊朗籍的犹太人。他为这些犹太人提供假护照，甚至为他们编造了一个种族，称这些人是“波斯雅利安族”，其祖上最早可追溯至居鲁士大帝[4]时期摩西的追随者。和许多其他例子一样，我们不知道他具体共挽救了多少犹太人的生命。

何凤山，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无视自己的上司、中国驻柏林大使给他的命令，为犹太人发放了数千张前往上海的签证，帮助许多犹太家庭逃离了奥地利。

1944—1945年，各国驻布达佩斯的外交官曾为拯救犹太人共同行动，一时传为佳话。这些外交官包括：瑞典大使馆的首席与次席秘书拉乌尔·瓦伦贝格（Raoul Wallenberg）与佩尔·约翰·瓦伦丁·安格尔（Per Johan Valentin Anger），瑞士副领事卡尔·卢茨（Carl Lutz），西班牙商务负责人安吉尔·桑斯·布里兹（Ángel Sanz Briz），葡萄牙大使及商务负责人卡洛斯·德·阿尔梅达·丰塞卡·桑帕约·加里多（Carlos de Almeida Fonseca Sampaio Garrido）与阿尔贝托·卡洛斯·德·利兹特谢拉·布兰奎尼奥（Alberto Carlos de LizTeixeira Branquinho），以及罗马教廷驻布达佩斯大使安吉洛·罗塔（Angelo Rotta）。这些外交官通过发放临时护照、开具国籍申请证明、提供保护护照等方式，挽救了成千上万匈牙利犹太人的生命。他们在许多不合法的文书上签字盖章，并不断更新序列号以防超过他们被授权的签证数量。这些国家的大使馆还在布达佩斯及其周边地区紧急购买或建造了许多房产为犹太人提供庇护，因为使馆名下的房产会被视为外国领土。这些外交官十分勇敢，其中一些人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亲自登上开往集中营的火车，将犹太人救下车。

这里援引的只是寥寥数例。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也参与了拯救犹太人的行动：除了外交官以外，还有他们的家人、合作伙伴以及使领馆的普通职员们。许多人已默默无闻地死去，历史上甚至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

在这之中，有些人的行动比其他人要冒更大的风险。有些人因此被处罚、被停职，有些人则幸免于难。有些人听从政府的指令办事，另一些人则在无人指示的情况下行动，甚至是公然抗命。当然，这些人的个人经历并不个个完美。毕竟，这不是一篇圣徒的传记，但我们依然能从中感受到人性的光辉。

[1] 考纳斯，立陶宛第二大城市及旧都。

[2] 维希，1940—1944年间被纳粹德国扶植的维希法国政权的实际首都。

[3] 萨洛尼卡，又名塞萨洛尼基，希腊第二大城市。

[4] 指居鲁士二世（Cyrus II，约公元前600年或576年—公元前530年），波斯帝国的创建者，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第一位国王。

纯属必须
Pura necesidad



1554—1555年，斯坎纳嘉露河一战 [1] 以来，意大利锡耶纳遭到敌军重重包围。当时，负责防守锡耶纳的军官是一个名叫布莱斯·德·蒙吕克 [2] 的法国人。此人在晚年时曾写过一本回忆录《评述集》，在回顾个人经历之余，也详细记录了他所参与的各场战役，并因此而成名。

那是一个更残酷相对也更简单粗暴的年代。在《评述集》中，蒙吕克为我们全面介绍了他曾参与的不同战争，并回顾了这些战争的起因（包括某些宗教因素）。但无论发起战争的借口为何，我们都知道，每场战争的背后都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目的，而非仅仅出自大义。这不完全是一件坏事：至少能让我们相信，人类自相残杀的背后有着更具体的实际目的，而不仅仅只是出于对某些虚无缥缈的理论的妄信。

之前说过，1554年时，蒙吕克率领着一支由法国人与锡耶纳人组成的军队，负责锡耶纳城的防守。当时，城池已经被托斯卡纳人、西班牙步兵团以及瑞士和德国的雇佣兵团重重包围。城内的食物逐渐出现短缺，于是蒙吕克找到市政议会，命令那些官员“必须将只吃饭不干活儿的人都清除到城外”。被驱逐者的名单中自然不会包括市政厅官员及其家属，因此没人对他的命令表示反对。但将哪些人定义为“无用之人”显然还是一个难题。为解决这个问题，蒙吕克额外成立了6支“警备队”，专门负责审核每个人的贡献，以判断城中哪些人是“没有用的”。最后，这些警备队列了一张足有4400人的“冗余人员名单”。对于这件事的本质，

蒙吕克自己在书中也表示："我从未见过比这更凄惨、更悲凉的场景，以后也再不想见到了……这些可怜人被赶出城外，他们的面前就是敌军的部队。"



蒙吕克虽然下令将这些人赶出城外，但他清楚地知道他们势必会被敌军再次赶回来。守城部队日夜警戒，以防被赶出城外的人翻过围墙，要挟城内的同胞给城墙脚下的饥民投掷食物，导致城内补给短缺。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寥寥无几。被赶出城的"废物"们（我们还能怎么称呼他们呢）开始在无人的荒野中挖草根吃，以期能多苟延残喘个一两日。有些年轻的女子靠卖淫维生，只有少数人乘着夜色成功逃走了。这群人就这样过了8天，没有水也没有食物，尸体逐渐堆积成山。最后剩下的那一小批人，最终不是被乱箭射死，就是被从城墙上抛下而丧生。根据蒙吕克的估计，仅大约1/4的人成功逃亡。

在回忆录的最后，他写道："这就是战争的规则。有时候，为了动摇敌人的士气，我们不得不做出残酷之举。仁慈的上帝会怜悯我们的战士，也会宽恕我们不得不为之罪。"

然而，锡耶纳最终依然陷落了。到它投降时，原本有4万人口的城内已经只剩下大约6000人。蒙吕克却受到敌人的尊重，回到法国后，还因此战而被授勋。

[1] 斯坎纳嘉露河战役，即玛西亚诺之战，1551—1559年发生在意大利的一场战争。

[2] 布莱斯·德·蒙吕克（Blaise de Monluc，1502—1577），法国元帅，以其卓越的军事技巧和自传体战争回忆录《评述集》（*Commentaires* ）而广为人知。

美洲
AMÉRICA

可敬之人
Hombres respetabl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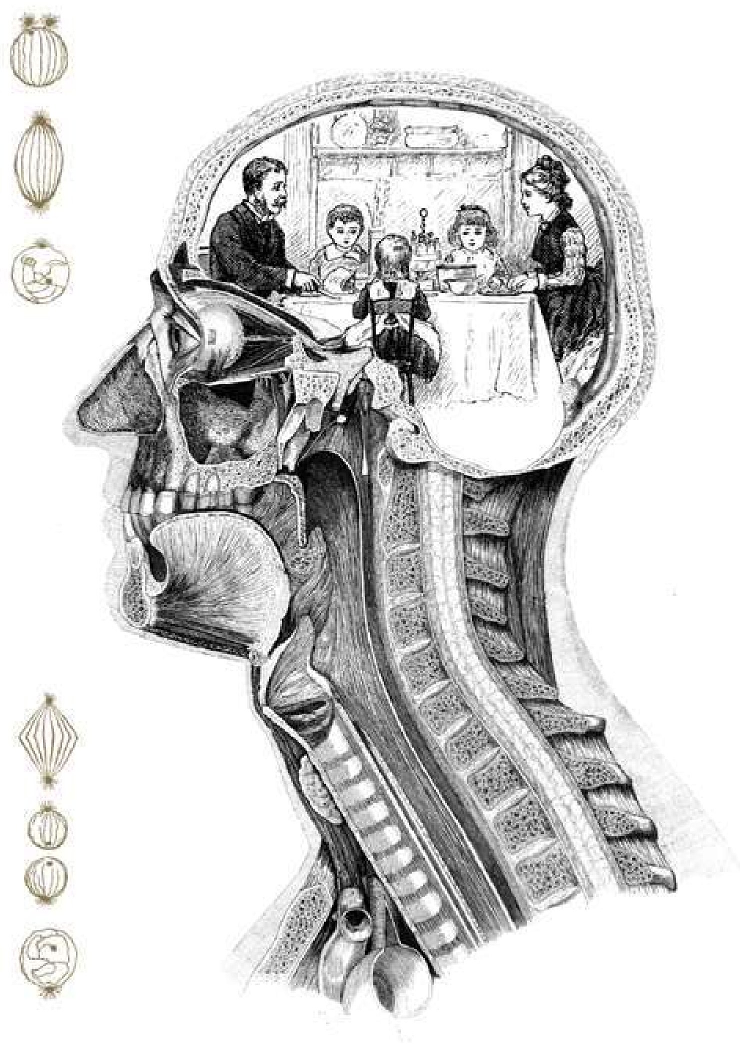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坚信人类是由地上的盐化成的。这类保守、傲慢的态度甚至让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受到了影响，面对这些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的人，他们即便知道理在己方，也宁可让迷信与傲慢蒙蔽双眼。

当时，有个倒霉的年轻人名叫克劳森（Clawson），是印第安纳州一座监狱里的囚犯。他自12岁以来就有手淫的习惯，而且不能自控。这是一种疾病——至少在他的医生亨利·C.夏普（Harry C. Sharp）看来是这样。医生毫不犹豫地判断克劳森精神堕落，并以过度手淫为理由，诊断他是一个智障者。根据诊断结果，克劳森被强行实施了输精管结扎手术。

强行绝育是狂热的选民们自发选择的结果。1970年，印第安纳州通过了第一部强制绝育法令，该法令规定，犯罪者、智障者、有暴力倾向及智力低下者都应被强行绝育。此后，几十个州都发布了类似的法令，

6万美国人因此被强行绝育。而该法令所依据的所谓“科学的判定标准”，却恰恰只反映了当时种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偏见。



“优生学”一词最早由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加尔顿[1]提出。加尔顿热衷几何学，坚信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他甚至提出过用三角丈量法判断黑人臀部大小的方案。他还从科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试图证明是祈祷延长了英国历代国王的寿命。美国这样一个现代化、系统化的国家迫切

需要全新的理论支持，因此，加尔顿的理论大受欢迎。然而，加尔顿不过是用统计学和图表，将一些陈旧的观念重新包装了一下而已。但在这个如此分裂的国度中，白手起家的美国人却热情地接受了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把戏。

举例来说，亨利·戈达德[2]曾经给美国人讲过一个“柯克里克家族”的故事来论证优生学的必要性。柯克里克家族有两个分支，祖上是同一个人。这位名叫柯克里克的祖先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曾经当过兵，当时他合法的妻子为他生育的后代体面而受人尊敬；而在军队服役时期，他在一家小酒馆中酒后乱性，和一位妓女生下的后代，日后全都成了酒鬼和罪犯。美国最高法院在通过绝育法案时，就是引用了这个家族的例子作为理论依据。大法官奥立弗·温德尔[3]曾说过：“痴呆传3代已经足够了。”这是美国最高法院司法史上最黑暗的几页之一。

戈达德通过智力测试来验证自己的理论。他曾警告当时的美国人：美军士兵半数都有智力障碍问题。当然，他不会承认自己的结论都是基于种种荒谬的评测而得出的，例如这种问题：

“祖鲁人有几条腿？”

a）2条；b）4条；c）6条；d）8条

从这种问题可以看出，戈达德才是脑子有问题的那个，或者至少是个骗子。但当时似乎没人介意这一点，甚至在他发布了一个神奇的报告，声称埃利斯岛[4]上80%的移民都是智障者时，也没有遭到任何质疑，甚至没有人提出过他的测试都是用英语写的，而移民未必懂得英语。也许他是受了丹麦语言学家奥托·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的启发：叶斯柏森宣称英语是一门阳刚的语言，适合心智成熟的人；而热带国家的语言则过于柔弱、幼稚。他们从中得出的结论是，语言如此，人种亦然。

冷泉港实验室[5]如今是一个声望极高的科研机构，但当年在查尔斯·达文波特[6]掌权的时代，这个机构曾狂热支持血统论和优生论。当詹姆斯·沃森[7]1968年接管冷泉港实验室时，他还能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找到德国纳粹的种族主义书刊《种族和社会生物学档案——包括种族与公共卫生》。在20世纪后期，冷泉港实验室一边进行先进的生物医学研究，一边将这些文件分类整理并公开展示。感谢该机构的贡献，我们如今才能看到那个可耻的时代所留下的种种档案证据。

达文波特的行为其实相当幼稚，却成功贬低了包括造船师、音乐家在内的许多高知家庭，这种成功之巨大令人匪夷所思。他认为女性更适合做社会工作，因此招募她们来做数据处理工作。他精挑细选的女员工都是白人血统，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身强体壮，但工作时长不得超过3年，因为实验室认为这些女人最重要的义务是之后回归家庭，为种族传宗接代。达文波特自己也结婚生子，他的孩子们仿佛一群“小达文波

特”，和他一样有着宽阔的额头，目光坚定。

从母系社会到当今社会，人类始终追求着同一个目标：扩大优生学的信仰。就像最壮的猪、乳汁最多的牛在市场上最受欢迎一样，如今，新生儿和纯洁的家庭关系最受社会的褒奖。

对移民的限制法案就是这种集体疯狂的产物。艾奥瓦州一位牧师的儿子哈里·拉夫林[8]没有子承父业，而致力于在国会上说服立法者相信，他的研究证明南欧移民的智力普遍偏低。有时候他的数据无法证明这一点——比如犹太人通常都很聪明；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根据种族的不同，将人分为三六九等。除了按种族分高下以外，他还将智力障碍者、犯罪者、癫痫病患者、肺结核患者和畸形儿都划入了低等的范畴。

1936年，拉夫林曾到海德堡访问，并在当地大学接受荣誉称号：他被誉为“最有远见的美国种族政策制定代表”。

[1] 弗朗西斯·加尔顿（Francis Galton，1822—1911），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

[2] 亨利·戈达德（Henry Goddard，1866—1957），美国心理学家，优生学的早期倡导者。

[3] 奥立弗·温德尔（Oliver Wendell，1841—1935），美国著名法学家、最高法院大法官。

[4] 埃利斯岛，纽约市曼哈顿区的一个岛，在1892—1943年是美国主要的移民检查站。

[5] 冷泉港实验室，一个非营利的私人科研与教育中心，建立于1890年。

[6] 查尔斯·达文波特（Charles Davenport，1866—1944），美国著名生物学家、优生学家。

[7] 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1928— ），美国分子生物学家，1968—2007年曾任冷泉港实验室主任。

[8] 哈里·拉夫林（Harry Laughlin，1880—1943），美国教育学家、优生学家和社会学家，是推进强制绝育立法的活跃分子之一。

黄金国
Eldorado



当冈萨罗·希门内斯·奎萨达（Gonzalo Jiménez de Quesada）第一次踏上圣玛尔塔 [1] 的土地时，这里还是一座全新的城市，教士与地痞、印度人与黑人不断涌入，为寻找财富而来，挤满全城。奎萨达是一名摩尔人法官的儿子，他一心追求冒险与财富，曾在塞萨尔·卡洛斯（César Carlos）麾下军队征战多年，参与过意大利战争，在帕维亚 [2] 战役中迎击法军。作为奖赏，佩德罗·费尔南德斯·德·卢戈 [3] 任命他为新格拉纳达 [4] 的高级司法官员。

1536年，奎萨达说服他的赞助人支持他组建了一支750人的探险队出发寻找传说中遍地是黄金的“黄金国”。这支远征军乘坐双桅帆船，自玛格达莱纳河溯流而上。自然，他们对摆在眼前的困难一无所知：他们要穿过的是一片蛮荒之地，气候恶劣，冬季环境尤为严酷。在他之前，费尔南德斯·德·卢戈直到离世，旗下也只有两艘船到达过目的地。而奎萨达因为性格固执，坚决不肯半路打道回府，最终才成功地在史上留名。这群西班牙人用砍刀开路，缓慢地穿越雨林，一路上他们只得以自己的马匹为食，到最后甚至吃起了树根和蟾蜍。队伍行进超过1000公里，受疾病、饥饿和热带雨林恶劣环境的影响，人员死伤过半。经过4个月地狱般的艰辛跋涉，他们终于抵达了拉托拉（该地区后被命名为巴兰卡韦梅洛 [5] ）。其中的70名远征队员决定继续向前行进，进入齐布查人 [6] 所居住的高原地区。这段路途依旧不顺利，队伍饱受饥饿困扰，甚至吃起了马缰绳，还吃掉了一条癞皮狗；同时，由于河水涨潮，他们不得不睡在树丛当中。回到营地后，奎萨达打发病得最重的150多人乘船返回圣玛尔塔，然后带着剩下的166人继续向高原进发。



齐布查人的族群分为5个部落，每个部落有自己的王国和酋长。眼见好事将近，奎萨达提前自封为将军。接着，就是常见的与印第安人厮杀的戏码，只不过与平常不同，这次殖民者军队和印第安人用的是一样的武器：他们的刀剑早就氧化了，火绳枪也只够救急。为防止军队溃散，奎萨达已然形同独裁者一般，一边对部下承诺未来的种种好处，一边毫不留情地处决逃亡的士兵。在混战中，齐布查人首先发起攻击。他们不断派小股部队袭击后方，然后撤兵，重复着这种游击战术。西班牙人以相同的游击战还击，边打边四处劫掠。他们所袭击的印第安人领地富饶昌盛，遍地都是宝石。

1537年8月20日，奎萨达的军队俘获了齐布查族的一位重要酋长，开始疯狂敛财。与此同时，他还开始积极介入当地政治，支持一些部落去攻打另一些部落，并从每次内斗中获益。

奎萨达开始考虑回国的事，但前方总有数不清的新土地和财宝等着他去征服。

***

德国韦尔泽家族也是美洲远征军的赞助方之一，他们以投资换取在新格拉纳达的种种权益。他们赞助的其中一位冒险家名叫豪尔赫·霍赫穆特（Jorge Hohermut），又名埃斯皮拉的豪尔赫（Jorge de Espira，埃斯皮拉是他的出生地），他手下还带着一位名叫尼古拉斯·费德曼（Nicolás Féderman）的军官。1536年，这支远征军在欧皮亚河沿岸扎营，结果遇到了河水涨潮。费德曼和他手下的士兵们（以西班牙人为主）不得不像野兽似的爬到树上或者逃到小山丘上以躲避上涨的河水。结果，欧洲侵略者、当地印第安人和雨林中的野兽在一片洪水中狭路相逢，为了争夺有限的生存空间，三方大打出手，其中欧洲人在数量上最

不占优。为了逃生，远征军想到用绳子扎起木筏，但木筏被潮水阻挡未能顺利突围，反而被印第安人的小舟重重包围了。在许多侵略者的历史轶事中我们都只知道当事人的名字，此处也不例外：根据历史记载，有个名叫弗朗西斯科·卡萨勒斯（Francisco de Cáceres）的欧洲人被包围后被迫跳入水中潜水逃生，遭到了当地印第安人的耻笑。

1537年12月，费德曼也开始向齐布查人的领地进军，但不幸的是他们搞错了路线。远征军原以为只要向着南方前进就能绕过那些山，但结果，他们必须策马跳过悬崖才能到达目的地。

历经种种艰辛困苦并独排众议，费德曼终于带领远征军到达了高原地区。

***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塞巴斯蒂安·德·贝拉尔卡萨尔 [7] 奉皮萨罗 [8] 之令，刚刚攻占了基多 [9] 地区，开始将注意力转向黄金国的传说，他领军向北，打算大赚一票。他们一路征战帕蒂亚山谷的食人生番，聚集财富，之后回到利马申请资助，准备补给和装备。1539年7月，这支远征队开始向着群山出发。

经过6个月的艰苦跋涉，这支队伍也抵达了萨万迪哈河与玛格达莱纳河的交汇处。

***

现在让我们再回头看看奎萨达这边。此时，他已经占领了齐布查人最重要的一块疆域，即今日的波哥大地区。当地的领袖被称为“泽巴”，末代泽巴扎克萨泽巴（Zaquesazipa）当时已被奎萨达俘获。为保国王性命，齐布查人每天派脚夫将财宝源源不断地送到奎萨达手里，但与此同时，泽巴的亲卫队则暗中将财宝从堆放赎金的茅屋里偷偷运走。这个把戏后来被奎萨达发现了，盛怒之下，他将齐布查的这位泽巴折磨致死。

在横行劫掠的同时，奎萨达开始对当地进行殖民工作，他在海拔3000米的高原上建立了圣菲波哥大城 [10] （成立初年曾被命名为“希望圣母城”），从城中俯瞰，可以看见远处覆盖着白雪的群山。建城数日后，奎萨达派他的兄弟赫尔南（Hernán）继续向群山深处远征，结果还没出发多久，一个印第安人就通知他们说，贝拉尔卡萨尔正从西面的山谷方向向他们靠近。

仅仅8天之后，又一支军队从东南方向下山，向他们接近。这支队伍由一个德国人统帅。

尽管新世界如此广袤，但巧合的是，就在短短1周多的时间内，3支各不相干的远征军都抵达了同一个终点。区别只在于谁先到，谁就能先得。

***

3位冒险家最终都未得善终。20年后，奎萨达再度带队远征，却惨遭失败：1300名白人远征军中，只回来了64人；1500名印度挑夫只剩下4个；1100匹马只活下18匹。费德曼则被自己的赞助人韦尔泽家族下令绞死。而贝拉尔卡萨尔在与另一位冒险家豪尔赫·罗夫莱多（Jorge Robledo）的争斗中杀了对方，自己也因谋杀罪被判处死刑。但在行刑前，他就已经因病死亡。

[1] 圣玛尔塔，位于哥伦比亚北部加勒比海沿岸，是西班牙人在哥伦比亚最早建立的城市。——编注

[2] 帕维亚，意大利城市，位于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3] 佩德罗·费尔南德斯·德·卢戈（Pedro Fernández de Lugo，1475—1536），圣玛尔塔最高执政官员之一。

[4] 新格拉纳达，西班牙自1717年开始在南美洲北部设立的殖民地，领域包括今天的巴拿马、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19世纪南美洲的独立运动终结了这个殖民地政府。

[5] 巴兰卡韦梅洛，哥伦比亚城市，位于玛格达莱纳河畔。

[6] 齐布查人，印第安人中的一支。

[7] 塞巴斯蒂安·德·贝拉尔卡萨尔（Sebastián de Belalcázar，1480—1551），西班牙军人、探险家。1535年前往哥伦比亚一带寻找黄金国，建立了包括卡利在内的一些城市。

[8] 即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约1478—1541），西班牙早期殖民者，现代秘鲁首都利马的建立者。

[9] 即基多王国，古印加帝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1534年被西班牙殖民者占领。厄瓜多尔独立后，定基多为首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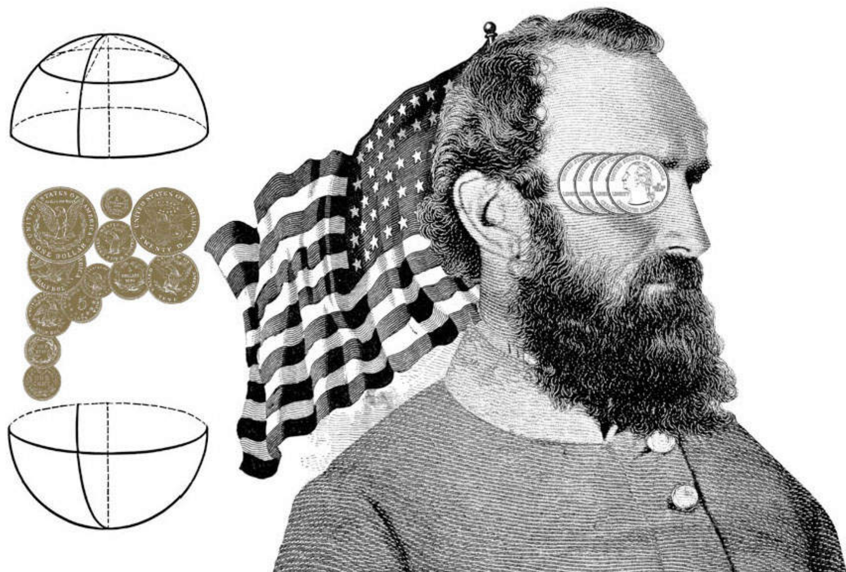
[10] 圣菲波哥大城，即今日的波哥大。

强盗资本家

Robber Barons



随着资本主义种种弊端的暴露，某些道貌岸然的绅士最终被揭发出强盗资本家 [1] 的真面目。但我们要记住，其实强盗资本家早已有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第一次世界大战被称为唯一的“世界大战”，在此之前的1857年，铁路的过度建设、土地投机、银行滥发贷款等种种行为就曾引起过“市场恐慌”，导致股票大跌，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类似的危机在1873、1877、1883和1893年接连不断地发生。这些破坏力巨大的经济危机每次都是以铁路行业为导火索，全面爆发后导致破产、经营失败和债务累积。我们几乎每次都会使用“经济危机”一词，有些人则直接以“大萧条”指代。当时富人发家致富的手段超越想象，一夜暴富备受推崇。确实，当时的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不繁荣几乎是不可能的：国家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发达，政府斥巨资建造公共设施；人们的工资水涨船高，同时在法律保护下，木石建材的价格低到令人难以置信。当时，一个人只要在美国居住满5年（后来缩短到3年），就可以购买大片的公共地块了。



这些条件再加上政府监管的彻底缺失，导致人们对企业经营自由产生了一种近乎虔诚的盲信，一群传奇的“强盗资本家”或曰“流氓资本家”由此诞生。

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 [2] 是这个时代著名的强盗资本家之一。他是一名船运大亨，控制着大量的河道与航道运输。他曾通过海盗般的行径与竞争对手争夺哈德逊河域的垄断权，通过收买法官和政客，判定对手的垄断涉嫌违宪；自己却继续在当地进行垄断经营。他还曾在海军陆战队的保护下进军西班牙语美洲市场，是打开该市场的第一人。范德比尔特身材高大、暴躁易怒。他曾送了一条名为“北极星”的游艇给自己的妻子，这条游艇全长82米，他乘着它环游世界，日后还像个暴发户似的拿此事进行炫耀。

同时代的另一位资本家丹尼尔·德鲁 [3] 则是屠夫和农场经营者出身，此人信仰虔诚，性格却狡诈多端。还有一位资本家名叫吉米·菲斯克 [4] ，别名“欢喜吉米”，这人是小商贩出身，曾在马戏团演过杂技，还做过街头摊贩，也干过各种小偷小摸的勾当。菲斯克靠卖毛毯发家，也倒卖过战时物资，他擅长低价买入股票，随后以高价卖给好骗的买主。菲斯克十分在意自己的形象，他在购入一条航线时，曾身着精心设计的海军上将制服。当时还有一名资本家名叫杰伊·古尔德 [5] ，此人是一位优雅的花花公子，有着诗人般的眼神，但他却能够通过操纵股市的上下浮动，凭借铁路生意发家致富。

所有这群人都曾多次表达自己对上帝的敬畏，却不愿踏踏实实地努力，哪怕赚1美元都不肯亲自动手。这几位资本家曾为争夺连通伊利 [6] 与纽约市的铁路路线（即伊利铁路，世界上最重要的铁路线路之一）而陷入激烈的争斗，一边雇用打手进行见不得光的操作，一边雇用律师依

据纽约州与新泽西州的法律互相攻击。举个例子让大家感受一下当时的场面多么夸张：在与范德比尔特争夺伊利铁路所有权的争斗中，德鲁、菲斯克和古尔德曾经低价抛售了超过1万股的股票，导致股市狂跌。为进行这场股战，他们从纽约市用渡船运送了800万美元转移到一个叫“泰勒堡”的旅馆，并雇用了一群武装到牙齿的地痞流氓来保护这笔财产。为防范范德比尔特誓言报复的威胁，他们在运输过程中甚至出动了3台大炮和4艘炮艇。

是的，这些足智多谋、行为贪婪的伪君子理当受到监管。如今的强盗资本家们受过更好的教育，也因此更擅长让别人替自己承担可能的风险。毕竟，如今他们不需要雇用百来个犯罪分子和两台加农炮，就能守住自己赢来的财产。

[1] 强盗资本家，19世纪下半叶对一些美国商人的蔑称，暗指这些商人为了致富不择手段。

[2] 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1794—1877），美国工业家，依靠航运和铁路生意致富，是历史上最富有的美国人之一。

[3] 丹尼尔·德鲁（Daniel Drew，1797—1879），美国商人，铁路及航运大亨、金融巨头。

[4] 即詹姆斯·菲斯克（Jim Fisk，1835—1872），美国金融家、股票投机商。

[5] 杰伊·古尔德（Jay Gould，1836—1892），19世纪铁路及电报系统巨头，股票投机商。

[6] 伊利，美国港市。

阿克里（东）

Acre (el Este)



历史上的种种奇闻怪事总是令我兴趣十足——许多怪事都来自于民族间的冲突，在种种机缘巧合的推动下，伴随着暴力与混乱而诞生，随之而来的则是相关的冒险传说及经济利益。其中，阿克里 [1] 独立共和国就是历史所孕育的怪物之一。阿克里国家的东西两端各有奇闻，借此机会，我们就来谈谈这两段历史以及其中所孕育出的种种冒险、奢靡、金钱和暴力征战的传说——甚至有相关的电影和邮票由此而生。

1839年，一位和弗莱明 [2] 风格相似的朴实的科学家查尔斯·固特异 [3] ，在实验中尝试着往满满一锅乳胶中加入硫。乳胶原本只能用来做成橡皮或者其他没几样小东西，但在加入硫之后，却变得十分坚固耐用。这一加工方法日后被称为硫化法。

然而，可怜的查尔斯从这项发明中连一个子儿也没赚到，也没有因此出名，尽管这项新发明应用广泛：硫化胶被密集地应用在制鞋、玩具、管道安装等行业，从英国有钱人玩的高尔夫球到自行车和汽车的轮胎，都少不了它的身影。

这项新发明引发了一股橡胶热潮，尽管许多植物都会分泌乳胶，但只有巴西橡胶树所分泌的细橡胶被誉为质量最好的橡胶。当然，这种橡胶的价格也是最高的。

我曾经在书里读到过（虽然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仅源自雨林的传说），为了找到橡胶树，当地人会寻找习惯在这种树上筑巢的鸟类，再

顺着它们的叫声来进行搜索。一旦找到了橡胶树，采胶工人会先在树上做一个标记，然后在橡胶树的附近开出路来。之后的工序就比较简单了：先在树上割一刀，然后在树脚下放一个容器收集流出的橡胶。待容器装满后，沿着一根不断旋转的棒子将橡胶倒出（棒子事先浸透泥土，以防被橡胶粘住），同时用炉灶点火加热，直到橡胶凝固。



橡胶树原先只在亚马孙河流域一带生长，而且大部分橡胶树林都长在荒无人烟的地方。为了开采橡胶，葡萄牙人曾一路挺进到玛瑙斯 [4] ；同时期，耶稣会教士曾在新格拉纳达的总督辖区建了几个村庄，容纳皈依基督教的印第安人，村庄位于乌卡亚利河与马拉尼翁河交汇之处，即亚马孙河的发源地。原属厄瓜多尔、现属秘鲁的伊基托斯城 [5] 就位于附近：此地曾被誉为橡胶之城，是淘金的好去处。

经过英国人一番强盗似的劫掠，当地的橡胶树损毁严重。之后，巴西橡胶树被移植到了亚洲。到了世界大战期间，全球超过95%的橡胶都已经是亚洲产的了。不过这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19世纪末，在上亚马孙河流域，一位爱尔兰人的后代闯入了这一带。此人名叫卡洛斯·费尔明·菲茨卡拉尔德 [6] ，他曾被指控在战争期间给智利人当间谍，帮助智利在沙漠区域中赢得了好几块油水丰厚的地块。10年以后，菲茨卡拉尔德成了乌卡亚利河流域最富有的橡胶商人。他成功的秘诀十分简单粗暴：奴隶制度。据说，他绑架了许多印第安人（未皈依基督教的原住民），强迫他们劳动，支付给他们的工资则是他自创的一种货币，只能在他自己的生产基地中流通使用。这些印第安人为他辛勤卖命，用他自己的货币在他的营地吃饭、喝酒、泡女人（我猜这时候他们已经开化了）。通过这种方式，菲茨卡拉尔德飞速致富。之后，他带领手下2000多名工人，决定进行一项困难却回报丰厚的开发：探索马德雷德迪奥斯河 [7] 发源地的支流区域。

菲茨卡拉尔德看中的这片区域有着丰厚的橡胶树资源，于是他开始

认真思索如何开发。当地与库斯科或阿雷基帕之间没有交通途径，距离当时的橡胶生产中心伊基托斯也很远。因此，菲茨卡拉尔德想要利用乌卡亚利河（这条河从这片橡胶产地直接流向伊基托斯）来运送橡胶，从而获利。当然，这只是官方的说法，还有一个版本的传言则与之相反，说菲茨卡拉尔德其实是想通过马德雷德迪奥斯河将橡胶直接运送到玛瑙斯，绕过伊基托斯对橡胶业的管控。

这个故事的真实版本已经不得而知了，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菲茨卡拉尔德确实固执地想要开发这块产区。他先到达乌卡亚利河与其支流米夏夸河交汇的某处，在当地用雪松木建造起一座足足3层楼20个房间的大房子，还附带一个由苦力精心照料的花园。之后，他开始出发寻找印第安人告诉他的一个地峡：据说位于乌卡亚利河和马德雷德迪奥斯河之间的盆地中有一个可以开船的地方。他在那里找到了一块分开塞加里河（米夏夸河支流）和卡斯帕佳里河（马努河与马德雷德迪奥斯河支流）的10公里长的空地。这趟探索没有其他太多收获。回到营地后，他买了一条名为“孔塔马纳”的汽艇，乘着它向刚发现的船坞进发。他乘着这条船向卡斯帕佳里河前进，没有带武器。他朝着目的地前进了几十公里，在有些地方还必须要将汽艇从陆地上抬过去。这趟行程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数千名印第安人帮他运送船只。他们用绳索和滑轮把汽艇吊起来，铺在涂了油的树干和钢缆上往前推，把船上的蒸汽机吊在高空中。当地的印第安人对这些疯狂的橡胶商人十分反感，为防备印第安人的袭击，船上各处都配备了逃生出口。

没错，菲茨卡拉尔德的行为确实疯狂，但他成功了。不仅如此，他还成功穿越马努河，到达了马德雷德迪奥斯河域。

在菲茨卡拉尔德完成这次探险后，玻利维亚的橡胶商人首先和他搭上线。他们很快从这条航线中发现了商机：通过这条线路，他们可以绕开贝尼河[8]和亚马孙河，以更快的速度将货物运输到港口。其中一个名叫尼古拉·苏阿雷斯（Nicolás Suárez）的玻利维亚商人与菲茨卡拉尔德合伙投资，开始共同使用汽船沿着这条河道运送橡胶商品。与此同时，菲茨卡拉尔德继续深入探索雨林地带，他到达了玛瑙斯，沿着亚马孙河溯流而上，最后回到伊基托斯，完成了对整个交通网络的探索，并由此一举成名。

自此以后，菲茨卡拉尔德和他的合伙人致力于完善船坞的开发并修建铁路。1897年7月9日，当他们乘船经过乌卡亚利河时，一阵激流将船撞向岩石，导致船只解体。菲茨卡拉尔德为救他的合伙人、玻利维亚议员安东尼奥·瓦卡·迪亚兹（Antonio Vaca Diez）溺水身亡，年仅35岁。

当时，许多巴西人已经在当地扎根，但他们不愿再仰仗玻利维亚人和秘鲁人为生。菲茨卡拉尔德在世时，他和他的合伙人能压制住当地的民族矛盾，但在邻近的地区，即如今巴西的阿克里州地区，分裂主义的危险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但由于阿克里地区的人控制着他宝贵的橡胶交易最重要的商道之一，菲茨卡拉尔德不愿与他们为敌。

然而，随着菲茨卡拉尔德的死亡，平衡最终被打破了。尼古拉·苏阿雷斯想要侵占他的两个合伙人留下的地产，但遭到了菲茨卡拉尔德的遗孀和兄弟们的反对，双方在雨林中上演了一场OK牧场枪战 [9] 似的争斗，由此掀开了当地混乱与纷争的序幕。同时，当地劳工和橡胶工人也因不满生活艰苦而发动了叛乱。不过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许多读者也许会从这段历史联想到沃纳·赫尔佐格 [10] 的相关电影。主演克劳斯·金斯基 [11] 在影片中生动演绎了这段冒险的部分历史（由于拍摄地天气炎热，虫害繁多，加上制作延期等原因，该影片原定的主演杰森·罗巴兹 [12] 和米克·贾格尔 [13] 都相继退出）。影片讲述了当地的印第安人差点自相残杀的历史，还展现了秘鲁与厄瓜多尔之间的战争，著名的台词“没有水了！”也深入人心。不过，菲茨卡拉尔德本人估计不会喜欢这部电影，看到这种种描述只会对导演来上几枪；毕竟，菲茨卡拉尔德本人从来不会欣赏艺术。

[1] 阿克里原属于玻利维亚，1903年被巴西吞并，现为巴西的一个州。

[2] 指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1881—1955），生物化学家、微生物学家，青霉素的发明者。

[3] 查尔斯·固特异（Charles Goodyear，1800—1860），19世纪美国发明家，因发明硫化胶而闻名于世，被誉为“橡胶之父”。

[4] 玛瑙斯，现巴西亚马孙州首府，曾被誉为橡胶之都。

[5] 伊基托斯城，秘鲁亚马孙丛林地区最大城市，在20世纪初的橡胶热中曾繁盛一时。

[6] 卡洛斯·费尔明·菲茨卡拉尔德（Carlos Fermín Fitzcarrald，1862—1897），秘鲁商人、探险家。

[7] 马德雷德迪奥斯河，南美洲河流，位于亚马孙河盆地，流经秘鲁和玻利维亚。

[8] 贝尼河，玻利维亚北部的河流，在玻利维亚和巴西边境流入马莫雷河。

[9] OK牧场枪战，1881年在美国亚利桑那领地汤姆斯通发生的一场著名的枪战。

[10] 沃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1942— ），德国演员、导演、编剧、制作人。他执导的电影《陆上行舟》展现了菲茨卡拉尔德在秘鲁雨林的冒险之旅。

[11] 克劳斯·金斯基（Klaus Kinski，1926—1991），德国男演员，《陆上行舟》主演。

[12] 杰森·罗巴兹（Jason Robards，1922—2000），美国演员，曾两次获得奥斯卡奖。

[13] 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1943— ），英国摇滚歌手，曾参与多部电影的

制作。

阿克里（西）
Acre (el Oes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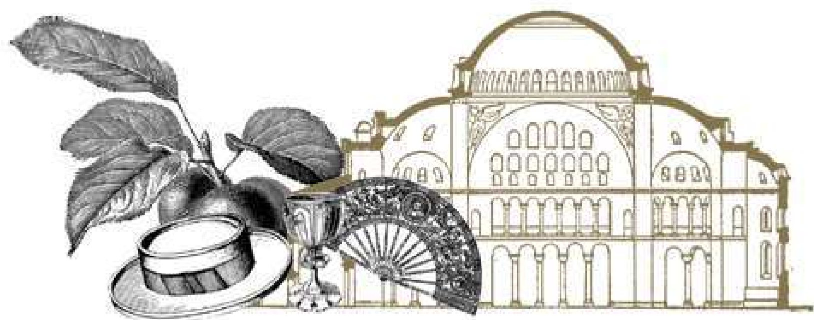


有些人的命运似乎注定是为传奇而生的，比如路易斯·加尔韦斯·罗德里格斯·德·阿里亚斯（Luis Gálvez Rodríguez de Arias）。加尔韦斯是加的斯[1]人，生于圣费尔南多，家境良好。他曾在家人安排下进入西班牙银行工作，据说是个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和决斗好手。当时他纵情享乐，开销无度，甚至干过开空头支票的犯罪行为，虽然最终免于牢狱之灾，但终究是败坏了名声，只得离开家乡前往美洲。之后，他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陷入了一系列的感情纠纷和争斗事件，不得不再度流亡。此后他似乎洗心革面了一阵子，在里约热内卢赚了笔钱。但随后他的事业又走了背运：他陷入和当地联邦政府的纠纷中，一系列冲突导致他最终破产。加尔韦斯就像康拉德笔下的人物，从西班牙银行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再到里约热内卢，一路经历了各种冒险。根据冒险小说的常见发展，下一步他就该探索文明世界的边缘了：加尔韦斯之后来到了玛瑙斯——这里是亚马孙省的中心，内格罗河与亚马孙河就在此处汇聚。

至此，我们尽力营造了一种冒险小说的氛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时的历史大环境是，从1880年开始，橡胶被广泛应用于轮胎生产等行业，我们之前已经提到，巴西的橡胶是全世界质量最好的，当时玛瑙斯就得益于橡胶产业而一举成为全世界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直到多年以后，一个名叫阿尔比恩（Albión）的英国人偷走了一些橡胶树苗的种

子，移植到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才终止了南美橡胶业的垄断地位。当地橡胶种植商和经销商雇用印第安人与混血黑人采集橡胶乳液，再将这种珍贵的商品卖往玛瑙斯与贝伦 [2] 。有些人说，玛瑙斯是当时全世界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也是全巴西唯一一个电力系统、供水系统和有轨电车完备的城市。城市内修建了宽广的街道，亚马孙剧院、市政厅等华美的建筑令人目不暇接。

这样说只能让大家对当时该地的繁华有个粗浅的印象，要进一步描绘，可以举以下几个例子：当时，玛瑙斯每年消费的香槟比法国本土还多；官员们奢侈到能把衣服寄回伦敦或巴黎去洗烫；当地买卖的钻石也都是全球最大颗的。当然，关于香槟的消费量仅来自传说，很难真的去做统计，不过当地的繁华程度确实有据可循。以亚马孙剧院的建造历史为例：赫尔佐格在他那部以菲茨卡拉尔德为主角的电影中曾介绍过，这座建筑命运多舛，自1882年就开始建造，但却花了足足15年才完工，之后又经历了4次大维修。亚马孙剧院由一位意大利建筑设计师操刀设计，所用到的巴西木材都送到欧洲裁切，大理石从卡拉拉 [3] 送来，玻璃则来自穆拉诺 [4] 岛，剧院中总共挂有近200盏枝形吊灯，其中32盏使用现代的电力点亮（这在当时实属先进）。剧院使用的瓦片是从法国的阿尔萨斯专程运来的，家具来自巴黎，使用的钢铁来自苏格兰。为展示剧院的现代化程度，门口的通道都用橡胶铺成，这样马车的车轮在路上滚动时，就不会发出恼人的吱嘎声了。更惊人的是，为邀请卡鲁索（Enrico Caruso）来玛瑙斯献演，剧院居然开出了巨额酬金的天价合同。但由于受不了当地的炎热气候，这位男高音歌手最终谢绝了邀约。结果1897年1月7日，剧院就在没有男高音的情况下上演了蓬基耶利（Amilcare Ponchielli）的《乔康达》。奇怪的是，在此后90多年中，剧院都再没有上演过任何歌剧，直到亚玛索尼诺·门德斯 [5] 上台，才开始大力推进歌剧艺术的复兴，他与众多欧洲（尤其是东欧）艺术家签约，重金邀请他们来剧院献演。



现在，让我们先回到加尔韦斯和他的冒险故事吧。

我们的主人公继续着他的淘金之旅。他监听玻利维亚领馆，打听到了玻利维亚人正密谋将阿克里（居民以巴西人为主）卖给美国人（典型的权钱交易），于是决定将这条新闻公之于众，并成功说服亚马孙州政

府支持他实施了一个荒唐的计划。他率领一支远征军，打着巴西政府的旗号，一举占领了当地的大块土地（面积超过150万平方公里）。

但加尔韦斯并未满足于此，很快，他又想出了一个新的计划。他与阿克里当地的橡胶种植商结盟，煽动他们的民族独立情绪以换取政治支持。他组建了一支远征军，队伍构成和当地的大多数远征考察团相类似：几位曾参与过古巴战争的西班牙老将带队，队员则是几百名当地的橡胶种植劳工。远征军中还有一群歌剧演员，他们是萨苏埃拉一个歌剧团的员工，来玛瑙斯表演的。这么多西班牙人竟然没有引起美国人的怀疑，他们还以为这支队伍是西班牙政府派出的（仿佛我们真的会这么干似的）。

远征军沿着河流溯流而上，20天后到达阿克里。这块地域完全没有划分过边际线，导致秘鲁人、巴西人和玻利维亚人都号称对其拥有主权（伊基托斯一带就是各方争抢的区域之一）。加尔韦斯到达此处时，正好菲茨卡拉尔德的遗产争夺战已经告一段落，因此他所遇到的阻碍也相对较小。加尔韦斯的军队顺利俘虏了当地的8名玻利维亚军官，并于1899年7月14日宣布立国，加尔韦斯自封阿克里独立共和国主席，他将共和国首都建在阿隆索港（后改名为阿克里港），之后做了每个新国家成立后都会做的事：设计一面新的国旗。作为一名海军部官员的侄子，加上本人又学习过法律（之前提过没？），加尔韦斯立志为新共和国设计一套完整的国家体系。他成立了一系列政府部门，还着手建设学校和医院，当然，军队的建设也必不可少。据说，他在就职仪式上曾经宣誓："祖国抛弃了我们，因此我们建立了这个全新的国家。我将立志将一切奉献给阿克里共和国。"（这里说的"祖国"到底指的是哪个国家？）

别忘了还有最重要的：这个国家甚至有自己的邮政系统，还设计了邮票！据说阿克里共和国的邮票如今市面上仅存6张，每张都是天价。

闹剧就此开场了。加尔韦斯对自己的国家独立事业非常上心，为取得国际社会对阿克里共和国的承认，他开始限制玻利维亚人运输橡胶的生意。这是个危险的错误。毕竟，共和国的成立靠的可不是无套裤汉[6]的支持，这些橡胶商人才是背后的金主，而他们不愿损失生意。仅仅在加尔韦斯发表就职演说的5个月后的12月28日，他就被赶下台，共和国变成了自由国度。由于"民众抗议"，不到一个月，加尔韦斯就又恢复了职位。玻利维亚人被赶出首都，加尔韦斯再次发起大选。然而此时巴西政府已经开始对这颗"雨林中的毒瘤"看不顺眼了，1900年3月，巴西政府派一支军队夺回了阿克里州的控制权，随后把这块土地还给了玻利维亚人。加尔韦斯则回到了西班牙。

然而，事情还未就此结束。玛瑙斯的当权者依然致力于推动阿克里地区的独立，这次，他们派了一位名叫奥兰多·科雷拉（Orlando Correa）的记者率领一支远征军（"诗人们的远征军"）前去收复失地。1900年11月，阿克里第二共和国宣布成立。这个共和国只存在了短短1个月的时间。之后，玻利维亚人就又一次夺回了首都。我猜这一次，玛

瑙斯人终于意识到，派歌剧演员和诗人去建国是成不了大事的。于是这一次，他们雇用了一位名叫何塞·普拉西多·德·卡斯特罗[7]的巴西军人指挥军队，开始进行第三度远征。1903年1月24日，远征军占领了阿克里港，不出所料，又宣布了“阿克里第三共和国”的成立。这次行动得到了巴西政府的支持，与此同时，玻利维亚的新总统、政治强人何塞·马努埃尔·潘多（José Manuel Pando）表面上公开谴责，背地里却和巴西政府暗中谈好了瓜分领土的交易。1903年11月17日，双方签订了《彼得罗波利斯条约》，巴西最终获得了阿克里的大部分领土。

至于加尔韦斯，回到马德里后他感染了热病，最终于1935年过世。

[1] 加的斯，西班牙西南部的一座滨海城市。

[2] 贝伦，巴西东北部城市，经历了橡胶的鼎盛时代，曾被称为“美洲的巴黎”。

[3] 卡拉拉，意大利城市，盛产大理石。

[4] 穆拉诺，意大利小岛，以制造色彩斑斓的穆拉诺玻璃器皿闻名于世。

[5] 亚玛索尼诺·门德斯（Amazonino Mendes，1939—2018），巴西政治家，曾3次任巴西亚马孙州州长。

[6] 无套裤汉，指18世纪法兰西下层百姓，他们是当时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参与者。

[7] 何塞·普拉西多·德·卡斯特罗（José Plácido de Castro，1873—1908），巴西军人、橡胶生产者、政治家。曾在阿克里战争期间领导武装起义。

林肯与“竭尽所能”的艺术

Lincoln y el arte de lo posible



在历史上，林肯的形象一直是一个政治家的典范。他揭露了奴隶制的丑恶，并尽全力为消灭奴隶制而斗争，甚至为此不惜一战。因此，当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在电影《林肯》中塑造了一个更有血有肉的形象后，有人接受不了影片中这位伟大的政治家竟然如此花言巧语、说谎成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但电影本身其实并未夸张，在现实中，林肯确实有着种种缺点，而在历史记录中，这些却被一笔带过。

美国的奴隶制问题可以说是突然爆发的。建国初期，伟大的《独立宣言》宣布人人平等，公民的生命和自由不容侵犯，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独立宣言》中所指的公民并不包括奴隶，但在18世纪末，奴隶只在有限的几个利润微薄的产业（主要是烟草业）中发挥作用，奴隶制本来就要自然消亡了。当时，北方各州担心大量的黑人移居到他们的疆域后，会在当地兴建黑人部落，造成暴力抢劫事件增多，并威胁到当地贫困的白人妇女的安危，于是决定禁止奴隶贩运，并计划将国内的黑人送回非洲，结果才导致了著名的分裂危机。宪法中几乎没怎么提到奴隶，只强调过一次数量：当时奴隶与自由民的人口比例约为1:45。

棉花种植业的兴旺改变了一切。棉花在英国的销路很好，而只有黑人才能忍受种植和采集棉花的恶劣工作环境。这个突然的转变使得仍在美国境内的黑奴突然成了高价商品，黑奴的繁衍也变成了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这种转变给后来的南北冲突埋下了祸根——这场冲突究其根源并非为了争取黑人的未来，而是为了争夺立法权。北方各州工业发达（当时规模已经很大，但还不足以与外国商品展开竞争），南方各州则仅靠棉花出口就能实现自给自足，无须与北方各州之间开展人员流动和贸易往来。谁掌控了美国政府，谁就能决定政策是应该向贸易保护主义

倾斜，以保护北方的工业发展，还是应该打开国门引进更便宜、更优质的外国商品，来满足南方自营型经济的需求。

南北战争的爆发并不令人意外。在此之前，整个19世纪就已经有两次差点爆发冲突，最后虽然勉强达成妥协，但平衡相当脆弱。1820年，蓄奴州与非蓄奴州之间划分了一条分界线（以北纬36度30分为界），从此，每当有新的州要加入联邦，参议院的平衡就要重新维护。然而，根据这条分界线，北方各州的领土要比南方大得多，这也导致了战争加速爆发。南方人的行为日渐狂热，他们主观地夸大了北方的激进分子（吵吵嚷嚷的废奴主义者）所拥有的权力。实际上，废奴主义者不过是更有组织性、社会活动更活跃一些而已。狂热分子却据此炮制出一套阴谋论，认定北方人正在密谋改变南方人的生存之道，设法利用宪法和政治手段夺走自己的财富。1857年，支持奴隶制度的最高法院在著名的斯科特诉桑福德案 [1] 中宣判分隔蓄奴州与非蓄奴州的分界线违宪，并宣称任何公民在全境范围内都拥有对个人财产的所有权，其中也包括对自己奴隶的所有权。之后在1860年，由于内部分裂，民主党在选举中失利，共和党人林肯获选总统，更进一步为南方派的失败掘开了坟墓。

谈到这里，让我们再回到政治中来吧。林肯本人并非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他确实反对奴隶制，但他一向主张用现实的方法解决问题。他的竞选纲领中并没有包括任何关于废除奴隶制的设想。相反，他提出的政治纲领是由政府向奴隶主付钱，以经济补偿的方式说服他们转让奴隶的所有权，以这种方式来征用这些劳动力。这是一种变相的征用方式，当时计划一直延续到1900年。

1862年，也就是南北战争正打得火热的时期，林肯在一封著名的信件中写道，他的目标是拯救联邦。他说："如果我能拯救联邦而不解放一个奴隶，我愿意这样做。" [2] 在战争初期，"维护联邦统一"始终是他的首要目标。林肯并非第一位宣布给奴隶公民权的政治家。在南北战争时期还有两人走在他的前面：1861年8月30日，约翰·C. 弗雷蒙特 [3] 首次宣布解放密苏里州的奴隶；1862年5月9日，一位名叫大卫·亨特（David Hunter）的将军宣布解放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黑奴。但这两项提议事后都被林肯取消，发起人也因此被解职。

直到安提塔姆会战胜利后，林肯才开始改变政治纲领。但为何在此时突然转变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很难了解他是忽然改了主意，还是早有打算，只是为了不惊动他的反对者，之前才没有透露半点迹象。鉴于林肯是一位经验老到的政治高手，我更倾向于相信后者。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我的观点：战争中期，林肯发布了《解放宣言》，宣布从1863年1月1日起，所有反叛州的黑奴都将获得自由。但根据该宣言，忠于联邦政府的特拉华州、肯塔基州、密苏里州和马里兰州的白人奴隶主依然可以合法地拥有黑奴作为个人财产。通过这种方法，林肯成功地在南方各州挑起了黑奴与奴隶主之间的巨大矛盾。截至战争结束，超过2万名黑人加入了北军参与作战。

而当战争快要胜利之际（联邦军队成功赢得维克斯堡和葛底斯堡战役，并收复了亚特兰大之后），林肯又宣布，将以修订宪法的形式，将废奴写入法律，并将影响力扩大到全境。这样，即便他在战时的绝对权力被收回，也能确保奴隶制不再合法。在他的葛底斯堡演说[4]中，他以平易近人的语言，传达了这一极具前瞻性的理念，该演讲也因此成为史上最伟大的演说之一。

当时为数不多的几张照片记录下了林肯的几个历史性时刻（但照片中没有出现几个蓄奴州代表的身影）：为推动宪法第十三修正案[5]，1864年4月，林肯先在参议院争取到了足够的票数，之后又在1865年1月31日赢得了国会投票的成功。但直到他遇刺身亡，才有足够多的州批准了这一修正案，该法案自当年12月6日起正式生效。

然而到这里，这段历史还不算结束。林肯致力于尽快与南方各州和解。战争结束后，他的主要政治目标就是修复与南方州的关系。然而，由于遭到刺杀，他的这一夙愿未能及时实现。但讽刺的是，正是这场谋杀案的刺激，使得他领导的务实派政府变得激进，并强行在南方州执行报复性的政策，推进通过了宪法第十四和第十五修正案[6]。许多林肯的传记中都忽略了后两条修正案的巨大作用：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只是解放了黑奴，但完全没有保障他们的任何政治平等权益，也没有从法律上禁止任何针对黑人的歧视行为。如果不是因为战后初期政府以激进的手段快速推进后续政策的实施，被解放的黑奴的法律地位势必变得岌岌可危，美国黑人在许多州的生活条件也会受到各种限制。通过第十四和第十五修正案的落实，联邦政府和最高法院才终于从法律层面上终结了20世纪60年代的诸多种族隔离现象。



但林肯的伟大形象并不会因此而受损。林肯并非宗教激进主义者、废奴主义者，他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以及这个国家所秉承的理念而竭尽所能。如果一种手段有可能获得成功，他就会积极尝试，一旦胜利，接下来他就会快速与对手握手言和。在政治上，林肯是一名高手。他能够激励同胞，与他们并肩作战；也能通过灵活的应对，实现种种看似不可能的承诺。

亚伯拉罕·林肯竭尽所能，因此他获得了成功。而如今的政客却已经忘记了这个美德，认为自己只要尽到本分，就能交差了。

[1] 斯科特诉桑福德案，黑人奴隶斯科特诉讼要求获得自由的案件，该案的判决成为引发美国南北战争的关键诱因之一。

[2] 林肯在这封1862年8月写给报社编辑的信中表示："如果我能拯救联邦而不解放一个奴隶，我愿意这样做。如果为了拯救联邦需要解放所有的奴隶，我也愿意这样做。而如果我能通过解放一些奴隶，不管其他奴隶而维护联邦，我也会这么做。"

[3] 约翰·C. 弗雷蒙特（John C. Fremont，1813—1890），美国军官、探险家。

[4] 指1863年林肯在葛底斯堡公墓揭幕式中发表的演说，这是他最著名的演说之一。

[5] 第十三修正案，美国著名的宪法修正案之一，内容为废除奴隶制和强迫劳役。

[6] 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涉及公民权利和平等法律保护，最初提出是为了解决南北战争后昔日奴隶的相关问题，对美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宪法第十五修正案禁止联邦或州政府根据公民的种族、肤色或以前曾是奴隶而限制其选举权，增加了黑人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参与程度。

非洲
ÁFRICA

义举
Beau Geste



大马士革。一天，几个孩子正在广场上玩耍，其中一个穆斯林孩子要求另一个基督徒孩子拿下脖子上的十字架，并将它扔到地上踩踏。这场由于信仰不同而引发的冲突快速升级，很快，争执变成了骚乱，几小时之后，整个城市陷入对基督徒的疯狂迫害。德鲁兹人 [1] 纷纷从山上赶来，根据历史记载，成千上万人因这场骚乱而丧生。补充一下背景：当时是1860年，德鲁兹人与马龙派 [2] 教徒正在内战。

然而就在这场骚乱中，大马士革城内有一位穆斯林却敞开自家大门收容基督徒。暴民们围攻他家时，男主人独自一人对抗两百个愤怒的阿尔及利亚人，成功赶走了暴徒，阻止了更多无辜的生命被伤害。此人名为阿卜杜·卡迪尔·贾扎伊里 [3] ，时年53岁。他的人生经历十分传奇。



回溯到1847年12月23日。历经15年的战争后，我们的主人公最终向他的敌人、法国的拉莫西埃（Lamoricière）将军投降，后者允诺他回阿卡城或亚历山大城。然而，继拿破仑旗下残忍、腐败的法国将军毕若（Bugeaud，曾跟西班牙游击队打过仗）撕毁了1837年在塔夫纳签署的秘密合约后，法国人再一次违背了自己的誓言——这一次，他们将阿卜杜·卡迪尔关进土伦的监狱，之后又转押到阿姆博斯，但阿卜杜·卡迪尔的

英雄事迹已经传颂开了。英国方面向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III）施压，要求释放这位英雄，5年之后，法国人终于同意将阿卜杜·卡迪尔流放至土耳其。

阿卜杜·卡迪尔首先来到布尔萨，之后迁至伊斯坦布尔，最终如愿以偿地定居大马士革，这里也是安达卢西亚苏菲派大师伊本·阿拉比[4]的长眠之处。阿卜杜·卡迪尔不仅是一名战士，更是一名神学家与神秘主义学者。他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卡迪里教团[5]的长老，他自己曾两次前往麦加朝圣，并师从几位历史上阿拉伯特别是叙利亚地区的大师，年纪轻轻就颇有见识。基于他深厚的学养，1850年，阿卜杜·卡迪尔在身陷囹圄之际，还能撰文驳斥一位法国牧师对伊斯兰教的攻击。即便身在监狱，他依然能准确地背出30年前学习的伊本·阿拉比、阿维森纳[6]、伊本·图菲利[7]和伊本·赫勒敦[8]的著述。

由于命运的偶然，战争打断了阿卜杜·卡迪尔的学术研究，30多年来他首次不得不搁下书本投身战场。让我们继续回到这段历史。

1827年，法国驻阿尔及利亚领事皮埃尔·德瓦尔（Pierre Deval）与阿尔及利亚脾气暴躁的“德伊”（意为领袖）发生了争执，双方争吵时德伊动手打了德瓦尔，这给了野心勃勃的欧洲人一个发动战争的绝好借口。哲学家阿卜杜·卡迪尔当时就向同胞们预告了即将而来的灾难。当时的两大部落——哈希姆部落和阿米尔部落认可他的社会地位，将年仅20岁的阿卜杜·卡迪尔推举为领袖。1年之后，法国人攻陷了阿尔及利亚。但侵略军并未止步于此。法国派出的全新军团由外国佣兵组成，网罗了一群全欧洲最为道德败坏的恶徒，这支军队在当地烧杀劫掠无恶不作，很快就恶名昭彰。有一次，侵略军把500个难民堵在一个山洞中，在洞口堆起灌木焚烧，使难民全部窒息身亡。这一恶举引发举国义愤，阿尔及利亚人在阿卜杜·卡迪尔的指挥下纷纷揭竿而起。

投笔从戎的阿卜杜·卡迪尔变得冷酷无情。他率军打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战役，经历过挫折与失败，也立下过赫赫战功。在赛蒂夫战役中，他率军进行了5次冲锋，自己的坐骑都死了两匹，在第六次冲锋时终于突破敌军防线，大败法国军团。他的诸多英勇传说在19世纪的小说和20世纪的电影中都有所体现。

1837年，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签订了《塔夫纳停战协定》，彼时仍有6万法军部署在阿尔及利亚海岸线一带。如前所说，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背叛了停战协定，又增派8万大军（几乎是法国全部兵力的1/3），重新打响了战争。

阿卜杜·卡迪尔随后被迫流亡，在饥寒交迫中辗转来到摩洛哥。摩洛哥苏丹将他出卖给法国人议和，他的戎马生涯就此结束。阿卜杜·卡迪尔从此离开战场回归学术生活，他埋首于《默瓦吉福之书》的创作中，在这部作品中他重申伊本·阿拉比的世界观，诠释迈向精神世界的道路，并介绍了苏菲教派的传统学说。

在大马士革，阿卜杜·卡迪尔几乎注定会追随他的安达卢西亚前辈的脚步。他生前住在伊本·阿拉比的故居内，伊斯兰历一三〇〇年赖哲卜月十九日，公元1883年5月26日，阿卜杜·卡迪尔在大马士革去世，尸骨就埋葬在他所崇拜的这位神秘主义大师的墓地旁边。

大马士革骚乱发生后，阿卜杜·卡迪尔拯救基督徒的义举为他赢得了诸多荣誉。他最顽固的敌人——法国人与他冰释前嫌，向他颁发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阿卜杜·卡迪尔对这枚勋章似乎不怎么在意，但美国政府送给他的两把左轮手枪，据他的很多朋友回忆，他十分珍惜。

[1] 德鲁兹人，主要生活在叙利亚的穆斯林，阿拉伯人的一支，信仰德鲁兹派。

[2] 马龙派，流行于叙利亚、黎巴嫩等地的天主教派。

[3] 阿卜杜·卡迪尔·贾扎伊里（Abd al-Qádir al-Jaza'iri，1808—1883），阿尔及利亚民族英雄，曾带领阿尔及利亚人民抵抗法国的殖民统治。

[4] 伊本·阿拉比（Ibn' Arabi，1165—1240），伊斯兰教神秘主义哲学家，出生于西班牙，晚年定居大马士革。他成功地对苏菲神秘主义学说做了系统化和理论化。

[5] 卡迪里教团，伊斯兰教苏菲派最有名、历史最悠久的教团组织之一，于12世纪创立于巴格达。

[6] 阿维森纳（Avicenna，980—1037），中世纪阿拉伯著名哲学家、医学家、自然科学家、文学家。

[7] 伊本·图菲利（Ibn Tufayl，1100—1185），中世纪阿拉伯著名哲学家、医学家、文学家。

[8] 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中世纪阿拉伯著名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

一段恶名昭彰的历史

Una historia conocida



想象一下这种生活。你在你自己国家的公民权不受认可。1个德国人的证言，等值于7个你的同胞的证词。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全部家产都被夺走，还被赶到人迹罕至、寸草不生的荒漠，而对方制定法律，号称自己的所作所为都合理合法。之后，你和你的族人在环境恶劣的贫瘠之地忍受着饥饿与贫困的折磨，直至最终死亡。这是一场系统性的屠杀，目的是消灭你的族群中的每一个人，而唯一对“处置”你们的方式提出抗议的德国人，则要求把你们当成奴隶劳工，供他们剥削压榨。想象一下，有些医生甚至用你们的族人来做人体实验……

1878年，英国殖民者占据了鲸湾港，将此处作为殖民地。此地默默无闻，唯一一次史上留名是由于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 [1] 曾在此处登陆。英国人打算在这里拦下德国人的扩张，但5年之后，德国商人阿道夫·吕德里茨（Adolf Lüderitz）向一位科伊族酋长买下了此处更北部的一个港湾，凭借这纸地契（殖民地的历史总是不断重复着这种荒诞无稽的闹剧），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首相宣布此处为德国保护区，并将其命名为德意志—西南非洲区，即今日的纳米比亚。



在继续我们的故事以前，先来看一看德国在非洲其他殖民地的历史。如今的坦桑尼亚、卢旺达和布隆迪当时都是德国在东非的殖民地。当时，当地国家富裕，人民安居乐业。在众多当地部落中，有一个名为赫赫的部落（该部落至今仍在这片领域居住）。在19世纪末，赫赫部落的族长穆科瓦瓦（Mkwawa）对德国殖民者进行了经年累月的抵抗，阻挠他们在达累斯萨拉姆和塔噶尼喀湖之间修建铁路。德国人残暴镇压了赫赫部落的起义，行径残酷而荒诞。穆科瓦瓦的首级被运往德累斯顿，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还被当作战利品之一写入《凡尔赛条约》（条约第二百四十六条写道：“本条约生效起6个月内……德国将把穆科瓦瓦苏丹的头颅进贡给大不列颠王室……”），作为英国人参与对赫赫战争的奖品。直到20世纪50年代，欧洲人才把这枚颅骨归还给非洲。

在德国当局的种种暴行中，尤以阿德里安·迪特里希·洛特尔·冯·特洛塔[2]的种种非人道行径最为恶名昭彰。当时，非洲西南地区居住着来自班图部落的赫雷罗人。自1884年起，当地通行法律被禁用，赫雷罗人也被规定不得享有与德国殖民者同等的权利。按照殖民地法律，1个德国人的价值是1个非洲人的7倍，因此在法律上，为推翻1位德国人的证言，需要有足足7位非洲证人出庭作证。凭借这一优势，德国人很快占据了当地所有的牧场。当地居民表示抗议时，殖民者就直接抢走他们的牲畜。赫雷罗人几乎失去了所有适宜畜牧的土地（而畜牧业是他们民族最重要的经济支柱）。在忍受了25年的剥削后，赫雷罗人终于举起义旗，从殖民者手中抢回自己的牲畜，并在骚乱中杀死了数百名德国人。

德国将军冯·特洛塔反应快速。在瓦特贝格战役中，赫雷罗人遭到残酷镇压，而这只是一系列悲剧的开始。特洛塔决心一劳永逸地解决“赫雷罗问题”，永远杜绝他们再次抢回自己土地的机会，因此，他将赫雷罗人全部驱逐到奥马赫科沙漠一带。特洛塔的命令十分明确：“所有在德国殖民地境内发现的赫雷罗人，不管是否持有武器、拥有牲畜，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处决。”冯·施里芬，德军在柏林的原总参谋部成员、第一次世界大战著名的战略方案“施里芬计划”的创建者，曾在给皇帝的备忘录中公开赞美这次种族屠杀，并认定其为种族冲突的自然结果。当时德国的舆论将赫雷罗人描绘为蛮族、德意志民族之敌，而将特洛塔将军的行动美化为一场十字军东征般的宗教战争。德军在当地的井水中投毒，污染水源，并在沙漠周围拉起一排警戒线。大部分赫雷罗人都被活活渴死，剩下的被送去劳工营做苦力，许多人很快因虚弱和疾病而倒下。经过这场屠杀，8万赫雷罗人中，只有不到1.6万人存活。1905年12月26日，德意志帝国又颁布法律，禁止赫雷罗人拥有土地：法律中冷嘲热讽地表示，赫雷罗人既然已经没有了家畜，也就不再需要土地了。而与此同时，尤金·费舍尔[3]（此人日后成了柏林大学的系主任），正在赫雷罗女性身上进行着绝育实验。

[1] 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Bartolomeu Dias，约1450—1500），葡萄牙著名航海家。

[2] 阿德里安·迪特里希·洛特尔·冯·特洛塔（Adrian Dietrich Lothar von Trotha，1848—1920），德国将军，曾在镇压非洲起义过程中颁布灭绝令。

[3] 尤金·费舍尔（Eugen Fischer，1874—1967），德国医学家、人类学及优生学专家。

朱达尔帕夏与阿尔马斯族
Joder Pachá y los armas



在讲述朱达尔帕夏 [1] 与阿尔马斯的传奇故事以前，我们需要先了解故事背后的两大帝国兴起的历史。

其中之一为桑海帝国 [2] 。在国王桑尼·阿里（Sonni Alí）的领导下，桑海帝国征服了从加奥到通布图及杰内的大片疆域，取代了原本位于尼日尔河流域的马里帝国 [3] 。但在征服战争胜利之后，先前被革出教门的势力推举其首领穆罕默德·杜尔（Mohamed Ture）篡夺了桑尼之子的王位，由此开启了阿斯基亚王朝。到了1582年，阿斯基亚王朝的达乌德皇帝（Daúd）已经统治了当地的大片疆域。

另一大帝国则是萨阿迪王朝 [4] 。在这个王朝消失200年后，人们依然带着恶意这样评价他们——王族成员假装自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但其实只是他乳母的后代。该王朝在一次征战中兴起，与过去的多次战争相似，在激战中，当地的柏柏尔人推举了一名阿拉伯人作为军队首领。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萨阿迪王朝多次打退了葡萄牙人与土耳其人的进攻。王朝最出名的领袖是艾哈迈德·曼苏尔（Ahmadal Mansur），他在其兄长殒命于阿尔卡萨基维尔战役后继承了王位。



百年来，欧洲各国一直觊觎着遥远的苏丹帝国和其他传统黑人帝国所拥有的黄金、盐和奴隶等财富，土耳其人、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Elizabeth I）、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PhilipII）都参与过针对非洲这些古老王朝的掠夺战争。

我在皮埃尔·贝尔托[5]所著的《非洲史》中，第一次读到了关于朱达尔帕夏的描述。根据该书记载，朱达尔这个绰号来源于他日常赌咒的口头禅[6]。天啊，多好的理由！因此我不愿相信，根据“权威记载”，这种说法没有依据，朱达尔的真名应该是“尤达尔”（Yudar）、“约达尔”（Dyaudar）或“胡达尔”（Judar）。我坚持相信：这段历史的主人公，名字就叫“朱达尔”（Joder）。

朱达尔大约在1560年左右出生于阿尔梅里亚的阿尔曼左拉山丘附近，真名是迪亚哥·德·格瓦拉（Diego de Guevara）。据说他和其他300个男童一起曾被土耳其人俘虏、阉割，被送到萨阿迪王朝皇帝阿布·马尔旺·阿卜杜·马利克（Abu Marwan Abd al-Ma-lik）的宫殿做宦官（这位皇帝日后在阿尔卡萨基维尔战役中战死）。由于在工作中表现出色，他之后被提拔担任马拉喀什民事法官。在当时，马拉喀什市塞满了三王之战[7]中捕获的摩尔人[8]俘虏，其中还有1500多名西班牙人，几乎占全城总人口的一半。

当朝皇帝阿卜杜·马利克战死后，皇位由其兄弟曼苏尔继承。当时，一位逃亡自阿斯基亚王朝的奴隶向曼苏尔大肆鼓吹桑海帝国的富饶，说在通布图，大批的黄金堆得像山那么高。于是摩洛哥[9]人派军队去攻占海岸线，这次远征虽然失败了，但却引起了阿斯基亚王朝的警惕。他们在唯一的通路上设置警备，以为这样就能阻止侵略了。

然而，摩尔人没有放弃：他们切断了桑海与土耳其之间的交通，侵占了撒哈拉沙漠中失落的绿洲地带，紧接着夷平了被当地称为“地狱”的塔加扎——几个世纪以来，无数黑人被迫在这里挖掘盐矿，最终埋骨于此。塔加扎位于桑海帝国的最北部，摩洛哥人就是从这里开始了他们的入侵。

1590年10月，朱达尔帕夏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包括由4000名摩洛哥人、500名欧洲人、1500名北非穆斯林组成的长枪队以及1000人的后勤部队。他还调用了8000头骆驼负责运输战争所需要的物资，包括火炮和火绳枪。火炮、火药及帆布等物资都自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处购得。当时，曼苏尔和伊丽莎白女王正在密谋从两头同时打击因无敌舰队战争失利而元气大伤的西班牙，为此，这是一笔必要的投资。

侵略部队的行军速度惊人。大军在6个月内急速推进2000公里，近2/3的士兵因此死亡。阿斯基亚人原本分出了一支部队警戒来自西面的进攻，当看到侵略军从意想不到的方向出现时，他们都惊呆了。但即便如此，阿斯基亚王朝还是重新召集了一支超过4000人的部队应对侵略。

1591年3月13日，朱达尔帕夏带领手下2000人的部队，在汤迪比的尼日尔河前展开前哨战。阿斯基亚军队惧怕火器的力量，驱赶数百头牛作为先锋冲向敌方，但这却成了自掘坟墓的昏着儿：在火炮及火枪的打击下，受惊的牛群掉头冲向了桑海人的部队。到了晚上，军队已经死伤无数，王室载满黄金的逃亡船也陷入了尼日尔河。黑人皇帝献出10000块黄金、1000名奴隶，并答应每年进贡以赎回自己的自由。通布图与加奥地区都落入曼苏尔帝国之手。

然而，苏丹最终收到的黄金数量看起来比较少，与此同时，关于朱达尔帕夏正在图谋不轨的谣言四起。人们传言他正打算建立一个西班牙摩尔人自己的国度。曼苏尔于是将其撤职，后者应旨撤到加奥地区。但从菲斯 [10] 派来的朱达尔的后继人选不断死于非命，要么得病身亡，要么死于各种神秘事故，要么死于朱达尔忠诚的旧部所掀起的各种公开叛乱。最终，在1599年，朱达尔帕夏带着丰厚的礼品回到摩洛哥，换得了王室的赦免。他最终死于1605年的摩洛哥继承战争，很可能是被斩首的。

然而，与其同行的西班牙人在占据了桑海帝国后并未跟随朱达尔一起回国。据说，当阿斯基亚军队袭击他们时，他们总是高呼着“拿起武器”（al arma），久而久之，当地人都以“阿尔马斯族”称呼这些侵略者。

萨阿迪王朝继承战争后，这块过于遥远的土地便被摩洛哥王国遗忘了。因此自1612年起，虽然当地在政治上仍属摩洛哥所有，当地居民却一直自己推举自己的首领［摩洛哥派去的最后一位总督是一位名叫穆罕默德“拉尔戈”（Mahmoud “Largo”）的西班牙雇佣兵，他在一次政变中被当地居民推翻］。1646年，第一位当地人出身的阿尔马斯族首领被选

出，这象征性地意味着当地的正式主权得到承认；但1892年法国人侵略此处时，通布图人仍然在向摩洛哥苏丹请求支援。

遵循惯例，朱达尔手下的军官迎娶了不少当地的阿斯基亚王朝后裔女子，自军官往下，各级士兵都与和自己社会阶层相当的当地女子通婚，有些娶了文人家族的女儿，有些则与商人家庭联姻。于是当地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以民兵为主体的混合贵族阶级，他们的服饰穿着与当地人截然不同，身背托莱多直剑，而非当地人的弯刀；同时根据自己的阶层选择不同类型的服装。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在贝宁共和国的军队服装风格中看到这种传统的影响：军人们穿着被称为“布胡斯”的托加长袍，自指挥官往下，军官穿红色制服，普通士兵穿黑色制服，中层士官的制服颜色则是黄色与绿色。

阿尔马斯族在崛起的过程中，吸纳了成百上千名从西班牙背井离乡而来的摩尔人，因此愈发繁荣昌盛。当地人的自治政权一直延续至1737年。之后，图阿雷格人[11]的军队征服了此地，但阿尔马斯族的存在及多年的支配地位所留下的影响依然深远。

然而，这种异端的文明最终注定消失。根据马里政府当局的命令，阿尔马斯族那些带有西班牙特色的姓名，如奥瓦、萨克、吉多、帕雷、孔塔、达波、托罗、欧罗、莱昂、加西亚、波图等，都被禁用，以支持建成一个以马里最大的部族班巴拉族为核心的统一文明。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何不该把法国探险家勒内·卡伊埃（René Caillié）1828年的通布图之旅定义为欧洲人在当地的首次冒险。唉！法国人哪！

[1] 朱达尔帕夏（Joder Pachá），16世纪军事家、探险家，出生于西班牙。

[2] 桑海帝国，西非古国，为萨勒赫地区最后一个黑人原住民帝国。

[3] 马里帝国，13—17世纪西非强大的伊斯兰教帝国。

[4] 萨阿迪王朝，中世纪摩洛哥阿拉伯人建立的伊斯兰封建王朝。

[5] 皮埃尔·贝尔托（Pierre Bertaux，1907—1986），法国历史学家。

[6] 原文Joder在西班牙语中有诅咒、咒骂的含义。

[7] 即马哈赞河之战，1578年摩洛哥军队为捍卫民族独立与葡萄牙军队在马哈赞河畔进行的决战。因葡萄牙国王、摩洛哥当朝国王与被废国王均参战，因此又称“三王之战”。

[8] 摩尔人，指西北非人。

[9] 摩洛哥为萨阿迪王朝的统治地。——编注

[10] 菲斯，摩洛哥第三大城市。

[11] 图阿雷格人，撒哈拉的一个游牧民族，属柏柏尔族支系。

神对我言

Dios me habla



有一种恶魔般的组合十分引人注目：如果疯狂者拥有权力，尤其是当这种权力全然不受约束时会怎样？这些狂人的历史值得仔细反思，不能只是简单地评定他们疯了。其中最极端的例子之一，就是北非伊斯兰法蒂玛王朝第六任哈里发 [1] 艾布·阿里·曼苏尔（Abu Ali Mansur），即哈基姆（Hākim）的故事。

法蒂玛王朝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诞生，逐步发展到繁荣富足。王朝的信徒们在穆阿维亚 [2] 时代分裂。一部分教徒遵循固有传统，信仰逊尼派；另一部分则遵循第四代哈里发 [3] 所传达的“真主的旨意”，通过苦修的方式来赎罪，称为什叶派。自此，先知的女婿及其继承人被统称为“十二伊玛目” [4] 。然而，基于对奇迹研究的不同解释，从什叶派中又分离出许多支派，其中最壮大也最具争议的教派是信奉第七代哈里发伊斯玛仪（Isma' il）为伊斯兰神学的正统继承人，相信他具有神智和隐秘知识的伊斯玛仪派。该教派大力发展抒情艺术，信奉数字“7”及其倍数的神秘力量，关注微观世界，但同时他们也大肆劫掠，是不少袭击事件的罪魁祸首。

其中，源自也门的一支伊斯玛仪派分支在卡尔玛特人的帮助下，在突尼斯成立了自己的帝国（这些卡尔玛特人曾经劫掠圣城麦加，偷走并砸碎了圣石）。他们的后代发展为卡比利亚 [5] 的柏柏尔人。他们远征埃及与阿拉伯，甚至一路行至耶路撒冷，埃及的开罗城就是由他们俘虏的基督徒昭海尔·绥基利（Jawhar al-Siqilli）将军创建的。

第六代哈里发哈基姆身材高大，金发碧眼。他的母亲是耶路撒冷正统族长的姐妹，因此他在11岁时被选任哈里发，其政权纲领和其他哈里

发类似，亲近本族民众、建造清真寺、崇尚知识与科学。他创办了一所学院，并捐赠了一座巨大的图书馆，伊斯兰教的众多天文学家及大师都从中获益。

不幸的是，哈基姆的神经不正常，很快大家就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任期间，曾经修改宗教政策多达五六次。先是当地的逊尼教派遭到了他的迫害；接着是犹太人和基督徒；之后，连和他同源的什叶派也遭到了迫害。他命令犹太人和基督徒必须穿黑色服装、用木制的马具，女子必须穿不同颜色的鞋子，以便识别。他下令推倒了国内所有的教堂，只有伯利恒的圣诞教堂幸免于难。经过多年的恐怖统治，一些狂人（难道不是吗？）宣称哈里发本人即为“真主的化身”。这引起了什叶派的内乱，但为时已晚。苏丹的卫队宣称自己是“神降之兵”，并遵循“真主的旨意”大肆屠杀叛乱的民众。



由此，哈基姆的恐怖统治到达巅峰。后世的文人为他的疯狂寻找了各种理由开脱，说他的疯狂源于与逊尼派的斗争。但他的疯狂行径举不胜举，已经远非他偶尔的亲切与慷慨作为所能补偿，任何人都无法信任他。根据光学研究学者海什木 [6] 回忆，哈基姆曾质问他为何不能控制尼罗河的河水流向。尽管海什木具有极高的声望和民众影响力，面对这样的命令他也只能装疯卖傻。哈基姆曾下令将埃及的葡萄藤全数挖出，并禁止民众延续父辈的方式吃饭。他曾下令杀掉国内的狗，还不许人们

走在圣河的岸边。他命令民众日落而作，日出而息；他还曾在月亮下狂奔，嘴里各种胡言乱语；还有一次，他一时兴起，砍掉了宫中奴隶的手。这位疯狂的哈里发喜欢夜间骑着自己的驴巡视街道，就因为这个原因，有一次他看到有人在用鞭子抽打一头驴，就判了那个人死刑。

哈基姆的臣民们被迫忍受了他整整25年的疯狂统治。他最终死于谋杀，有人说是被他的姐妹杀害，也有人说是穷人因为收到的救济金太少而杀了他。出事当天，哈基姆正在穆卡塔丘山丘上观星。事发后，士兵们只找到他的驴，四蹄已经破碎；哈里发的衣服被撕下，整齐地叠好放在一口井边。哈基姆本人不见踪影。

多年以后，一位名叫纳什塔金·阿德拉兹（Nashtakin adDarazi）的波斯人宣称，哈基姆没有死，未来将会以“完全的神”的身份回归，带领教徒重返耶路撒冷和麦加。这一学说后来衍生为德鲁兹教派，但德鲁兹凶猛善战的战士后来拒绝承认阿德拉兹的学说，也拒绝认这位疯狂的哈里发为他们的王。

[1] 哈里发，意为继承者，是伊斯兰教国家宗教和世俗的最高统治者。——编注

[2] 穆阿维亚（Muawiyah，606—680），伊斯兰教第五任哈里发（661—680年在位）。

[3] 指阿里·伊本·艾比·塔里卜（Ali ibn Abi Talib，601—661），伊斯兰教历史上的第四任哈里发（656—661年在位）。他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也是什叶派唯一承认合法的哈里发。

[4] 伊玛目，意为领袖。十二伊玛目派是伊斯兰教什叶派中最大的派系，因尊崇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及其后裔等12位伊玛目而得名。

[5] 卡比利亚，阿尔及利亚北部柏柏尔人聚集区。

[6] 指伊本·海什木（Ibn al-Haytham，965—1040），阿拉伯学者、物理学家、数学家。在光学研究方面具有杰出成就。

罗克渡口

Rorke's Drift



“族群”——这是1862年时，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布利克（Wilhelm Bleek）对班图族人的总称，一听就是旅行者的惯用语。在近千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班图族人从喀麦隆逐渐扩散到非洲各地：首先是东方，其次是大湖区，随后转向南方，直至南非地带。当欧洲人踏上非洲的土地时，这些族群极具班图族特色的部落名足以令他们晕头转向：恩戈尼人、梭托人、茨瓦纳人、恩德万德韦人、恩德贝勒人……其中恩戈尼人中有一支小部落祖鲁族。祖鲁人起源于德拉肯斯堡[1]山脚下，在私生子出身的国王恰卡（Chaka）的领导下，这个部族逐渐演化成一台十足的战争机器。恰卡在后宫坐拥上百佳丽，但从未正式封过王后。他的孩子们在出生时就被他扼杀，有时为防孩子出生，他还会把怀孕的母亲一起杀死。他以简明而严格的军规对军队进行改革：禁止军队投掷长矛，要求他们与敌人贴身近搏；而一个战士如果归队时手边没有武器，就要被处死。他的军团在战斗时布阵井然有序：前方由那些最勇猛的战士开路，其他人紧随其后清理战场、补杀漏网之鱼；老将坐镇后方，侧翼则由年轻战士负责保护。



在恰卡统治时期，因战争、饥饿与流亡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百万。王国延续祖鲁族历来的军事传统，构建了高达5万人的强大军队。

直到1879年，这一军事传统依然延续着。当年，英国驻南非殖民地总督巴特勒·弗雷尔（Bartle Frere）爵士决定要不惜代价寻找一个借口以攻打祖鲁国国王赛奇瓦约（Cetshwayo），结束此前英国人与祖鲁人长达37年的和平共处。他寻找的开战借口包括一个祖鲁族族长的两位妻子

遭到绑架，传教士抗议已皈依的祖鲁人遭到不公平对待，等等。

英国人向赛奇瓦约发去最后通牒，要求祖鲁国解除军事武装。这一要求在祖鲁国王看来十分荒诞且粗鲁，他觉得白人仿佛就是莫名要展开一场屠戮："为何纳塔尔[2]政府要对我国的法律指手画脚？难道我也可以去纳塔尔随意命令他们吗？"

然而，英国人确实想改变赛奇瓦约的法律，并为此让切尔姆斯福德（Chelmsford）带领1.7万名军士进攻祖鲁国领土。大军在一个叫伊桑德尔瓦纳的地方集结，随后将军带领军队主力出发，这场战争当时看起来是很容易取胜的。

不幸的是，当时留驻营地的2500名士兵遭到了祖鲁士兵军团的袭击。英军派出步枪兵组成一道薄薄的防线，用马提尼—亨利步枪还击，防御很成功，祖鲁士兵纷纷倒在防线的1000米开外。然而子弹很快打完了，需要重新上膛，而英军指挥官居然蠢到没有事先用车辆堆一道防御线（就像我们在西方电影中经常看到的那种"车阵"）。2万纪律严明、血性十足的祖鲁士兵此时发起猛烈进攻，英军完全无法招架。在这场战役中，4000名祖鲁战士阵亡，而留守营地的英军则几乎全军覆没。

祖鲁人从战败的英军那里缴获了数百把火枪，受到这场胜利的鼓舞，战士们情绪高涨，他们不满足于处决眼前这区区100多名残兵败将（不包括逃走的士兵和殖民者），而决定趁热打铁，继续攻克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名为罗克渡口的英军据点。

对驻守罗克渡口的英军来说，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罗克渡口的营地建在两座旧农场附近，房顶都是用茅草做的，几乎不具备任何防御能力。军队的营地建在一个洞穴内，四周有3道高墙环绕保护，附近只有果园、几堵墙和一些小型农业建筑。

当时驻扎在罗克渡口的两位陆军中尉是约翰·查德（John Chard）和冈维尔·布罗姆黑德（Gonville Bromhead），两人一个是聋人，另一个则几乎完全没有战斗经验，都被军队高层认定为"失败案例"。军官们在酒馆里开了个会，一位名叫詹姆斯·多尔顿（James Dalton）的资深军士前来助阵。此人身高近2米，已年过五十，他帮助军官们寻找可能的应对方案。他们发现，营地里当时只有区区100多名士兵，其中很多人还是病号或伤兵（因为据点里还有一家医院）。而他们要面对的，是祖鲁国王的兄弟达布拉曼兹（Dabulamanzi）所率领的4000多名祖鲁士兵。

罗克渡口的战士们战斗得非常精彩。首先，他们用箱子和面粉口袋筑起了一道高达1.5米的防御工事，并在其中留出射击孔，供熟练的步枪兵对外瞄准开火。下午4点30分，祖鲁大军到达战场。祖鲁人的数量如此之多，防军的人手又如此匮乏，导致营地的驻军不得不一头开火，一头补修防御工事。他们在第一道防线坚持抵抗了一个半小时，直到马提尼—亨利步枪因为过热，铜子弹受热膨胀而卡壳。祖鲁人开始爬墙，于

是军队调拨了一组人马驻守胸墙的中心地带，手握长矛，一一刺杀那些想要攻入的祖鲁战士。与此同时，祖鲁人站在附近的高地用步枪射击，时不时也会打死几个英国士兵。

到了晚上7点，医院被烧，英军退后到胸墙内侧。胸墙呈圆形，高3米，由面粉袋堆积而成。当时附近就有军队，但军人们看到火光冲天，看到祖鲁部落的士兵，吓得没有靠近。不过这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

直到半夜，祖鲁人仍在一波波地冲锋进攻。士兵们渐渐开始感到疲惫，全靠火光照亮夜晚才能抵御进攻。半夜后进攻才逐渐零散。

到了早上7点，战斗终于结束了。在这场战役中，大约有800名祖鲁士兵死亡。英军死亡17人，10人受伤，他们在这场战役中足足打光了2万发子弹。

[1] 德拉肯斯堡，位于南非和莱索托境内的一组高大山脉。

[2] 当时纳塔尔地区被英国政府控制。——编注

拉巴赫
Rabah



拉巴赫（Rabah）是非洲地区最后一位伟大的征服者。他于19世纪中期出生于喀什穆或森纳尔（位于青尼罗河一带），两种说法我都看到过。拉巴赫是阿拉伯人与苏丹人的混血后代，他最早曾是埃及军队的一名士兵，后来转为埃及加扎勒河省的统治者、黑人奴隶商人祖拜尔·拉赫马帕夏（Al-Zubayr Rahma Pachá）的手下，为其捕猎奴隶。当时，自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开始，埃及政府侵占了苏丹国与上尼罗河流域，开始系统化地劫掠当地资源，并先后征服了丁卡族、努尔族、希鲁克族等等，甚至一路打到几个大湖区域。

然而，祖拜尔·拉赫马帕夏试图征服达尔富尔时，军队却大败而归。他的力量引起了埃及当局的忌惮，于是当局将他叫到开罗软禁了起来。祖拜尔的儿子苏莱曼（Suleyman）为此发动暴动，想救出父亲，但上尼罗河流域的政府当局派出一位名叫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的白人军官率领军队镇压了他的暴动。

拉巴赫是这场暴动中仅存的几个幸存者之一。他带着几百把步枪，逃亡到加扎勒河省的沼泽地带，并很快招募起一支由像他一样的混血黑人和奴隶士兵们所组成的骑兵和步兵部队。当最终逃离加扎勒河省时，他已经召集起800多名士兵。

短短几年之后，拉巴赫的部队就打下了大片江山，将达尔富尔、乍得湖与乌班季河等区域都纳入自己的版图；并在此基础上，沿着沙里河岸先后征服了瓦达伊、巴吉尔米和博尔努三国。他的军事独裁相当强硬，但与此同时，他也尝试着推进行政的合理化。同时，他还努力从英

国人那里争取更现代的武器，可惜收效甚微。

中苏丹国遭遇灾难的起源，在于法国政府盯上了巴吉尔米。1896年，巴吉尔米苏丹曾向法国政府求派援军。拉巴赫得知后，袭击并杀光了法国政府派来救援的军队。之后在1899年，法国政府派了一位代表费迪南·贝哈格尔（Ferdinand de Béhagle）前来交涉，拉巴赫与他激烈争吵后将他吊死了。同年，法国军官布勒托内（Bretonnet）率领的军队在托格堡战役中也吃了败仗。同时，拉巴赫的盟友、亲家以及名义上的附属国首领穆罕默德·赛努希（Mohamed El-Senusi）也与法国人交恶，对法国人打通刚果与苏丹的计划造成了阻碍。

法国人最终决定，必须用战争永远洗刷掉这些耻辱。于是，他们以拿破仑的名义（请原谅我在这里开个玩笑），派出3支大军共同袭击中苏丹国。其中一支大军由埃米尔·让蒂（Émile Gentil）统帅，从南面的法属刚果殖民地出发。第二支军队在富罗（Foureau）与拉密（Lamy）少校的统帅下，从阿尔及利亚出发，千辛万苦地穿越了撒哈拉大沙漠，行军途中不断被图阿雷格人袭击，还差点被阿加德兹的苏丹俘获。第三支队伍自西方出发，沿着尼日尔河的河岸前进，他们的故事我们留待日后再说。这支军队由若朗（Joalland）中尉与梅尼埃（Meynier）中尉指挥，人数较少，但在向乍得湖行军的过程中他们成功占领了津德尔。3支大军最终在乍得湖南面的库赛里市会合。当地位于今天喀麦隆境内，与乍得首都恩贾梅纳相邻。自南方而来的大军乘坐一艘名为“莱昂·布洛特”的汽船先行抵达，与拉巴赫的军队先打了一场前哨战并获得胜利。三方会合后，军队的指挥权被移交给拉密少校。



拉巴赫派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近万名士兵、火器装备充足。其中，400名士兵配备了现代步枪。同时军队中还备有从布勒托内中尉的军队那里抢来的3架大炮。剩下的数千名士兵则装备着长枪、弓与剑，共同组成抵抗军队的阵容。



法国人的军队人数较少，只有700多人，但装备更精良。其中大多数士兵是塞内加尔的步枪兵，另外巴吉尔米苏丹还派出800多名士兵增援，其中包括200名骑兵。

1900年4月22日，库赛里战役正式打响。法国军队兵分三路，共同攻击拉巴赫的营地。营地靠近当今恩贾梅纳地区，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只留下对沙里河一面的出口。大炮与步枪连续两小时的猛烈火力足以完成这次围攻了。在混战中，法国大军的统领拉密战死，但擅长战斗的塞内加尔步枪队还是成功抵挡住了对方的进攻。拉巴赫部队的幸存者试图越过河流逃亡，但大部分都阵亡了。

拉巴赫本人也在逃亡的队伍中，不幸的是，一名从他的军队叛逃到法国军队的士兵认出了他，对着他的脑袋打出了一颗子弹。为了赢取奖赏，这位士兵割下拉巴赫的头和手，还串在一块儿，骄傲地展示，仿佛找到了一幅失落已久的名画。

拉巴赫的军队随即土崩瓦解，残存势力也被巴吉尔米人打败——此事件揭开了当地20世纪的帷幕。

伍雷—夏诺恩联合军团

La columna Voulet-Chano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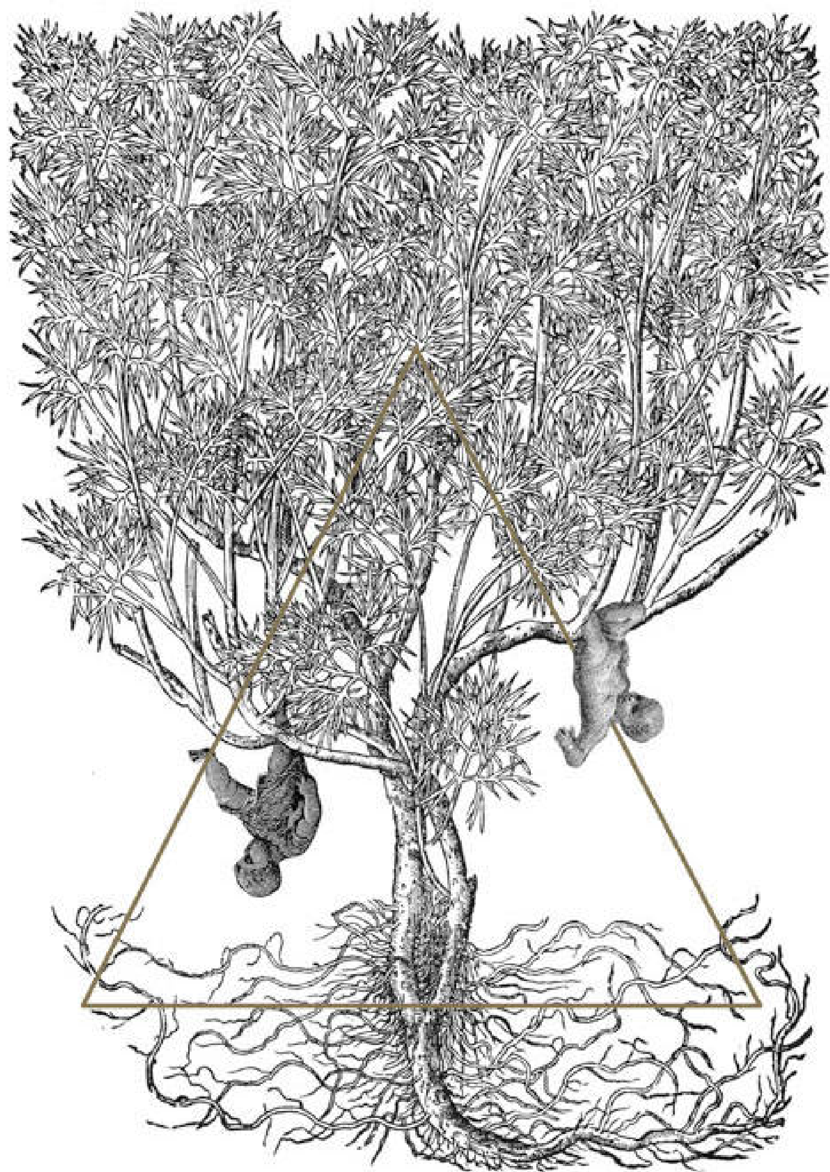


在之前的故事里我们曾提到，法国人曾经兵分三路围攻拉巴赫。其中一支军团起先由两位军官率领：其中一位名叫保罗·伍雷（Paul Voulet），是一位医生的儿子，由于没有完成学业只好参军当了雇佣兵，在与莫西族的战斗中取得军功，荣升为队长；另一位军官是夏诺恩（Chanoine）中尉，与同事不同，他是圣西尔军事学院科班出身的军官，还是一位军人贵族之后。

两人率领的军队一开始分头前进，曾在塞古短暂会合，之后又分开，一直行军到今日尼日利亚境内北部，两支队伍才正式合并。军队中几乎没有法国人：全军只有8名白人，都是军官或士官；大部分士兵是来自塞内加尔的步枪兵——都是熟练的射击专家，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出风头。除此之外，还有挑夫和妇女，理论上这些人只负责后勤工作。两支军队联合后，总数超过1500人。然而，由于军队不断劫掠所经之处的妇女，队伍里的总人口很快就增加了。

联军行进到索科托哈里发国[1]的豪萨附近时，当地由于饱受战乱与饥荒之苦，已经无法提供军队所需要的大量补给——这支军队每天仅仅饮用就需要消耗3万升水。于是联军开始野蛮地四处劫掠，烧毁村镇，只要居民稍有反抗就大肆屠杀。即便在那个年代，他们的残暴行径也可说是太过分了，但军队心存侥幸，认为他们只要能打败拉巴赫就好，反正这些行为不会被传到欧洲去。最残暴的屠杀发生在1899年5月：联军在比尔尼恩孔尼[2]杀害了超过1万名居民。有人后来用一幅惨无人道的画面来描绘联军的罪行：孩子们的尸体一排排挂在枣椰树上，就像一连串黑色的剑鞘。

然而，联军的运气不佳：一位名叫佩托（Péteau）的年轻随军少尉与伍雷发生了几次争执，被赶出军队，流放到萨伊镇（一个尼日尔河边的小镇，当地有法国驻军基地）。佩托给未婚妻写信时，描述了自己长官的种种兽行，以及自己对这些行径是如何地反感。他的未婚妻为信中所描述的惨状震惊，于是将这些信件转交给当地议员，之后议员又将此情况向殖民地的法国官员进行了通报。内阁成员有可能是真心被这些罪行吓到了；也有可能是想要借此机会打击报复刚刚下台的夏诺恩中尉的父亲（老夏诺恩将军在战时曾加入内阁）；又可能是害怕信中所描述的信息被公之于众，成为法绍达事件[3]与德雷福斯事件[4]之后的又一丑闻，对已经处在低谷的法国政府造成更大的伤害——总之，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内阁一致同意立即将两名军官解职，并派遣一名高级将领前去缓和局势。他们任命了一位名叫克拉伯（Klobb）的殖民地中尉、苏丹时代的老将快速前往当地平息局势。1899年7月13日，克拉伯来到了津德尔附近的达科里。



到达津德尔后，克拉伯先派一名使者去向联军通报上级的命令。然而，伍雷当时已经杀红了眼，他表示绝不会离开自己的军队，并威胁说，他手下的600名步枪兵都只听从他的命令。这一决定相当冒险，可以说是宣告了他以下犯上的事实，势必只能以叛乱收场。但伍雷决定“破釜沉舟”，企图将自己打造成一名像萨莫瑞[5]或是拉巴赫那样的征服者。他对自己的士兵说：“从现在开始，我不再是法国人了。我将成为黑人们的领袖，带领你们一起打下一片江山。”

克拉伯对此事尚一无所知。7月14日，他独自前往联军驻地传达命

令，没有带上自己的“荣耀军团”。然而，还没等他走到目的地，伍雷就命令步枪兵向他射击，部队忠实地执行了这一命令。可以想象，克拉伯当时一定震惊极了。但凭射击手的实力，相信他没有经过多少痛苦的挣扎便很快离开人世。

在这之后发生了什么则众说纷纭。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联军士兵对伍雷的建国梦毫不买账，并为此发动了兵变，两名军官都被塞内加尔士兵杀死（7月16日夏诺恩被杀，17日伍雷被杀）。之后，两名法国军官接手了整个军团：一位是若朗中尉，出发时随军的8名白人之一；另一位梅尼埃中尉则是克拉伯军队里的随行人员。两人率领军队在之后的库赛里战争中立下战功，荣耀凯旋，返回法国。

消息传开后，人们都说是非洲的恶劣气候令联军的两名军官得了癔症，才使得他们的行为如此疯狂。而法国政治家、作家维恩·德奥顿（Vigné d'Octon）在次年发表的作品《剑之荣耀》（*La Gloire du Sabre*）中却为读者们精确描绘了两人的丑恶灵魂。

[1] 索科托哈里发国，19世纪的一个西非伊斯兰国家。

[2] 比尔尼恩孔尼，尼日尔的一个小镇。

[3] 法绍达事件，1898年英法之间的东非殖民地争夺事件，以英国的外交胜利告终。

[4] 德雷福斯事件，1894年发生在法国的一起政治丑闻。法国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指控犯下叛国罪。

[5] 指萨莫瑞·杜尔（Samori Ture，1830—1900），非洲历史上瓦索卢帝国的创建者和统治者，曾领导反抗法国的殖民统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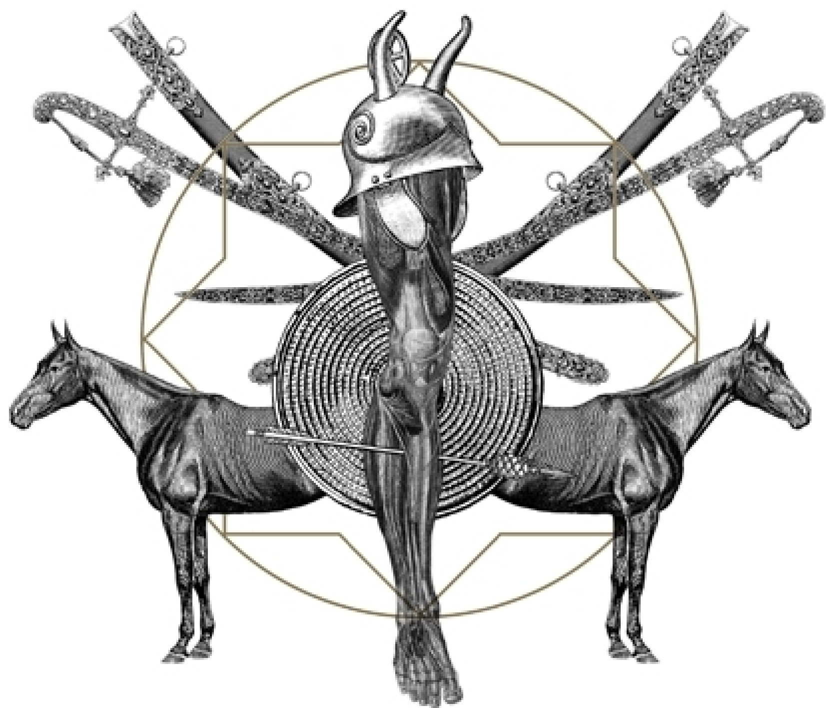
亚洲
ASIA

战乱
Agit ación



1405年1月，帖木儿——这是土耳其人对他的称呼，欧洲人则称之为“塔梅尔兰”，源自波斯语，意为“跛子帖木儿”——带着他的百万大军，在讹答剌 [1] 驻扎。阿雷斯河从这里流向锡尔河，彼时，当地的绿洲已被冰雪覆盖。当时帖木儿几近失明，行动也十分困难，但作为一个广袤帝国的帝王，他依然备受士兵爱戴。也许我们很难想象他的想法，但十有八九他会承认自己是一个幸运的冒险家。帖木儿一直梦想着征服东方的明朝，在这种野心的驱动下，他在临死前依然坚持集结大军，准备将远征明朝之战作为自己最后的战役。

帖木儿一直是个没什么耐心的人。他的军队从撒马尔罕出发，一路扬起军旗急行军至讹答剌。尽管当地寒风刺骨，马冻死了，军队冻伤了，但没人敢忤逆他的旨意。当时，帝国中有来自各国的使节，就像那位西班牙的大使 [2] 一样，这些使节都对帖木儿充满畏惧，不管他们是否认识他。大家心知肚明，这场战争不可能胜利，然而谁也不敢抗议，只得埋头进行战前准备，等待大军开拔。但远征途中帖木儿却发起了高烧。他知道自己这次挺不过去，便在死期将至前对他的埃米尔 [3] 及亲朋好友下令，在他死后不准哀哭，因为哭号是没法令人起死回生的。



帖木儿不是一位像成吉思汗那样的建设者。他所到之处，通常只留下灾祸。早年他和碌碌众生一样，只为生存而奋斗。青年时代，他曾在锡斯坦 [4] 的一次战役中被箭射穿了一条腿，从此落下终身残疾。他曾和其他埃米尔共同发起起义，因表现英勇而受到奖赏，也因此引起众人的妒忌。当时，察合台汗国 [5] 表面上是帖木儿的敌人，察合台人的将军想要收买他，他却将这些贿赂交到图格鲁克王面前，将之说成是这些将军怀有二心的证据。图格鲁克闻言大怒，立即将那些将军赶走，又授予帖木儿河中地区 [6] 的管辖权。由此，帖木儿从一个无名之辈开始，一步步向上爬，但当时他还未拥有自己的私人军队，命运也完全取决于他所侍奉的君主的心情和喜恶。和成吉思汗一样，他也曾经经历过从权力巅峰瞬间跌落谷底的挫折。有一次，帖木儿截获了图格鲁克的一封信，此事改变了他的命运：在信中，他发现图格鲁克答应杀死自己，好把职位留给儿子。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帖木儿只带了几十名部下匆匆出逃，随后他命令部下分头行动，以混淆追兵的视线。他则只身一人，带着妻子和一个用人逃到一个陌生的国度，被当地人俘虏；随后他又设法逃出监狱，奋力逃生。但当他听到有人高喊“囚犯逃跑了”，他又转过身去，拔剑直面追兵，只为告诉他们：“帖木儿从来不会逃！”

之后的历史充斥着战争与死亡：帖木儿重新征服了两河间的河中地区，并在当地建立起撒马尔罕和布哈拉 [7] 两大城市。之后他又相继征服了蒙兀儿斯坦 [8] 、波斯、伊拉克、亚美尼亚，并最终征服了金帐汗国 [9] 的广袤草原。

帖木儿花了5年时间征服波斯和巴格达，随后是高加索地区；但他依然不满足，之后又挥军攻入印度，虽然这场战争令他的军队元气大伤，但最终他还是赢了。作为报复，获胜后他在德里屠杀了1万名战俘。

很难想象，这样一位传奇人物，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会想到些什么。也许他会回想起安卡拉[10]漫天的沙尘，在那场战争中，帖木儿和巴耶济德[11]旗下的50万大军为争夺亚洲未来的霸主地位而浴血奋战。但我更愿意相信，在这一时刻，这位霸主更可能回想起游牧民族对草原生活的最本质的爱。

***

帖木儿最大的敌人是金帐汗国的可汗脱脱迷失。在这位可汗所统治的广袤草原上，伏尔加河与数百条其他河流交织而过。在与帖木儿的战争中，脱脱迷失屡败屡战，每次失败他就会逃回自己坚固的要塞，重整旗鼓后再次进击。

1390年，帖木儿下定决心，打算攻入宿敌的老巢，彻底打败他。只有真正的冒险家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他下令所有适龄男子参军，并命令军队准备1年份的粮草。每个士兵都被要求带上1把弓和1袋箭。每两名士兵备1匹马，每十名士兵准备1座帐篷、2把锄头、1把镐、1把镰刀、1把锯子、1把斧子、2把锥子、100根针、100个绳结和100根绳索，外加1口大锅。出发前，所有装备先由军饷代付。

此次远征十分辛苦，远征军到达锡尔河沿岸地区时，有些人发起了高烧，天上下起雪，平原上的泥浆溅了人一身。但经此一役，军队对帖木儿却更加忠诚了，毕竟在忽里勒台[12]上，是这些人自己一致决定要发起这场战争的。

在足足1个半月的时间里，帖木儿旗下的万人大军一直在别特帕克达拉草原的荒漠中徘徊。在这片著名的“饥饿草原”上，不时有人晕倒甚至死亡。他们找到了一条不知名的河流，解决了饮水的问题，饥渴并不能阻止他们前进的步伐。全军只在草原中央的山上停了停，帖木儿在几名部下的陪同下登高望远，欣赏了一番草原广袤的风光，随后他下令在当地建立一座方尖碑，并刻下日期以作纪念。

在他们重新开始行进之后的3个月，粮草已经耗尽。为了满足全军庞大的供给需求，他们开始在沿途大肆劫掠，就这样一路行进到托博尔河的发源处。为寻找脱脱迷失的踪迹，他们俘虏了10名敌军士兵，从其口中打探到了情报。大军最终来到了昆都尔察河岸，即如今的萨马拉[13]北侧，伏尔加河的河岸旁。

经过数千公里的长途跋涉后，帖木儿的军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敌人。但是他们有什么优势吗？完全没有。军队人数锐减，精疲力竭，而对手却是和他们一样在马背上长大的游牧民族战士。他们只有一项精神

上的优势，那就是对自己的跛足领袖的忠诚信念。

时值盛夏，但一个反常的现象出现了：两军相接时，突然刮起了暴风雪，导致军队原地停留了1个星期。

战争持续了整整3天。在第三天时，脱脱迷失率军直捣帖木儿军队的核心，但他的军旗却在此时意外地掉在地上，引发全军混乱，最终导致溃败。原来，之前刮暴风雪的那几天里，帖木儿已经提前贿赂了脱脱迷失的掌旗官，叫他故意丢下军旗，造成可汗阵亡的假象。

这场战争造成了数以千计的士兵白白牺牲。战争结束后，胜利者们纵情狂欢长达26天。

[1] 讹答剌，花剌子模王国的东方重镇。

[2] 指克拉维约（Clavijo），西班牙大使，当时驻撒马尔罕。

[3] 埃米尔，阿拉伯国家的贵族头衔。此封号用于中东地区和北非的阿拉伯国家，历史上突厥也曾使用过这个称号。

[4] 锡斯坦，位于现代伊朗东部和阿富汗南部的历史区域。

[5] 察合台汗国，蒙古四大汗国之一，1369年亡于帖木儿帝国。

[6] 河中地区，指中亚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以及泽拉夫尚河流域，包括今乌兹别克斯坦全境和哈萨克斯坦南部。

[7] 布哈拉，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西南部的一座城市。

[8] 蒙兀儿斯坦，即东察合台汗国，由察合台汗国所分裂。

[9] 金帐汗国，又名钦察汗国，蒙古四大汗国之一。

[10] 安卡拉，土耳其第二大城市。

[11] 即巴耶济德一世（Bayezid I，1354—1403），奥斯曼帝国第四任君主，在安卡拉之战中被帖木儿击败并俘虏。

[12] 忽里勒台，古代蒙古及突厥民族的一种军政议会。

[13] 萨马拉，1935—1991年曾被称为古比雪夫，是俄罗斯萨马拉州首府，伏尔加河上的港口。

摩耶 [1]

Māyā



1876年，莫卧儿王朝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Bahadur Sah II）去世后，印度王室后继乏人，于是大不列颠与爱尔兰女王维多利亚一世宣布同时加冕为印度女王，由迪斯雷利 [2] 负责代理印度事务。巴哈杜尔沙二世是个诗人，曾给自己写下墓志铭。我们这个故事的主角也同样是个诗人，不过他比较倒霉，直到年满四十，都没人给他题过墓志铭。

不过，我们的主角在四十岁之后还活了很久。作为女王指派到印度任职的官员，他曾凭借自己在英国政界的后台，在当地组织社交晚会，邀请众多达官贵人参加。此人名叫爱德华·罗伯特·布尔沃·利顿（Edward Robert Bulwer-Lytton），是利顿家族的第一位勋爵。

利顿勋爵的父亲爱德华·布尔沃·利顿（Edward Bulwer-Lytton）是个讨人嫌的作家（我曾翻阅过他的父辈和祖辈的藏书，其中一本《庞贝古城的末日》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他送儿子去一所贵族学校读书，之后又送他去德国读大学（我猜是想对儿子的学业眼不见为净）。利顿勋爵曾以“欧文·梅勒蒂斯”（Owen Meredith）为笔名写诗出版，他的诗作冗长烦人，但很有时代特点，深得女王喜爱：

五月节已至，当然——

在这繁荣的五月——

万物蓬勃，生生不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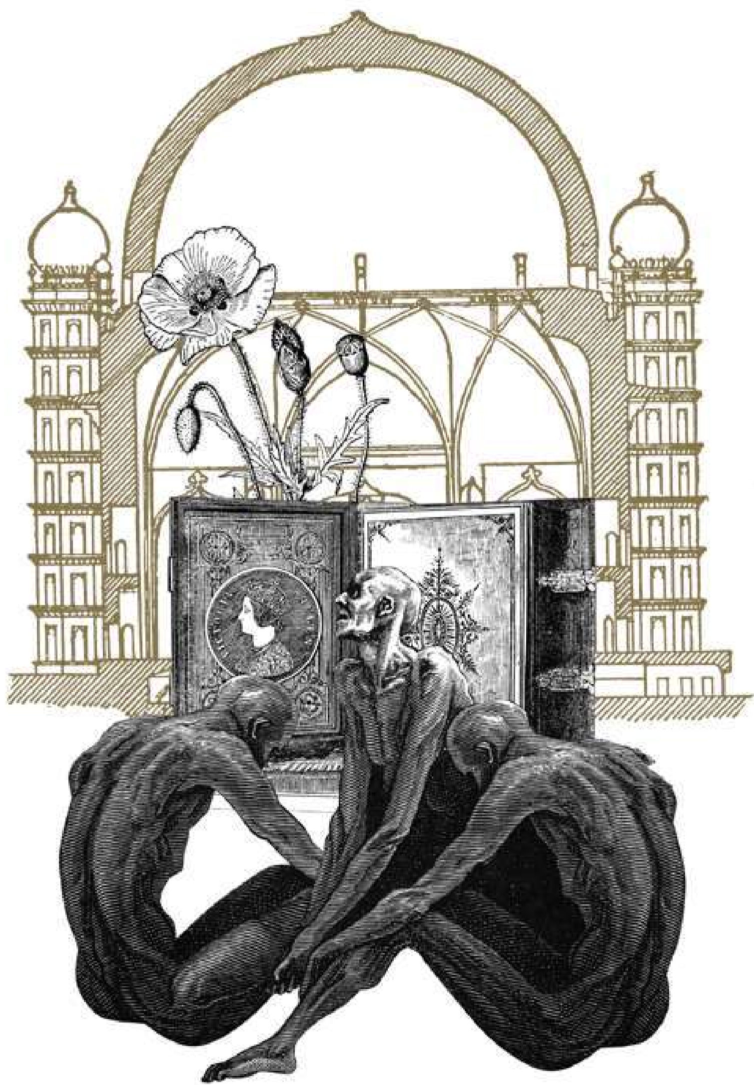
纵情享乐

伦敦的集市中充斥着

少女的喧嚣，草莓的芬芳

——摘自诗作《甫一出门》

如今，这首诗的部分词句被用在歌曲《露西尔》（*Lucile* ）中，再度发扬光大，当然作者也不用另行请求授权。而在当时，斯温伯恩[3]曾指控利顿勋爵剽窃乔治·桑（George Sand）的作品，奇怪的是他自己的父亲布尔沃·利顿也曾对他提出过相同的指控！这种行为着实有违常理，也许是吸食鸦片带来的后遗症：父子两人都对鸦片上瘾。



　　总之，仅凭文学水平而论，利顿勋爵本不可能留名至今。但不幸的是，他还是个政治家。在从事了几年外交官工作之后，他被任命为印度总督，接替前任诺斯布鲁克伯爵（Earl of Northbrook）。利顿勋爵天赋平平，但这可能正是他在仕途上飞黄腾达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他的上级被他误导，花了太久才发现他的愚蠢行径。当时，迪斯雷利与索尔兹伯里（Salisbury，二人皆是英国有权有势的印度大臣）想要阻止沙俄的影

响力进一步向阿富汗渗透，并借机一雪大英帝国在开伯尔一战 [4] 中伤亡惨重之耻，于是在1877年，他们重新提名了一位印度总督，并宣布撕毁为应对德国而结成的英—法—俄秘密联盟。

然而很不幸，利顿勋爵上任后铺张浪费，把资源主要消耗在两件事情上：一件是日后被命名为第二次阿富汗抗英战争 [5] 的无底洞；另一件符合我们对19世纪印度殖民地豪华奢侈生活的想象，但其背后却隐藏着被遗忘的罪恶。

当时，索尔兹伯里伯爵对利顿勋爵说，英国议会决定在印度举办一场盛宴，来表达对维多利亚女王的拥戴。他要求利顿勋爵尽一切可能，通过这场活动展示大英帝国的财富与权势，要做到令当地的印度王公都自愧弗如。利顿勋爵忠实地完成了他的命令。1877年1月，他在印度组织了一场豪华盛宴，出席人数高达6.8万。

这场活动本来只是一个铺张浪费的例子，但结合当时的可怕背景，此事的性质就变得尤为恶劣了。

事实上，自1876年起，整个德干高原 [6] 地区遭遇了极其严重的旱灾。整个季风季一滴雨也没下，大地寸草不生。到了1877年，降水依然匮乏。整个印度南部都被饥荒所席卷。然而，面对这种局面，英国当局非但毫不作为，还故意阻挠所有救灾行动，甚至将他们认为“太有同情心”的印度当地官员调离岗位。1877—1878年，近700万吨小麦被从印度运往伦敦。受灾的印度人本可以靠这些粮食撑过饥荒，但英国当局却坚信把粮食运到伦敦后，印度有能力通过“自我调节”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们对印度人实施严苛的律法，动辄责罚，令情况更加恶化（印度人是没有政治权利的）。他们甚至缩减了劳动者的饮食，导致许多人遭受饥饿的折磨乃至死亡。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荒谬的假设上，即担心如果政府出手救援，印度穷人会从此“寄生”于公共福利。长达两年的饥荒令当地人失去了一切，买卖儿童、抢劫甚至人吃人的现象都屡见不鲜。当雨季重新到来时，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种植，也没有任何牲畜可以宰杀了。整个高原地带荒无人烟，只有一些地方还有一些奄奄一息的灾民在游荡。由于缺乏捕杀者，当地蚊虫肆虐，引发的疟疾将幸存的人也消灭殆尽。

关于恐怖灾情的报告日渐增多，但总督利顿勋爵直到1877年8月才从他在北方的宅邸回到了马德拉斯 [7] ，而且只是为了回来收税。有人天真地以为，灾区的惨状能够软化他的铁石心肠，但实际上他丝毫不为所动。在他的信中，他还曾表露出对灾民的强烈厌恶，说他们是“吃饱了撑的”，显露出无耻的狂徒嘴脸。

英国政府换届后，利顿勋爵离任总督岗位，在议会上，他的反对者就此事提出抗议。然而，以利顿勋爵为首的英国殖民地官员最终被宣判无罪。饥荒和由之而来的死亡都被简单粗暴地说成仅仅是干旱造成的天灾。

在短短3年时间内，这场灾难造成了600万至1000万人死亡。

[1] 意为“幻象、幻术”，最早出现在印度最古老的典籍《梨俱吠陀》中。

[2] 即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英国保守党政治家、作家和贵族，曾两次担任首相。

[3] 即阿尔杰农·查尔斯·斯温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1837—1909），英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

[4] 指第一次英阿战争（1839—1842），英属印度与阿富汗之间的一场战争，乃英俄在中亚角力时的首次大型冲突。——编注

[5] 第二次阿富汗抗英战争（1878—1880），阿富汗人民抗击英国入侵、维护民族独立的战争。

[6] 德干高原，位于印度中部和南部的著名熔岩高原。

[7] 马德拉斯，现名金奈，印度东南部城市。

蒙古人，西征欧洲

Bárbaros. Europa desde Asia



利德尔·哈特 [1] 曾经说过："中世纪时期最好的战略并非出自西方，而是源于东方。"尽管有些人不愿承认，认为优秀的军事战略源自更发达的社会文明与智慧，但我们要牢记，在中世纪时期，欧洲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半岛，默默无闻的世界一角罢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8个世纪以前。

当时，成吉思汗已经建立了日后大家熟知的大蒙古国。他手下的将领速不台 [2] 一直追击倒霉的花剌子模沙阿 [3] 直至里海，对方最终在那里去世。当时的蒙古帝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之一，而这个帝国的下一步，还在计划西征伊朗、伊拉克、东欧草原以及南宋。

现在，我们暂且不提蒙古大军的兵力情况，先专注了解一下速不台与哲别——蒙古帝国最著名的两员大将，是如何一路西进的。无须上级命令，两位勇士为获功名一路征战，心中无所畏惧，只求胜利。他们的主子曾独自一人从山野中白手起家，建立起庞大的军队，这项壮举也鼓舞着他们。据史书记载，蒙古帝国当时的兵力已达到三图们（即3万人）。在穿越高加索地区之前，两人大破巴格拉季昂王朝 [4] 格鲁吉亚的乔治四世旗下的骑兵，随后继续挺进帕米尔地区。蒙古军队如幽灵般神出鬼没，他们在山岭间、在捷列克河的平原上突然出现，对切尔克斯人、伊朗的奄蔡人以及源自土耳其的库曼人发起攻击。战斗十分危险：蒙古人曾多次处于战场劣势，这次也不例外。但速不台十分了解自己的敌人。他用马匹、布匹和珠宝贿赂库曼人，与其秘密结盟，借机在他们的盟友中挑拨离间——这是一场非常不光彩的交易。而在战胜高加索人后，速不台告诉库曼人他"不会给叛徒支付酬劳"。随后他追击库曼人，抢回了自己的战利品，并命令库曼人臣服于成吉思汗。钦察的草原及人

民都被交给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管理。这并不奇怪：蒙古首领的封地都由皇帝分配，有些人甚至对自己的封地毫不知情。此后蒙古大军继续前进，他们攻入克里米亚，烧毁了苏达克[5]，原本住在那里的热那亚人听说蒙古铁骑从东方而来，吓得早早逃跑了。之后，大军转向北方，穿过乌克兰的河流；与此同时，拜占庭[6]的皇帝正在忙着加固城墙。在行进过程中，速不台不忘收集欧洲的情报，大量打探关于北方王国、罗马城镇、西方基督教王室及德国皇帝的各种消息。



这里，我们要提一下库曼人的可汗可泰安，他在之前的战争中落败后，逃到了自己的女婿、“勇敢者”姆斯季斯拉夫 [7] 的城堡避难，并向斯拉夫人描述了这些东方战士的恐怖。于是，罗斯王国的王公们开始集结兵力，先杀了速不台派来的10个使者以示宣战。谁想蒙古人毫不畏惧，又派了两名使者来宣告他们的末日。由于太过震惊，王公们放了新使者一条生路。之后，双方在卡利奇克河边短兵相接，罗斯人与库曼人伤亡惨重。蒙古军队以弱势兵力赢得了这场战役，之后又在伏尔加河岸打败了保加尔王国。

就在此时，成吉思汗去世了。

接下来的16年具体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继任大汗之位，并在乌拉尔地区组建起一支全新的军队。根据史书记载，新的大军兵力高达15万人，但历史学家认为真实数量应该在其一半左右。这支大军由已故的术赤之子拔都正式统帅，但军队真正的首脑是速不台，他策划了西征欧洲的计划，而这一计划完成，正好如他所预计的那样用了16年。

当时在欧洲，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FriedrichII）已被教皇开除教籍，而耶路撒冷仍属于基督教国家。霍亨斯陶芬王朝 [8] 正与其祖辈一样，在意大利进行权力斗争。就在此时，波斯帝国派来一位使者向德国皇帝求助。蒙古大军从东方而来，攻占了一座座波斯城市。与此同时，从基辅罗斯也传来同样的噩耗。1238年，速不台打败了弗拉基米尔公国 [9] 的尤里二世，只有一个最北面的城市诺夫哥罗德幸免于难。蒙古人在冬日进攻，赶在积雪变厚、沼泽结冰、骑兵行动受阻前就已取得了胜利。显然，蒙古骑兵比拿破仑和希特勒更了解俄罗斯的天气情况 [10] 。战争胜利后，大军回撤休息，之后再次掉头向东方进发。

只有一个人最理解正在威胁欧洲大陆的这份恐怖：年迈的库曼族可汗可泰安对卡利奇克河之战记忆犹新。他在西方大陆四处奔走，向骄傲的欧洲国王们预告：死神即将来临。

[1] 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1895—1970），英国军事理论家、战略家。

[2] 速不台（1176—1248），蒙古帝国大将，蒙古侵略欧洲时的实际领军主帅，与成吉思汗座下另外3名大将哲别、者勒蔑、忽必来并称为“四獒”。

[3] 沙阿（shah），波斯语中古代皇帝的汉译名。

[4] 巴格拉季昂王朝，从中世纪至19世纪初统治格鲁吉亚的基督教统治王朝。

[5] 苏达克，克里米亚的一座城镇。

[6] 拜占庭，今伊斯坦布尔。

[7] 即姆斯季斯拉夫·姆斯季斯拉维哥（Mstislav Mstislavich，？—1228），时任

罗斯王国王公。罗斯又称基辅罗斯，为882—1240年以基辅为首都、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东欧君主制国家，是乌克兰、俄罗斯及白俄罗斯的前身。在1235—1242年拔都西征时被毁灭。

[8] 霍亨斯陶芬王朝，始于腓特烈一世的欧洲王朝。

[9] 弗拉基米尔公国，中世纪基辅罗斯的诸侯国之一。

[10] 拿破仑与希特勒都曾在冬季进攻俄罗斯，恶劣的气候条件是其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蒙古人，回军东撤

Bárbaros. Asia desde Europa

库曼人的可汗可泰安在战败后仍统治着超过4万户的库曼族家庭。这些人曾是游牧民族，不过长久以来，他们已在黑海以北的草原定居，那是一片富饶的土地。为避免战祸，可汗下令再次朝西方迁徙。所有库曼族人拖家带口，带着牲畜和细软，一路穿越第聂伯河、德涅斯特河，穿过当今的摩尔多瓦共和国国境，最后穿过加利西亚地区 [1] ，到达喀尔巴阡山脉一带。之后，他们来到匈牙利王国的国境边，请求当时的国王贝拉四世 [2] 收留他们为子民。

当时的场面十分壮观：成千上万的库曼人在匈牙利受洗。贝拉四世本人担任可汗的教父，其他匈牙利贵族也分别做了库曼首领们的教父。之后，库曼人才被允许在匈牙利定居下来。数个世纪以前，他们曾作为侵略者到过此地，如今他们则成了匈牙利人的臣属。库曼人在此生活的部分痕迹遗留至今，例如“科马内奇”（Comaneci）这样的匈牙利姓氏最早就源自库曼族（听着是不是有点耳熟？）。国王贝拉四世对此十分满意，他希望借此获得这些从属者的财产和兵力来应对来自远方的威胁，尽管在当时，这种危险显得还很遥远。



之后，一个英国使者出现了。史书上似乎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但毫无疑问，他是替那些侵略者们来匈牙利传话的。蒙古人之前也曾派汉人或突厥人做过信使，而在这一次，在历经9个月的跋涉后，他们选择派一位欧洲人来替大汗传话。没人知道这个英国人为何愿意去当蒙古人的信使，但他所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他宣称，窝阔台大汗君权神授，对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拥有统治权，要求匈牙利王国归服蒙古帝国并向其纳贡。不消说，贝拉四世狠狠嘲笑了这个使者，并将他凌辱了一番，随后就把他赶走了。几个月后，基辅罗斯人也来报信了。

当时隶属于瓦良格人的城市基辅，经历了弗拉基米尔一世 [3] 与“智者”雅罗斯拉夫 [4] 统治时的辉煌时代之后，随着拜占庭帝国的一蹶不振而日渐衰落，但它依然是基辅罗斯王公们值得骄傲的名城。它抵挡住了蒙古人的第一波攻击，将蒙古使者从城墙高处摔下以示惩戒。这一行为遭到了可怕的报复。1240年12月初，基辅失守，城市被夷为平地。只有少数几个贵族带着随从成功逃出，蒙古人放任他们逃走，好让他们在欧洲大陆传播自己的声威。贝拉四世这时开始担心了，但他依然对自己的军力充满自信，何况，他还能向邻国求援，那些国家的统治者都是他的亲戚。

蒙古人对这些欧洲王室的姻亲关系心知肚明。贝拉四世可能会向两位波兰大公求助，一位是桑多梅日 [5] 公爵波列斯瓦夫五世（Bolesław V），另一位是马佐夫舍的康拉德一世（KonradI）。西里西亚 [6] 公爵亨里克二世（Henryk II）以及德国皇帝的内弟、波希米亚 [7] 国王瓦茨拉夫一世（Wenceslaus I）也有可能会派兵相助。这些王公贵族们都实力雄厚，在面对任何外来威胁时，他们也都能通过内部结盟快速统一战线，共同应对敌人。

于是，速不台决定使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将这些欧洲的潜在对手们各个击破。他所运用的战术在欧洲闻所未闻，直到拿破仑时代才被再次沿用。

蒙古大军兵分几路。其中一支部队由窝阔台的儿子合丹率领，负责战术警戒。他们牵制着匈牙利北部盟国的动向，以防大军侧翼遭到击破，甚至被对方援军直取大军的后方。这支军队沿着与可泰安可汗相同的路线行进，穿过加利西亚后，在波兰分成灵活机动的小股部队，各自独立作战，同时通过信使互通信息，确保全军行动目标一致。通过这种作战方式，蒙古军队在1241年2月摧毁了波列斯瓦夫的封地桑多梅日，并在同年3月攻陷了克拉科夫 [8] 。就在不到1个月后，1241年4月9日，所有侧翼军队在列格尼卡 [9] 重新合流。西里西亚公爵亨里克二世从城中逃出，试图与波希米亚国王瓦茨拉夫一世会合，但最终没能赶上。包括公爵本人在内，数以千计的士兵在本次战争中死亡。拔都到达匈牙利时，蒙古军给他呈上了几十麻袋的人耳来宣告胜利，这些耳朵都是从战败者的尸体上割下来的。在波兰，贝拉四世已经找不到任何援军了。

此时，合丹正在等待另一支部队来与他会合。这支部队刚刚攻陷了

东普鲁士 [10] ，之后穿过波美拉尼亚 [11] 和波兰西部来与他会合。在列格尼卡之战发生两天之后，瓦茨拉夫一世得知参战的匈牙利人已经全军覆没。于是，他立即征集兵力，并从萨克森和图林根调派人手。德国人在西北处布下了严密防线，谁想合丹又带着大军转头向南，夷平了摩拉维亚。波希米亚国王最富饶的几处封地纷纷沦陷，奥帕瓦、乌尼乔夫、布伦塔尔、布尔诺全都惨遭劫掠，寸草不留。面对如此神出鬼没的对手，欧洲人完全想不出应对之道。

正当合丹的部队令波兰全境陷入恐慌时，蒙古大军的主力直扑喀尔巴阡山脉（一路造成死伤无数），随后分成3股独立作战的分队。中央部队，也是人数最多的一支，最晚开始发起进攻。与此同时，两支侧翼部队沿着多瑙河入侵匈牙利，一直打到佩斯。

这时，欧洲人却正在为他们的歧视行为付出代价。战争即将来临之际，数千名库曼族战士涌向匈牙利首都，寻找他们的可汗可泰安，但此时城内却发生了暴动，可泰安被暴民残忍杀害。匈牙利人指责他带来了灾祸，因为蒙古使者曾以匈牙利人收留了自己的手下败将库曼人作为宣战借口。库曼人得知这一消息后便纷纷逃走了，他们连夜集结，带上行李，杀出一条血路，一路逃往南方，朝着保加利亚的方向去了。贝拉四世失去了他的兵力，用库曼人对付即将到来的对手本应最合适不过。有传说称，拔都之前就曾私下给贝拉四世带过口信，警告他库曼人会临阵脱逃。毕竟，他们是游牧民族，四海为家，但国王却不能抛下自己的城市不管。

最终，在经历了一系列前哨战之后，贝拉四世终于准备与蒙古军队正面交锋了。匈牙利军队驻扎在绍约河的右岸，开战前，一个从蒙古阵营逃出来的鲁塞尼亚人告诉国王，蒙古人打算越过蒂萨河上的一座废桥发起进攻。于是，贝拉四世的弟弟科罗曼（Colomán）与乌戈林（Ugolino）大主教带着圣殿骑士团抢先行动，占据了桥上的据点。战斗开始后，匈牙利士兵重创了蒙古军的前哨部队，逼得他们连连后退。蒙古军队用投石机向科罗曼与乌戈林的部队攻击，同时开始渡河。第一波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匈牙利战士们严防死守，等待贝拉四世派军支援。然而，速不台其实在前一晚就已悄悄带军南下，从远处渡过了蒂萨河。匈牙利军队一下子被两面夹击，最终被蒙古大军围困起来。科罗曼和乌戈林两次试图冲破包围圈，但都没有成功。而在远处，蒙古人主动在包围圈上放出一个缺口，沿用经典的“围三阙一”战术，放任逃兵从此处逃走以扰乱军心，再从背后追上逃兵，给他们致命一击。这场战斗对贝拉四世和他的兄弟来说，无疑是一场噩梦。两人费尽千辛万苦终于突破了包围圈，几天之后，科罗曼就因伤重不治过世了。在短短1个月内，蒙古人从波罗的海打到多瑙河，已经占领了欧洲1/3的土地。

教皇与德国的皇帝腓特烈二世为此互相指责。教皇指控腓特烈与阿尤布 [12] 苏丹卡米勒（Al-Kamil）为伍，与鞑靼达成了秘密协议，纵容他们侵略欧洲。作为报复，德国皇帝则在严惩教宗派人士。而与此同时，拔都沿袭蒙古人的一贯传统，对可怜的贝拉四世穷追不舍。他手下

的军队一路追赶贝拉四世经过克罗地亚与亚德里亚海岸，最终贝拉四世才在达尔马提亚[13]找到了一座可以避难的堡垒作为容身之处。

最后的决战临近了：拔都一路继续向西征战劫掠，蒙古大军的铁骑最远曾踏到维也纳西北部的科尔新堡，从这里继续南下就该轮到帝国的中心了。奥地利与克恩腾[14]的公爵们惊恐万状，忙着集结兵力；而在北方，瓦茨拉夫国王正在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蒙古人的下一个目标。按照蒙古人原先的计划，他们打算再用6年时间完全征服西方。

但就在此时，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窝阔台大汗去世，蒙古帝国派信使将这个信息传遍了各地。根据蒙古大扎撒[15]律法，帝国将召开忽里勒台大会选举新的大汗，并要求所有候选人都必须到场，而其中一个候选人正是拔都。他原本不想回去，但速不台提醒他必须遵守帝国的律法。

于是，拔都撤兵了，同时带走了所有的鞑靼。鞑靼这个词是欧洲人用来称呼蒙古人的，也许是源自希腊语中一个发音近似的词语，意为“地狱”。拔都放弃了自己的兀鲁思[16]边界这块小小的领地，但他坚信数百年后，蒙古人必将统治整个世界。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1] 加利西亚，东欧历史上的一个地区，现属于乌克兰和波兰。

[2] 贝拉四世（IV. Béla，1206—1270），匈牙利阿尔帕德王朝国王，1235—1270年在位。

[3] 弗拉基米尔一世，即圣弗拉基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Vladimir Sviatoslavich，952—1015），古罗斯政治家、军事活动家，基辅大公。

[4] 指雅罗斯拉夫一世·弗拉基米罗维奇（Yaroslav I，978—1054），弗拉基米尔一世的儿子，基辅大公。他统治的时代是基辅罗斯最强盛的时期之一。

[5] 桑多梅日，位于波兰东南部，靠近维斯瓦河左岸，是波兰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6] 西里西亚，中欧的一个历史地域，绝大部分地区在现今波兰的西南部。

[7] 波希米亚王国，历史上的中欧国家，其范围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捷克。

[8] 克拉科夫，波兰旧都及第二大城市。

[9] 列格尼卡，波兰西南部城市。

[10] 东普鲁士，普鲁士王国以及后来德意志帝国的一个省，位于今天的立陶宛、俄罗斯和波兰。

[11] 波美拉尼亚，中欧的一个历史地域，位于现德国和波兰北部。

[12] 指阿尤布王朝，12—13世纪统治埃及、叙利亚、也门的伊斯兰教王国。自

1259年起逐渐被蒙古控制。

[13] 达尔马提亚，位于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东岸。

[14] 克恩腾，又译卡林西亚州，是奥地利最南面的一个州。

[15] 大扎撒，即《成吉思汗法典》，1206年由成吉思汗颁布实施的成文法典。

[16] 兀鲁思，指蒙古各汗王的封地。

砂拉越的吉姆爷
Jim en Sarawak



1963年5月9日，砂拉越 [1] 王国的第三代，也是最后一代白人拉者 [2] 查尔斯·布鲁克·维纳（Charles Brooke Vyner）在伦敦阿尔比恩街13号的居所去世。维纳曾在1917—1946年间统治砂拉越，当那些从未读过《吉姆爷》 [3] 的日军入侵时，他带着全家逃亡到悉尼。尽管如此，这位前国王已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即便在流亡中日子过得也并不差——战火初起时，他就借机将砂拉越的管辖权转让给英国政府当局，以此换取了一笔丰厚的酬金。战争结束后，他又回了一次自己的领土，正好能与他的臣民体面地告别。尽管维纳是一名白人拉者，但他却是在伦敦出生的，并在剑桥完成学业；他的妻子也是一位英国小姐，是一位贵族的女儿（群众风评并不好），她沿袭了维多利亚时代所流行的那种娇弱无力的外表，如今这种样貌已经不再流行了。同样，我们对维纳当时如何管理砂拉越足有1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并阻止当地原住民的猎首陋习等问题也不感兴趣。

总之，维纳能够继承王位，是因为他是查尔斯·安东尼·约翰逊·布鲁克 [4] （幸存）的孩子中的长子，他的父亲，即第二代白人拉者的故事，比他的要有趣得多。这位拉者原本还有一名哥哥，名为约翰，但约翰因为言语不慎丢了继承权。两人都是初代拉者詹姆斯·布鲁克 [5] 的侄子。由于詹姆斯没有孩子（至少没有法律承认的后代），他原本指定由约翰继承王位。然而，约翰被发现在背后说詹姆斯的坏话（据说指责涉及方方面面），于是詹姆斯愤而剥夺了约翰的继承权，改让他的弟弟查尔斯即位。

查尔斯原是皇家海军的一名海员，服役数年后，他从船长升任为中尉，但他觉得比起在军中工作，与他的叔叔一起“开化”东南亚的原住民并同时淘金赚钱更有前途。在被任命为王位继承人后，他的叔叔将原本

为他哥哥所创造的头衔“木达拉者”（谁知道这词到底是什么意思）转授给了他，到了1868年，他正式即位成为砂拉越的统治者。查尔斯在英国时娶了一位名叫玛格丽特（Margaret）的女子为妻，妻子的哥哥也一起来到砂拉越，后者还出了几本关于当地冒险的书，凡尔纳（Jules Verne）与萨尔加里（Emilio Salgari）都曾从中寻找过灵感。

查尔斯即位后做了几件实事，如追捕海盗、废除奴隶制、禁止猎首行为、寻找石油、修建铁路等等。他还创立了砂拉越游骑兵队，但这支部队在1941年时被日本侵略军打得落花流水。他的外貌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更深刻——两撇巨大的卷胡。查尔斯和他的拉妮（这是他夫人的正式头衔）共育有6个孩子，但前几个都陆续夭折了，直到后来查尔斯决定送夫人去英国生产。3个小的挺过霍乱活了下来。查尔斯还从一名牧师圣公会的会长处领养了一个名叫艾斯卡·布鲁克（Esca Brooke）的男孩，这孩子看起来像是马来人与英国人的混血（你们都懂的）。艾斯卡也活了下来。



尽管我们对这段旅程很有兴趣，但这却不是米其林推荐的旅行线路，即便创始人是白人拉者也不行。

而王国的创始人詹姆斯·布鲁克的故事，则又是另一种风格的了。

詹姆斯于1803年出生在印度，父亲是一名法官，母亲是一位苏格兰贵族的私生女。詹姆斯从小被父母送去学校读书，但他向来叛逆，只读

到12岁。在被父母送去东印度公司做学徒前，他从家里逃走了。据称在他首次回到英国的这段经历中，他曾与一位神父的女儿发生了一段浪漫恋情，但也有人说这段经历是他的传记作家们添油加醋编造的，目的是充实他的感情生活。总之，詹姆斯后来又回到了印度，并参加了第一次英缅战争 [6] 。他在这场战争中获得了好几枚勋章和一笔丰厚的奖金，但代价是身负重伤，差点丧命。他的伤势想必十分严重（有些作家说他因此失去了生育能力，之所以会产生这个流言，是因为詹姆斯面对漂亮女子总是不为所动），因为在这场战争后他回英国养了足足5年的伤才康复。之后的几年中，他曾试着从事较为体面的进出口工作来谋生，但没赚到什么大钱。因此，当父亲去世他拿到足足3万镑的遗产后，他的决定可谓在意料之中：他买了一艘体量142吨的名为“保皇党人”的纵帆船，配上武器，招募船员。他的部下都是一群在刀尖上舔血的亡命之徒，谁出价高，就为谁卖命。

当时出价最高的雇主是文莱苏丹，此人是个口蜜腹剑之徒，连与他同源的达雅克族 [7] 人都反对他，他们联合了其他反对者，在古晋 [8] 发起叛乱。查尔斯及时帮忙平息了这场叛乱，过程中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流血冲突。在他与文莱苏丹的几次“友好”对话之后，苏丹出人意料地任命他为砂拉越的管理者。自此，一个白人拉者的王朝开始了。

其实，詹姆斯一开始所统治的“国土”并不大，但每隔5年到10年，先是詹姆斯，再是他的侄子查尔斯，就会“说服”文莱苏丹再割让一块领土给他们，到最后，砂拉越王国的国土已经覆盖了整个婆罗洲岛的北方区域。同时，英国人也帮助他们在纳闽 [9] “扎根”，并委任詹姆斯为当地的管理者（我们别忘了，他与那些白人是一伙儿的）。英国当局还册封詹姆斯为骑士，以免人们对一位如此来历不明的白人的管辖权提出争议。确实有人曾对詹姆斯政权的合法性提出过异议（而且这竟然还是记录在档案中的！）——1851年，伦敦曾经对拉者的过分表现提出过异议 [10] 。

除此以外，詹姆斯还有几个对手需要对付，例如沙里·马萨和 [11] 以及乌鲁族 [12] 的拉者。他早年经历了战争和其他种种危险，他将自己王国中的一个港口设为新加坡那样的自由港，并执行一种家长式的政府管理风格。据称，他曾有一名非婚生子，名为鲁本·G.沃克（Reuben G.Walker）。尽管如此，关于他是同性恋的传言伴随了他的一生。考虑到他与一位马来王子巴德鲁丁（Badruddin）之间的绯闻闹得沸沸扬扬，这也并不奇怪。巴德鲁丁是一位漂亮的马来人，拥有淡黄色的皮肤……

我对他的爱，比对我所认识的任何其他人都更深……

而在他的（传说中的）几名恋爱对象中，还包括一个公爵的侄子，他后来任命对方为自己的私人秘书。詹姆斯应该是个挺有魅力的人，至少，在他的国家还未盈利的时候（我的黄金和钻石在哪儿！），他就能够说服当时还不是女爵的安吉拉·伯德特·库茨（Angela Burdett-Coutts，

一位极其富有的女士）出资资助他的事业。总之，不必再赘述詹姆斯作为一名独裁者的特点以及他的故事如何给英国杰出的电影《安娜与国王》提供了灵感。此人必定是个相貌堂堂的家伙，只有这点我们可以肯定！

[1] 砂拉越，旧称沙捞越，位于婆罗洲北部，今马来西亚面积最大的州。

[2] 拉者，又称拉惹，是东南亚以及印度等地对于领袖或酋长的称呼，最早源自梵文的rājan一词。

[3] 《吉姆爷》（*Lord Jim*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于1900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主角吉姆爷以砂拉越王国布鲁克王朝的创始者詹姆斯·布鲁克为原型。

[4] 查尔斯·安东尼·约翰逊·布鲁克（Charles Anthoni Johnson Brooke，1829—1917），布鲁克王朝第二代拉者，1868—1917年在位。

[5] 詹姆斯·布鲁克（James Brooke，1803—1868），英国探险家，将砂拉越发展为以自己为拉者的殖民地。

[6] 第一次英缅战争（1824—1826），19世纪时英国与缅甸贡榜王朝之间的第一次战争，因争夺印度东北部的控制权而发起，以英国的胜利告终。

[7] 达雅克族，婆罗洲岛上的土生民族。

[8] 古晋，现马来西亚砂拉越州首府，东马来西亚最大城市。

[9] 纳闽，今马来西亚的一个联邦直辖区，位于沙巴州东北部中国南海的岛屿。

[10] 英国议会曾在新加坡设立皇家委员会，对詹姆斯展开调查，但委员会最终宣判他“进行不人道和非法活动”的罪名不成立。

[11] 沙里·马萨和（Syarif Masahor，1810—1890），19—20世纪马来西亚反抗白人统治的义军领袖。

[12] 乌鲁族，马来西亚砂拉越州的少数民族群体。

武则天
Wu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具有争议性的人物。如果我们相信一些历史学家的记载，会以为她扰乱天下、狐媚惑主；但也有人认为她是一个治国之才。

自秦汉统一天下以来，历经几百年战乱，隋朝再度实现大一统，之后进入繁荣昌盛的大唐时代。唐朝的第二代皇帝唐太宗征战四方，打败了突厥人，将国境线推至塔克拉玛干以外的河中地区。当时，唐太宗已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男人。他有皇后，此外还有妃嫔，按照中国的传统，皇帝的后宫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共分为9个等级 [1] 。

武则天的父亲身世普通，但他很有眼光，积极支持李氏家族，从而成就了一番事业；武则天的母亲则出身隋朝贵族，在隋朝被推翻后沦落民间。根据史册记载，武氏出生于大唐京城长安，但实际上她更有可能是在父亲的祖籍省份出生的。

武家十分幸运，女儿武氏在12岁或14岁左右应诏入宫，被封为正五品才人。这个妃位并不算高，但考虑到她的出身，也算合理。据说，武氏从未成功讨得唐太宗的欢心，但即便如此，皇帝依然给她赐名“武媚娘”，指她容貌妩媚出众。不过，12年的后宫历练令武媚娘深谙权谋之术，此外，她还在这段时间与皇帝的儿子、太子李治培养了感情，成为李治的情人。

公元649年，唐太宗驾崩。根据史书记载，武媚娘进入一座寺庙为尼，但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很快又将她召回后宫，封为正二品昭仪。也有人说，武媚娘其实从未离开过后宫，正如我们之前说过的，在太宗还在世时，她就已经是高宗的情人了；关于她去寺院修行的这段经历都是

编出来的，是为了防止儒家朝臣对武媚娘先后嫁与父子二人说三道四。自此，武媚娘开始了一段传奇，尽管史书上对她的许多记载都是自相矛盾的。

当时，唐高宗的正室是王皇后，她担忧对手萧淑妃宠冠后宫，于是，当她得知自己的丈夫痴情于年轻的武媚娘时，就决定支持武媚娘，以此扳倒萧淑妃。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武媚娘回宫后，在宫中的权势日益壮大。她不仅漂亮，还有能力、有头脑。5年之后，武媚娘就成了王皇后的新对手。此时，后宫发生了一段阴暗的插曲。武媚娘作为正二品昭仪，是有资格为皇帝生育后代的，当时她已经生了几个孩子。公元654年，武媚娘新诞下的一位小公主被人谋杀了。目击证人纷纷指证皇后曾在谋杀案发生前去过小公主的房间，证据十分确凿。武媚娘为此悲痛欲绝。但有历史学家却声称是武媚娘自己谋杀了女儿，以嫁祸于皇后。此后不久，皇帝下令囚禁了王皇后和萧淑妃，同年，武媚娘被立为皇后，改名武则天。



王皇后和萧淑妃这对昔日的冤家被关在一起，几乎被夺走了一切。看守者每天通过门上的一个洞给她们送饭。有一天，唐高宗经过她们的囚室，听到两人在大声祈求。之后没多久，两人便听到敲门声以及门被推倒的声音。两人原本还以为是皇帝大发慈悲，终于愿意放她们出来了。但事实上，来者是武则天派来的刽子手。王皇后冷静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并祝福了来杀自己的杀手；而萧淑妃的反应则不那么稳重：她大喊武氏狐媚，并说自己来生必将投胎做一只猫，将“迷惑圣上的妖鼠武氏”生吞活剥。两人被杖打一百，随后被剁去手足，打断骨头，塞入酒桶内。武则天说：“现在这两个贱人可以醉到骨髓里了！”因此将此刑命名为“骨醉”。乔纳森·克莱门茨 [2] 在武则天的传记中说，武则天“至死仍恨二人”。

根据史书上的说法，处死两人后，武则天开始经常做噩梦，梦到两女化为恶鬼纠缠她。她下令捕杀了长安城所有的猫，最后甚至说服高宗，将朝廷从长安搬至洛阳。

公元660年，唐高宗病倒了。有历史学家认为武则天一直偷偷给他下慢性毒药，使他无力管控朝政。武则天在朝中的权力日渐稳固，她在许多重要岗位上都安插了自己的心腹。公元665年，她的一名心腹发现朝中众臣正在支持一项意在推翻她的密谋。尽管谋反者受不得重刑，很快就自杀了，但这给了她一个机会。武则天的手下向高宗递交了一份报告，声称当朝宰相与唐太宗时期任命的一些其他高官年事已高，不再适合效力朝廷。据说，高宗看了这份报告后泪流满面，但考虑到那不知真假的谋逆风险，最终他依然下令将这些重臣逐出朝廷。宰相后来很快被杀，其他元老大臣也死于各种精心策划的谋杀。此后，高宗周围的所有大臣都是武则天的人了。

唐高宗驾崩后，武则天的第三子 [3] 登基为王。她的第一个儿子英年早逝，有史学家认为是武则天自己谋害的，因为这个儿子胆敢反对她。这种说法可能不太站得住脚，但新皇帝唐中宗倒确实不听话，因此在他即位仅仅6周后，武则天就剥夺了他的皇位，将之传给高宗的第八子唐睿宗 [4] 。在之后6年的时间里，唐睿宗完全就是他母亲的傀儡。最后他厌倦了这种局面，宣布放弃皇位，将大权还给母亲。于是，武则天在实际掌权已达十几年之后，终于正式登基成为皇帝。从武媚娘到武则天，此时她又改名为武曌，意为日月同辉，照亮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公元690年，她正式登基成为圣神皇帝。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自执政以来，其统治风格就冷酷无情，对异议者进行残酷清洗。但她同时也完善了系统性的科举制度，广泛招募和提拔人才，根据实力选拔官员。武则天改变了中国的行政系统和许多官方的术语。她施政时处处有所涉猎，在各方各面都做出了改革。

武则天知道，那些继承了传统儒家思想的臣子对她极为敌视，因此她大力推行佛教，拿出巨额拨款，广建寺院、培养僧侣，所造佛像不计其数。有一位僧侣（有历史学家说他其实是武则天的面首） [5] 甚至声称，武则天本人就是救世主弥勒佛的化身。

在武则天统治的最后阶段，铺张浪费已成为常态。贵族和僧侣的封地不断扩张。尽管武则天在执政之初曾经减过税赋，但农民的田契价格水涨船高，依然令他们不堪重负。

武则天活了80多岁，但去世时已经丧失了权力：公元705年，唐中宗通过一场宫廷政变夺回了皇位。他复位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下令查处武则天的两位重臣，也是她的面首（这是一些历史学家们说的）。短短几个月后两人分别死亡。

自此，武周王朝正式宣告结束。这个短命的王朝只有武则天1位皇帝。武则天死后仅被唐室称为大唐王朝的皇后。

几个世纪以来，武则天一直不讨一些历史学家的喜欢。这并不奇

怪：她是一名女性，却执掌朝政超过50年。她恣意妄为，劣迹秽行，罪状确凿。一些历史学家对她的成就避而不谈，虽然很明显，在她身后的大唐盛世离不开她重塑行政体系的功劳。她的部分性格特征，如机智、果断、坚定等等，若换在其他执政者身上，本该大受赞扬。而她清扫政敌的行为，她喜怒无常的脾气，其实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皇帝也并没有多少差别。但在其他皇帝的传记中，历史学家却会隐瞒这些缺陷，以尽力打造皇帝不容置疑的光辉形象，歌颂其政绩。有的历史学家甚至走向极端，将她所有的重臣都说成是她的男宠，并将她身边发生的所有死亡事件都说成是她在背后指使。这让人想起奥古斯都的妻子利薇娅[6]，历史学家对她也是一样地不公平。

[1] 唐建国之初，后宫参照隋朝旧制，在皇后之下，分夫人（妃）、嫔、婕妤、美人、才人、宝林、御女、采女共8个等级。

[2] 乔纳森·克莱门茨（Jonathan Clemens，1971— ），英国作家、编剧，曾写过多部中国名人传记，包括孔子、郑成功、秦始皇等的传记。

[3] 即唐中宗李显。

[4] 唐睿宗李旦是高宗的第八子，武则天的第四子。

[5] 指薛怀义（662—694），白马寺住持，据称是武则天的第一个面首。

[6] 指利薇娅·杜路莎·奥古斯塔（Livia Drusa Augusta，公元前58年—公元29年），罗马帝国皇后。

大洋洲
OCEANÍA

原始人
Salvajes



许多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人种都已经被发现了，这情有可原。从此地向西最远2000公里开外，是“邦蒂号”[1] 水手的后代所居住的皮特凯恩群岛；向东4000公里处坐落着智利；向北5000公里，复活节岛与加利福尼亚相隔；最南则是南极洲。

复活节岛是一片充满神秘色彩的土地，早在1500多年前，当地原住民就已掌握了巧夺天工的石雕技术。至今，在拉诺拉拉库采石场的遗迹中，还存有超过400多座摩艾石像[2] 的遗迹，其中有一部分已经将近完工——最高的一座高达21米，重300吨。岛上还流传着古老的传说，叙述了霍图·玛图阿[3] 的后代“短耳人”与侵略者“长耳人”之间的战争。但我们今天要讲的并非这些历史遗迹与古老传说。我们要说说因开发鸟粪而引发的劫掠事件。

当时，复活节岛的文明因多年内战已经衰败。欧洲各国的航海家们（荷兰人、西班牙人、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曾先后登陆复活节岛并留下相关记录。尽管如此，到19世纪初时，岛上仍居住着超过4000名原住民。

在那个时代，当地许多海岛盛产鸟粪，这种鸟类的排泄物可用作肥料，但收集鸟粪的劳动力短缺。钦查群岛[4] 尤以丰富的鸟粪资源而著称，但该岛天气寒冷多雾，开采环境极其恶劣。两个世纪以来，秘鲁商

人一直在向美国和欧洲出口肥料商品，到了1862年，相关劳动力的短缺已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为获取劳动力，奴隶贩子们从卡亚俄[5]的港口出发，驶向太平洋的各个岛屿。他们先骗取岛上原住民的信任，再说服他们开玩笑般地在卖身契上画押，之后就将这些住民强行掠走，并号称自己的行动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这一年，秘鲁人先开始了这种诱拐行为。随后，智利、西班牙等各国的奴隶贩子乘着各式各样的船只，在太平洋上大肆劫掠，补充“商品”。11月23日，“黑美人号”奴隶船停靠卡亚俄码头，带来142名男子和12名女子，奴隶主们按每人25比索的价格买下这些奴隶，再转手以人均300比索的价格卖给大地主们。同日，另一艘智利船“艾丽莎·曼森号”又带来了380个奴隶。



更大规模的围捕事件则发生在12月。共有8艘船参与了此次围捕。其中有7艘秘鲁船：安东尼奥·德·阿基列（Antonio de Aguirre）指挥的“寇拉号”，加雷（Garay）船长指挥的“美丽的多洛雷斯号”，阿塞维多（Acevedo）船长指挥的“何塞·卡斯特罗号”，卡尔卡莫（Cárcamo）船长指挥的双桅帆船“米凯拉·米兰达号”，以及“罗萨·帕特里西亚号”“卡洛琳娜号”“吉列尔莫号”；1艘西班牙船“罗萨与卡门号”。船队的总指挥可

能是秘鲁船长安东尼奥·德·阿基列或是西班牙船“罗萨与卡门号”的船长胡安·马里斯坦尼·加尔塞兰[6]。1862年12月22日，这支船队在安加罗阿[7]海湾入港。

按照惯例，船员们首先花费数日，骗岛民们在卖身契上画押。随后，近百名船员在地上铺上布，摆上一些廉价的小玩意儿。等到岛民们围过来观看时，船员们将他们团团围住，随后，随着一声枪响，大家一拥而上，将这些原住民一一铐住。现场显然会有些死伤，有些原住民成功地逃进山洞或跳下悬崖，但仍有349名岛民被捕获。船长们随后瓜分了“战利品”，计划将大部分奴隶通过“美丽的多洛雷斯号”与“卡洛琳娜号”运往卡亚俄。1862年的圣诞夜，船员们举办了一场庆功宴，与此同时，囚犯们却被迫挤在底层甲板的牢房中。

剩下的囚犯被另外6艘船瓜分了。“吉列尔莫号”只分到两个人，一个6岁的小男孩和一位老太太。后者很快就被船员扔进了海里，因为她卖不出价钱。“寇拉号”只带走了一个孩子，名叫玛努·兰吉（Manu Rangi），这孩子出生自霍图·玛图阿一系的王室家族，后来成了复活节岛的阿里基[8]。这艘船行驶至法属波利尼西亚的拉帕岛时被截获，船上的秘鲁人被送到塔希提接受法国皇家检察官的审判。船上的孩子被解救出来送回复活节岛加冕。但孩子的父亲纳嘎拉（Ngaara）阿里基和他的兄弟毛拉塔（Maurata）都已经死于收集鸟粪的辛苦劳役。

相关新闻随后传到了塔希提主教埃蒂安·若桑[9]处，于是他向法国政府通报了此项犯罪行为。法国政府随即联合英国政府向秘鲁当局施压，迫使其下令禁止奴隶捕猎行动，并承诺会将已捕获的奴隶送回他们的家乡。

随后不久，“罗萨与卡门号”也带着其所捕获的100多名波利尼西亚岛民到港了。然而，船长马里斯坦尼拒绝在卡亚俄接受审判，并向新大陆发现者的后代、海军上将品松[10]请求海军保护，两人发表了一通关于船只与荣誉的愚蠢言论，差点引发一场海战。马里斯坦尼侥幸逃脱了，但船上的囚犯却未能幸免于难。当另一艘船“前进号”前来接回船上的奴隶们时，大部分人都已经死了。

我曾读到记载说，奴隶头子马里斯坦尼船长在马雷斯梅县[11]的埃尔马斯诺有自己的码头，当他的奴隶船“罗萨与卡门号”回港时，船上的尸臭被海风吹得全海岸都闻得到。

在政府下了禁令之后，被捕获的奴隶被陆续送回自己的祖国。被卖到钦察群岛的1000多名奴隶中，只有不到100人活了下来。法国人派了1艘船，将他们和另外200名从其他地方解救的波利尼西亚岛民一起送了回去，但其中只有15人活着回到了复活节岛。

当这幸存的15人带着亲人的遗体回国时，复活节岛上仍有2000名岛民。但幸存者们带回了痢疾和流感等疾病，当地人对此没有抵抗力，纷

纷染病死去。第一批死亡的人中就有玛努·兰吉阿里基，他尽管逃过了苦役，却没能逃过疾病的威胁，去世时年仅11岁。到了1868年，岛上只剩下不到600名原住民了。1877年，据阿方斯·皮纳特[12]船长统计，原住民只剩下110人。

如今，再也没有人会读拉帕努伊人[13]书写在木板上的神秘文字朗格朗格[14]了。这些木板如今仅存不到25块。许多拉帕努伊人被捕获时脖子上就挂着这种木板，但被奴隶贩子们扯下当柴烧了。复活节岛上残存的其他木板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几乎尽数被传教士与欧洲水手们销毁。毕竟，那些都是异教之物。

[1] 1789年，英国皇家海军“邦蒂号”发生叛变事件，叛变船员的后代至今仍居住在皮特凯恩群岛。

[2] 摩艾石像，又译复活节岛人像，位于复活节岛，多数石像是用整块的巨石雕刻而成。

[3] 霍图·玛图阿（Hotu Matu'a），据传为第一位登陆复活节岛的定居者，岛上原住民的祖先。

[4] 钦查群岛，秘鲁西南海岸外的群岛，大约600万只海鸟栖息于此，鸟粪资源丰富。

[5] 卡亚俄，位于秘鲁首都利马以南，是秘鲁最大、最重要的港口。

[6] 胡安·马里斯坦尼·加尔塞兰（Juan Maristany y Galcerán，1832—1914），加泰罗尼亚海盗与奴隶贩子，他的奴隶捕猎行为灭绝了复活节岛上1/3的人口。

[7] 安加罗阿，智利复活节岛西海岸南部城镇。

[8] 阿里基，波利尼西亚人对“国王”的尊称。

[9] 指弗罗伦丁·埃蒂安·若桑（Florentin-Étienne Jaussen，1815—1891），塔希提岛第一任主教。1860年初，他帮助阻止了复活节岛的奴隶绑架和贩卖活动。

[10] 品松上将的祖先马丁·阿隆索·品松（Martín Alonso Pinzón）是西班牙航海家及探险家，曾在1492年参加哥伦布的航海队，是首次到达美洲大陆的航海家之一。

[11] 马雷斯梅县，西班牙巴塞罗那省的一个县。

[12] 即阿方斯·路易斯·皮纳特（Alphonse Louis Pinart，1852—1911），法国学者、美洲大陆文明研究的专家。

[13] 拉帕努伊人，复活节岛居民，语言为拉帕努伊语。

[14] 朗格朗格是在复活节岛上发现的一套符号，可能是文字或类文字，可能用于书写古拉帕努伊语，尚不能完全破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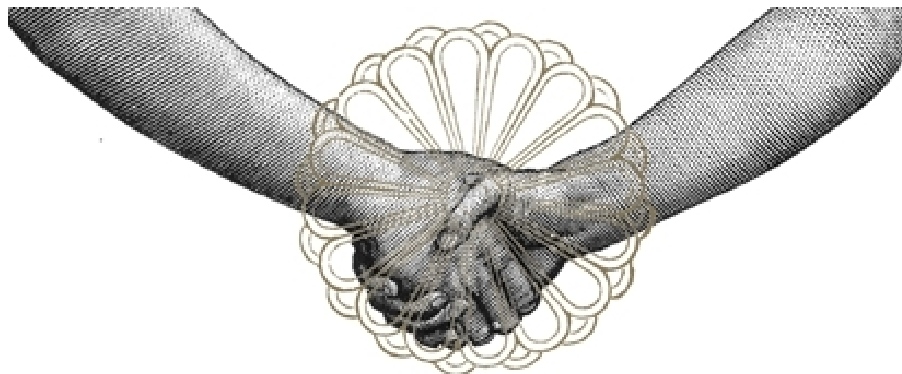
万岁
Banzai



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市附近，有一个名叫“考拉”的小城。当地曾经发生过一起事件，后世称之为“考拉越狱事件”。该事件充分证明了国民文化对人的心理健康所能够造成的影响。

在考拉城内有一个监狱（这个监狱至今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监狱内“挤满”着来自意大利和日本的战俘（其中还有一些韩国人和印度尼西亚人，但他们也是在日本军队服役时被俘的）。因为不存在空间不足的问题，监狱的场地很宽敞。

当时，全澳大利亚共俘获了近1.5万名意大利人，其中有近2000人被关押在考拉监狱内。许多人是在北非战役中被俘——我们都知道，在当地一系列著名的战役中，英国人与意大利人被俘虏的比例约为1:20。意大利人在这些战争中的表现并不光彩，被俘虏也是恶有恶报。在考拉监狱，这些战俘平时主要负责附近农场的劳作。他们与狱卒关系很好，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人几乎已处于无人看守的状态（毕竟，他们能逃到哪儿去呢？）。可以确定的是，被俘军官甚至拥有在营地间自由出入的许可，许多人还能在考拉城内散散步，到拉克伦旅馆喝喝咖啡什么的。这种待遇与威尼托街 [1] 的声色场所当然还是不好比，但当时那种环境下，这些战俘的日子可以说过得很不错了。



相反，日本战俘却始终难以接受被俘一事。这里关押有近2000名日本战俘，他们与看守们的关系极为恶劣，成天心情极坏，完全拒绝合作，总是想找机会逃走。1944年8月，日本战俘接到通知，军官及副官级别以外的战俘将会被转移至另一处防守更为严密的监狱。考拉监狱的20名日本指挥官经过激烈的讨论，决定发动B营区的1000多名日本战俘以“日本式”的方式越狱。到了约定的时辰，所有日本人拿着餐刀、木杆或棒球棍作为武器，同时发动袭击。他们高喊着“天皇万岁”袭击了警备塔，营地的守卫们（具体来讲只有两位）在他们的攻击下迅速溃败，很快被这些战俘杀害。最后，约400名战俘成功逃离了监狱。而许多其他日本战俘由于缺乏视死如归的勇气，在事变之前就“被自杀”了。

自然，所有逃犯最终非死即伤。只有少数逃进了澳大利亚的沙漠地带，靠吃虫子、嚼草根为生，希望能够撑到战争结束。逃得最远的战俘在离监狱25公里开外的地方被抓获。只有数百人活了下来。

一年以后，随着日本与澳大利亚恢复邦交，此事成为促成日澳重归于好的契机之一（日本当局还派人拜访了战俘公墓），考拉市也为此建造了一座日式花园以示纪念。

而在当时，越狱事件发生的当口儿，意大利战俘们还在喝着咖啡，在女孩子们走过时吹小曲儿呢！

[1] 威尼托街，意大利罗马一条著名的高档购物街。

一个精彩的冒险故事

Una bonita historia de aventuras



在故事的开头，一支由8艘航船组成的舰队从荷兰泰瑟尔[1]的港口驶出，为首的大船是“巴塔维亚号”商船。这支舰队由著名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资深商人弗朗西斯科·佩萨特（Francisco Pelsaert）率领，主要任务是完成香料的进口贸易。当时，东印度公司的总部坐落在印度尼西亚今天的首都雅加达，荷兰人称其为“巴塔维亚”——商船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那也正是这支舰队此次航行的最终目的地。

不幸的是，商队中还有一艘“比伦号”战舰，船长名为亚利安·贾克贝斯（Ariaen Jacobsz）。按照东印度公司的惯例，一个商队一般由一位商人统一领导，但贾克贝斯在过去的航行中已经与佩萨特闹翻了，因此不愿服从他的管束。

又是为了女人！虽然我不想落入俗套，但据说两人的关系就是因为两名女子而进一步恶化的。两位女子分别是鲁克蕾西亚·范·德·梅伦（Lucrecia van der Meylen）和她的女佣兹瓦蒂·亨德里克斯（Zwaantie Hendrix）。鲁克蕾西亚搭船去找自己的丈夫，一路上由于贾克贝斯纠缠不休，她便请佩萨特来帮忙调解。贾克贝斯在争执中落败，便退而求其次找了鲁克蕾西亚的女佣，但他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老实说，从历史上的记载来看，男女之情本身没有是非对错，但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此次恩怨无疑成了后来系列悲剧的导火索，可以说鲁克蕾西亚事件释放出了贾克贝斯心中的魔鬼。



在航行过程中，佩萨特对贾克贝斯目无法纪的行为越来越看不下去，并将他的担忧告诉了我们这个故事真正的主角、药剂师耶罗尼莫斯·科涅利兹（Jeronimus Cornelisz）。科涅利兹是一名门诺派[2]信徒，后来有人曾把他的罪行归咎于受了约翰内斯·托伦蒂乌斯（Johannes Torrentius）[3]的挑唆。事实上，我们知道所有的异端分子都有一些共同之处，他们通常会精心谋划，伪装自己，到了某个既定的时刻突然发难。因此，我认为无须寻找证据来证明这两个人不去教堂、不受圣礼、不读《圣经》，毕竟，作为稳定秩序的挑战者，比起“神圣的宗教义务”，他们俩肯定对纵情狂欢更感兴趣。更惊世骇俗的是，他们还曾有过乱伦行为，并打着“共有财产”的名义公然抢劫。对基督徒而言，同样不能忍受的还有他们宣称人死后灵魂依旧会作恶。

然而，关于这些事，佩萨特却被瞒在鼓里。他十分信任科涅利兹，但后者却背叛了他的信任。科涅利兹与贾克贝斯一起纵情畅饮，密谋叛变。当时，舰队已穿过好望角，只有3艘船还在并排行驶。科涅利兹计划在旗舰“巴塔维亚号”上发动叛变，随后将该船据为己有，在印度洋上成立自己的海盗部队。为此，他俩策划了一出戏剧性的脚本：先派一群

水手去袭击美丽的鲁克蕾西亚——“美丽”一词是我说的，她想必是个美女——然后，佩萨特势必会插手干预。在他处罚当事人时，船员们应该都会聚集在甲板上，这时，叛乱分子就可乘机发难夺船，然后把佩萨特扔到海里去喂鱼。

谁想人算不如天算，几天前，这支荷兰商船队开始改走著名的咆哮40度[4]航线：沿着这条航线，船队在绕过非洲后，不再走印度洋的沿岸航线，而是转道至平行的南纬40度航线，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南半球海风的强劲推力，推动船只快速前进。但是倒霉的佩萨特对这条航线掌握得不熟练，1629年6月4日，“巴塔维亚号”在豪特曼阿布洛霍斯群岛[5]触礁，距离澳大利亚西海岸约80公里。

当时，触礁的冲撞很厉害，有数十名船员当场溺亡或因伤去世。船只遭到严重毁坏，无法继续航行。200多名幸存者设法逃到了陆地上。

佩萨特与贾克贝斯带着船上的军官和约40名乘客（其中大部分是船员）登上一座小岛，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该岛日后被称为“叛徒之岛”。他们保留了船上大部分的水和干粮，还备有两艘寻找陆地用的登陆小艇。大军对现状束手无策，但仍乐观地决定前往巴塔维亚寻求救援。

而大部分的幸存者则上了另一座岛，该岛日后被称为“巴塔维亚号坟场”。按照规定，职位级别最高的人拥有指挥权，于是耶罗尼莫斯·科涅利兹成了这群人的领导。很快，他就暴露了邪恶本性，其行为之极端，远不是用“狂热的异教分子”就能解释的。

当时，岛上缺乏水源，只有偶尔的降雨能够缓解大家的饥渴。幸存者中有一位士兵名叫维布·海斯[6]，他经常挑战科涅利兹的权威，于是科涅利兹以“寻找水源”为借口，指派海斯带20人去附近的岛屿找水。这其实是一个阴谋：科涅利兹没收了所有武器，指望这群手无寸铁的人在外饥渴而死。

海斯离开后，科涅利兹终于可以独揽大权，自此，他的恐怖统治开始了。由于在其他岛屿上找不到水喝，科涅利兹宣布谁支持他他就给谁提供饮用水。他和他的党羽以各种理由折磨甚至杀害幸存的人：一开始是因为人太多了，水不够分；之后是杀人取乐；最后，杀人变成了每天的惯例。他们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男人、女人和小孩都惨遭杀害。鲁克蕾西亚被科涅利兹强行霸占。经过数日的血腥屠戮，总共125人死于这群恶霸之手。这些人行事毫无顾忌，直到有一天，他们忽然看到远处的一座小岛升起了一束烟柱。

维布·海斯的探险队发现了淡水和食物，于是他按照之前收到的命令燃起烟柱通知大家。但很快他就发现这么做是个错误。一些从科涅利兹的残暴统治下逃出来的幸存者跑来告诉海斯他们之前都经历了什么，海斯不禁担心，由于手里没有武器，自己这群人恐怕也难逃一死。于是，他带领大家尽全力加固防御，并拆了沉船上的木材，和贝壳一起制成弹

弓、石弩等简陋的武器。

科涅利兹歇斯底里地对海斯发动了两次攻击，但都被抵挡了下来。随后，他又试着贿赂他们或与之谈判，但最终还是被海斯抓获。海斯用实际行动展现了自己的卓越才干。

9月16日，残余的叛军看见一艘救援船自远处驶来。佩萨特带着援军回来了。贾克布斯已在巴塔维亚接受了审判。叛军试图发起最后一轮攻击，但再次失败了。当佩萨特得知之前的悲剧之后，由于太过震惊，他当即下令砍掉科涅利兹的手，之后将他就地正法。他的党羽中最残忍的6名头目也在同一天被一起绞死。剩下的叛变分子则分别在船上被处刑，或被送到巴塔维亚处决。

所有叛军中只有两人因年龄较小而逃过了死刑，一个名叫伍特·鲁斯（Wouter Looes），另一个名为扬·佩特罗姆（Jan Pelgromm），还是个见习水手。两人被带到澳大利亚海岸边，随后被扔在一个今天称为雷德布拉夫的海滩上自生自灭。

那天是1629年11月16日，这两人应该是历史上最早涉足澳大利亚这片土地的非原住民白人了。佩萨特给他们留下了一艘小船、食物、水、工具和一些廉价的小玩意儿，供他们与印第安人做交易用。

没人知道这两人的最终命运。最乐观的说法称他俩设法活了下来。有些学者研究了当地的原住民部落，称其中有一部分人有着蓝色的眼睛，其词汇中还残存着荷兰语Kunt u dat alstublieft herhalen?（“你能再说一遍吗？”）的部分发音，应当是这两人的后代。而我更倾向于认为，与荷兰低地的舒适环境相比，当地蚊虫滋生，这两人恐怕连1个星期都撑不过去。

[1] 泰瑟尔，荷兰北荷兰省的一个市镇。

[2] 门诺派是基督新教的一个派别。

[3] 即约翰内斯·西蒙斯·范·德·比克（Johannes Symonsz van der Beeck，1589—1644），荷兰画家，以其别名约翰内斯·托伦蒂乌斯而闻名。曾被指控为亵渎、异端、撒旦教信徒。人们普遍认为科涅利兹的行为受到了他的影响。

[4] 咆哮40度，又称咆哮西风带，是水手对南纬40度到50度间海域的俗称。咆哮40度的风在被称为高速帆船航路的航线上具有重要地位，利用这里的风，可以在印度洋高速往东前进至印尼爪哇岛。

[5] 豪特曼阿布洛霍斯群岛位于印度洋，由122个小岛组成，多为珊瑚礁围绕。

[6] 维布·海斯（Wiebbe Hayes，约1587—1631），荷兰士兵，因曾帮助阻止“巴塔维亚号”叛变而被视为国民英雄。

和平主义

Pacifism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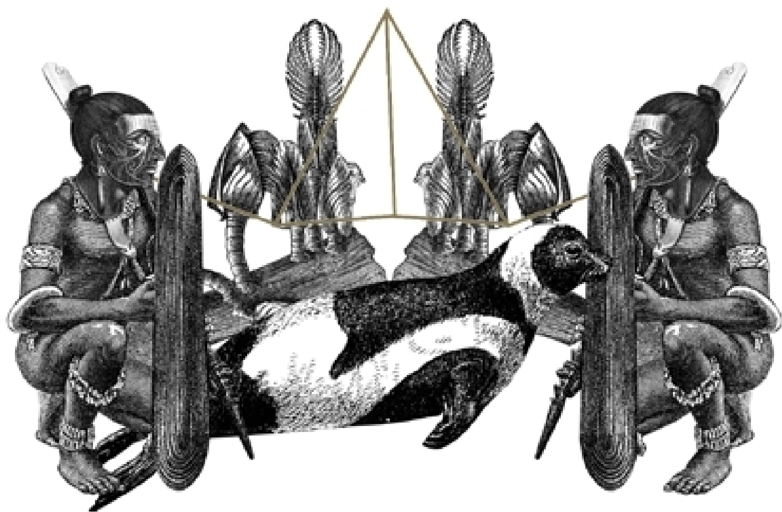


不知各位是否听说过查塔姆群岛[1]的历史？鉴于这个故事很有警示意义，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讲。

大约3000年前，有一群人从新几内亚以北的俾斯麦群岛[2]迁徙到波利尼西亚一带居住。2000年以来，这群人逐渐遍布整个波利尼西亚地区，最远到达新西兰与查塔姆群岛一带。其中，新西兰的居民被称为“毛利人”，查塔姆群岛的居民被称为“莫里奥里人”。

毛利人居住的岛屿地域广袤（被称为“北岛”），因此，他们能够在当地积极发展农耕文化，实现集中化种植，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一个复杂的社会架构。由于生产富余，社会分工自然而然地逐步细化，诞生出首领、士兵、神职人员、工匠、商人、艺术家等各种不同的职业。毛利人学会了打造武器、建造堡垒。部落之间自然也有争斗，因此，他们培养出了一支勇猛的军队，到公元19世纪中期，毛利人战士已达1万多人。

查塔姆群岛的居民所住的岛屿则地域狭窄，内陆土地稀缺，而且缺少朝南的耕地。再加上当地气候寒冷等因素，这些居民很难在岛上种植他们最擅长培育的热带作物，因此只能以打猎为生。查塔姆群岛的湖泊众多，盛产鳗鱼；池塘中有充足的甲壳类和软体类水生动物，在渔场中有时还能捕猎到海豹。尽管如此，岛上的人口常年只维持在2000人左右。由于人口稀少，当地人奉行和平主义，没有强力的领袖需要服从，整个社群过着集体主义的生活。



不幸的是，到了1835年，一艘澳大利亚捕鲸船发现了查塔姆群岛的存在，并将此事告诉了远在800公里开外的新西兰人。于是，900名毛利战士乘船向查塔姆群岛进发。1835年11月19日，第一批500名战士乘坐第一艘船抵达查塔姆，12月5日，第二艘船带着剩下的战士来到此地。

双方几乎没有发生实际的战斗。毛利人一登上查塔姆群岛，就宣布莫里奥里人都是他们的奴隶。莫里奥里人召开集会，就是否需要战斗进行投票。尽管对方的敌意已经很明显了，自卫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莫里奥里人在人数上占优），但根据当地的“努努库法”规定，战争与食人行为都是被严令禁止的。族中长老认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违反“努努库法”的规定，因此他们决定向毛利人求和，并献上部分财物作为贡品。然而，毛利人压根儿就没给他们谈和的机会。他们不由分说地攻击了莫里奥里人，对他们大肆屠杀，自然也煮了和吃了其中的不少人。活下来的人则全部沦为奴隶，遭到残酷的对待。待到路德宗教士们登上查塔姆群岛时[3]，岛上已经没有多少莫里奥里一族的幸存者了。

[1] 查塔姆群岛，新西兰的一个群岛，由40公里范围内的约10个大小岛屿组成。

[2] 俾斯麦群岛，太平洋西南部的一个群岛，由200多个岛屿组成。

[3] 1834年，一个德国路德宗传教士集团曾来到查塔姆布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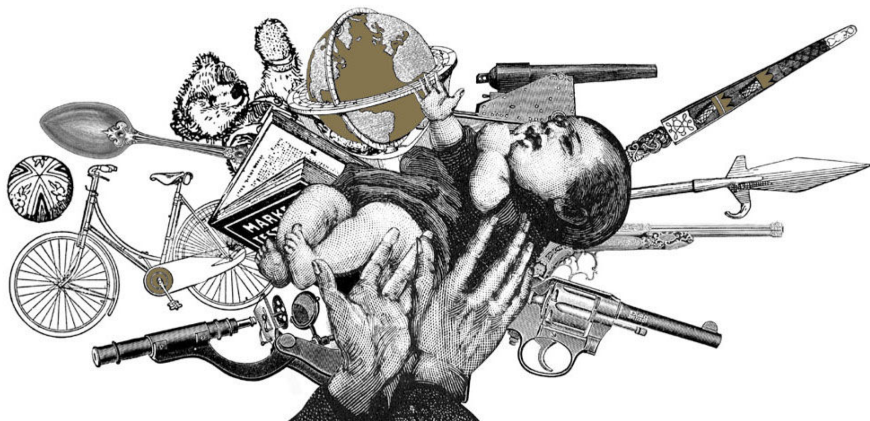
善与恶
El bien y el mal



1936年时，滚木路（skidrow）是洛杉矶最恶名昭著的街区之一，犯罪率常年居高不下。在这个全市最穷困的街区上，一个10岁的墨西哥裔小男孩盖伊靠帮人擦鞋维持生计。

1944年，一位日本女性眼神涣散、举止癫狂：就在几天前，她在绝望中把自己的孩子抛下悬崖，只因她相信远渡重洋而来的野蛮侵略者会把这个孩子生吞活剥。

盖伊·路易斯·加巴尔登（Guy Louis Gabaldon）来自一个单亲家庭，他母亲独自把他和其他6个兄弟一起拉扯大。我们对他的父亲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在盖伊还是个孩子时就抛弃了他们。盖伊从小混迹社会，靠做擦鞋匠为生，在不工作的时候，他就和与他一样出自贫苦家庭的“兄弟们”（包括拉丁裔、犹太人、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意大利人）在街头斗殴，与其他混混们争抢地盘。他母亲对他这种充满暴力的“江湖义气”十分看不惯，把他送去新墨西哥州与几个亲戚同住。他在那里机缘巧合地结识了一个日本“二世”家庭（即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日本移民），几乎成为他们家中的一员。盖伊所混迹的帮派“猛帮”中有好几个日裔，其中一对姓中野的双胞胎兄弟把这个小小的拉丁裔带回自己家，之后盖伊几乎就成了这家人的养子。在中野家，盖伊首次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并接触到了一种全新的文化。终其一生，他都对日本文化崇敬有加。在被收养的这些年里，他磕磕绊绊地学着讲日语，并对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深深着迷。然而好景不长，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美国掀起狂热的反日大潮，彻底粉碎了盖伊平静的新生活。所有日裔美国人都被抓进了拘留营，中野一家也未能逃脱。之后，盖伊去了阿拉斯加，在一家罐头厂工作了几年。到了1943年，盖伊年满17岁后，就报名参加了美国海军陆战队。



这里让我们短暂地回顾一下太平洋战争与马里亚纳群岛 [1] 战役的历史。1944年6月，日军已经在这些地方战败，但比打赢战争更难的是说服这些日本人承认自己的失败。马里亚纳群岛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有日军驻守，和其他日本周边的驻地一样，当地的防御如铜墙铁壁，滴水不漏。马里亚纳群岛最主要的两个岛屿分别是塞班岛和天宁岛，岛上共有近4万名日本士兵，其中包括海军。另外在塞班岛上还有2.3万多名平民居住，主要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日本人、朝鲜人和琉球人。日本政府对军队大力洗脑，宣传灌输来自天皇本人的指示：士兵只有在战斗中死去才值得尊重，就算要自杀，也要拖上至少7个敌人陪葬。对于平民，政府则勒令他们在战败后必须自杀，并恐吓他们说，如果落入敌人手中就会被酷刑折磨、被杀害，甚至被活活吃掉。

1944年6月15日，包括盖伊·加巴尔登在内的8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登上塞班岛，半小时内就占领了好几处海滩据点。然而，之后他们花了整整1个月才征服全岛，过程十分血腥：岛上的守军几乎全军覆没，3/4的日军在战斗中阵亡；每20人中就有3人自杀；每30人中只有1个是被生擒的。7月6日，日本人发起最后一波“万岁冲锋”，死伤无数；而更疯狂的一幕还在后面：剩下的上百名日军官兵与平民纷纷自杀或相互杀害，一个接一个地从悬崖上往下跳——该地至今仍有“自杀崖”“万岁崖”之称；士兵们砍下自己同胞的头；妇女们信了日本政府的宣传，认定美军会“把她们的孩子烤了吃掉”，因此纷纷把孩子（有些甚至是婴儿）活活抛下悬崖。

如此疯狂的行径远远出乎盖伊·加巴尔登的意料。这些行为是无法带来和平的。日后他在传记中回忆了日本海军在他看来近乎愚蠢的种种行为，也详细地描述了自己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和其他参与太平洋战争的典型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一样，他也曾在敌人拔出武士刀前，一枪打穿对方的脑袋；也曾在日本士兵死亡后、登记遗物前把死者的财产据为己有。他的这种坦诚给他的回忆增加了几分可信度。盖伊在登陆塞班岛当天就深入一片树林，抓获了两名战俘。他的长官得知此事后训了他一顿，警告他在战争中绝不能擅自行动，说他这是在藐视军事委员会的

权威。然而就在当天晚上，经过一整天死伤无数的激烈战斗后，盖伊又一次擅离职守，跑到一个山洞旁劝说藏身其中的敌军投降，并保证他们会受到良好的对待。那天晚上，他带回了近15个战俘。这下他的长官才意识到，也许放任他自由行动效果会更好。后来在一次军事法庭审判中，盖伊为自己的冒险行为辩护；在其后的一生中，他也曾对此做出过多种解释，比如，他参军是出于对珍珠港事件的痛恨，正是因为这次袭击，他的养父母一家被送进了拘留营；又比如，他只是想做一名翻译，帮助军队指挥部将他们的意图传达给对方。有些人则认为，盖伊的冒险行为只是出自他对建功获勋的渴望。然而，我认为我读到的这句话就算不能完全解释他的决定，至少也给出了一个明示，盖伊曾说："我后来对劝降工作上瘾了。"

到了1944年7月6日，盖伊已经进行了数周的劝降工作。这天晚上，大批军队向塞班岛北部的悬崖进发；第二天，日本人进行了最后一波集体自杀。盖伊当时对此事一无所知。惨剧发生后，7月8日上午，盖伊俘虏了两个日本人，他说服他们投降并不可耻，没有人会折磨他们；战争结束后，美军会把他们送回日本；并向他们指出，强迫平民自杀是违反武士道精神的。战俘们对他的话将信将疑，不过其中一人同意陪他去说服自己的同胞们。当时的场面十分魔幻。一个年仅18岁的小兵，被十来个从"伪满洲国"过来的资深日本老兵团团围住，他还要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自己过去被教导的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都是错的。后来，西方人曾拍过一部糟糕的电影再现这一幕：盖伊用他结结巴巴的日语向这些日本人解释道，美国人的将军霍兰·史密斯 [2] 十分敬佩他们在昨晚的战斗中表现出来的勇气，承诺一定会善待他们。一个日本军官问，受伤的士兵能否在医院得到救治，盖伊承诺说可以。我们不知道最终是什么原因打动了这些日本人，使得他们答应投降。也许，这和我们的主角的实际表现无关；也许，这些日本人只是因为已经撑到极限了，希望借此机会得到解脱。他们留下几个士兵陪着盖伊，又回头去叫剩下的人。这时，在许多战争中常见的一幕又出现了：盖伊拿出他的口粮和香烟分给周围的日本士兵，跟他们聊起他们的家庭，并提到了在战争中，许多普通人为服从有权有势人的命令而死是多么不值得。这时，之前离开的日本军官带着50多个士兵回来了，并告诉他还有100多个平民正躲藏着。他再次强调，大家急需水和药品。盖伊拿出自己的药粉给他看，并向他保证，只要他们跟着他走，就能拿到更多的药。渐渐地，数百个平民从四面八方汇拢过来。盖伊曾试图把士兵和平民分开，把受伤的人和健康的人分开，但日本人的情绪很激动，随便拆散他们可能会导致他自己面临生命危险。于是他一直等到海军官兵回来，向他们解释了当下的局面，才说服日本人让他挪动伤兵。

区区1个士兵，在短短1天之内，就俘虏了——可以说是俘虏了吧——超过800名敌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盖伊先后在塞班岛和天宁岛劝降了共计1500多名日本人，其中有士兵也有平民，有成人也有孩子。后来，他在一次战斗中负伤，这才离开了前线。他的上司曾为他争取过荣誉勋章，不过

他最初只获得一枚银星奖章，到1960年才升级为海军十字勋章。他后来娶了一名日裔女子为妻。1957年，盖伊上了美国NBC电视台的《这就是你的生活》栏目，从此一举成名。有人甚至根据他的这段经历改拍了一部电影，但拍得太差，如今已经无人问津。盖伊后来在墨西哥和塞班岛做生意，1970年他回到墨西哥，在那里开了一家海鲜店，从此在该地定居20多年。尽管许多人都呼吁军方授予盖伊荣誉勋章，但这一呼吁始终未被采纳。盖伊于2006年去世。

在这段历史中，这个在洛杉矶最糟糕的街区里擦鞋的10岁男孩的命运，最终与一位日本女子交错。据盖伊回忆，在他离开塞班岛前，他曾和一名日本战俘产生短暂的友谊。在此之前，盖伊曾经阻止一位日本女子摔死孩子后自己再自杀。他的朋友告诉他，这位女子后来才得知，战俘都会受到合理的对待，她之前被灌输的那些关于美军的恐怖故事都是骗人的。知道这些之后，她才意识到，自己白白杀死了自己的孩子，随后她就疯了。多年后，盖伊扪心自问，也许他在当时不要阻拦那位女子自杀才是更好的选择。

就像这样，在有些情况下，善与恶都是相对的，正如莫比乌斯环一样，同一面可能会出现在截然不同的正反两极。

[1] 马里亚纳群岛，由北太平洋上南北纵列的15座火山岛和一些珊瑚岛组成。

[2] 指霍兰·麦克提尔·史密斯（Holland McTyeire Smith，1882—1967），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名上将。